

丰碑

中共信阳党史资料汇编



中共信阳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九月

丰 碑

中共信阳党史资料汇编

(第十三辑)

中共信阳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九月

目 录

- 商城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发展
.....中共商城县委党史办(1)
- 固始县苏维埃政权建立情况
.....中共固始县委党史办(40)
- 罗山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及各项建设的发展
.....中共罗山县委党史办(48)
- 光山县苏维埃政权的创建.....中共光山县委党史办(57)
- 新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中共新县县委党史办(71)
- 光山县的土地革命运动.....中共光山县委党史办(80)
- 新县土地革命情况简述.....中共新县县委党史办(89)
- 固始县土地革命概况.....中共固始县委党史办(95)
- 罗山县土地革命的开展.....中共罗山县委党史办(103)
- 商城县土地革命概述.....中共商城县委党史办(112)
- 赤城红日社.....中共商城县委党史办(134)
- 鄂豫皖苏区卫生工作简介.....张全德(142)

杨山煤矿工人武装暴动

……中共固始县委党史办、固始杨山煤矿委员会(153)

新县枪会概况……………中共新县县委党史办(160)

红二十五军从花山寨会议到何家冲集结出发长征

……………中共罗山县委党史办(182)

回师潢光 连克颍敌……………中共潢川县委党史办(186)

商城“四·八”学潮始末……………中共商城县委党史办(190)

“一二·九”运动在信阳……………中共信阳市委党史办(206)

灌河两岸的硝烟……………李永海(221)

新集城下民主会……………游正刚(231)

留在大别山的火种……………张 波(237)

商城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发展

中共商城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二九年五月六日，商城起义一举成功之后，党组织立即着手革命政权的建设工作。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于当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我县建立了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权的诞生，标志着我县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的时期，工农兵劳苦大众站起来了，成了政权的主人。

苏维埃政权在我县存在六年之久（一九二九——一九三四）。在这六年之中，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有发展，有挫折，有高潮也有低潮。为了能较全面的反映当时的历史情况，分三个问题叙述如后。

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沿革

（一）临时办事处

商城起义后，各地起义队伍于五月九日会师斑竹园，组建了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红三十二师的创建，为实现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创造了条件。所以，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在红三十二师组成的第二天，就在斑竹园文昌宫召开了工作会议，决定在南溪黄鹤湾成立临时办事处（临时革命政权），以领导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办事处主任由红三十二师党代表徐其虚兼任（一说主任占谷堂，又一说副主任占谷堂）。

办事处成立后，在南溪和斑竹园等地发动群众，打土

豪，杀劣绅，收缴地主武装，摧毁豪绅政权，成立农民协会和农民委员会，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并将没收的地主豪绅的粮食和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广大农民群众很快发动起来。到五月底，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八千多人，赤卫队员四、五千人。初步形成一块纵横六、七十里的革命根据地。

临时办事处还在南溪林氏祠成立了学兵团，在小河和界板冲建立了军需处和红军医院，在佛堂坳办了兵工厂。

六月十二日，中央巡视员指示商城县委学习鄂东北的经验，建立农村政权。中共商城县委为此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当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条件日渐成熟时，敌人发动了“鄂豫会剿”，红三十二师被迫转移，商南根据地遭受严重摧残。占谷堂同志和革命干群五百余人被杀害。临时办事处亦被破坏。（1—7）

（二）商城县工农革命委员会

同年九月，敌人向西反扑，我红三十二师由光山八字门楼乘机返回商南，迅速消灭了敌人建立的“联保办公处”和“清乡团”等反动政权和武装，镇压反革命分子，召开追悼大会，控诉敌人罪行，群情激愤，纷纷报名参加红军，根据地很快恢复。十月，中共商城县委决定在南溪林氏祠再次组建临时革命政权——商城县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廖炳国。

在县工农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建立了四个区的苏维埃政府：一区吴店，下设十三个乡；二区南溪，下设十二个乡；三区余子店，下设四个乡；四区苏仙石，下设十个乡。

同时，各区乡的游击队、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地方武装也很快建立和发展起来。（8—14）

（三）赤城县苏维埃政府

由于豫南五县民团联合进攻李克帮部，互争潢川防地，商城伪县长宋慎率民团去潢川江家集参加混战，城防空虚，我红三十二师便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乘虚首克商城。

翌日，中共商城县委在城内召开了会议，为纪念商城获得解放，成为赤色城市，决定将商城易名为赤城。并定于二十七日召开市民大会，庆祝商城解放，成立赤城县苏维埃政府。

二十七日，全城张灯，四门挂彩，四乡农民抬着慰问品，敲锣打鼓，进城来慰问红军和参加庆祝大会。大会在城内官井沿大操场举行。大会宣布赤城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公推张德山（后叛变）担任县苏维埃主席。同时，发布了县苏维埃政府的施政纲领，苏维埃政府设在文庙内。

县苏维埃成立后，红三十二师分兵四乡，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建立区乡苏维埃。红军所到之地，摧枯拉朽，地主豪绅政权很快瓦解，区乡苏维埃迅速建立起来。新建的区苏维埃政府有：城关区（一说城郊区），辖商城市和四个乡；李集区，辖四个乡；观音山区（又称商城五区），辖九个乡；瓦庙集区（因该地原属固始县，故称固始二区），辖五个乡。

中共商城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为了统一商固边区的领导，于一九三〇年七月，在商城五区晏油坊召开了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商固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李永富，辖商城五区和固始二区。到一九三二年，边区方才撤销，固始二区改为赤城县第十区，不久又并入固始县草庙集第五区，归固始县苏维埃领导。

我县余集一带，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八日，成立了商光边区革命委员会，辖商城的安区（余集一带）、安北区（石马槽、贩西一带）和光山的沙区（沙窝、白雀园一带）。后又发展到商潢边区，成立了双轮区。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戚先平。因该地区是皖西北和鄂东北的重要通道，所以商光边区革命委员会归鄂豫皖特区民主政府直接领导。一九三二年二月，商光边区并入赤城县苏维埃政府。安区改为赤城县第十四区，辖十乡一市（中发市）；安北区改为赤城县第十三区，辖六个乡。其它区各归原县。

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是我县苏维埃政权发展的鼎盛时期。在此期间，又分设和新建了白沙河区，辖六个乡（一说十二个乡）；汤家汇区，辖十个乡；银沙贩区，辖七个乡；顾贩区，辖七个乡；翟贩区，辖四个乡。一九三二年春，全县已有十四个区，一百零八个乡的苏维埃政府。（15—25）

（四）赤城、赤南两县的划分

豫东南道委和道区苏维埃政府为了 方便工作，便于领导，于一九三二年七月，决定将商城 分为赤城、赤南两县。

赤城县苏维埃政府仍设在城内张家花园，主席杜立保，副主席刘文炳，辖八个区。

赤南县苏维埃政府设在银沙贩陈氏祠，主席丁江成。辖银沙贩、汤家汇、南溪、吴店、白沙河五个区。同时，划达权店为六区，长竹园为七区。后因敌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仅达权店区建立了五个乡的苏维埃政府，余皆未能建立。

同年九月十四日，敌人占领商城，赤城县苏维埃政府迁往熊家河沙河店。县苏主席杜立保被撤职，由副主席刘文炳继任。因大部苏区被敌占领，全县重新划成三个区，一区双河，二区苏仙石，三区熊家河。到了一九三四年秋，形势日趋恶化，根据地逐渐缩小，这时，只剩下南石塘和熊家河两个区了。县苏主席刘文炳，被高敬亭肃反错杀，县区干部实行军事化、战斗化，大部编入商北游击大队，县苏维埃政府也就不再存在了。

赤南县到一九三四年冬，县区干部仅剩三十余人，到处游击，后编入红二十八军。县苏主席丁江成随红二十五军西征，走到罗山负伤留在当地养伤。因此，苏维埃亦不存在了。

一九三五年六月，赤城县干部和地方武装大部编入红二十八军，余下老弱病妇上了金刚台，赤南县的部分区乡干部亦随后上了金刚台，在邱玉生和张富的领导下，成立了商南县委和商南游击大队，继续坚持革命斗争（26、27、28）。

二、苏维埃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我县苏维埃政权是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诞生的，在斗争中求发展。因此，创建时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开始区乡苏维埃是在农民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方法都比较简单，一般是由党组织研究提名，群众大会宣布通过即成。各区乡苏维埃的设置也只能视工作开展情况而定，开辟一个区，就建立区苏维埃，开辟一个乡，就建立乡苏维埃，不可能事前作好规划。在机构设置和人员安排上也尽量从简，一切为了革命战争，还谈不上其它建设工作。

到了一九三〇年春季以后，根据地由高南一隅扩大到商城全境（除亲区和商潢边区一部分），并且日趋巩固。中共商城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便立即着手由下而上的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和健全苏维埃的各项制度。

苏维埃代表大会有两个特点：一是广泛性，二是权威性。

苏维埃代表从工农兵中直接选举产生。除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和反革命分子外，广大劳苦群众，不分种族、性别、职业，凡年满十六岁以上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举时，因工人群众较少，为了增加代表中的工人成份，又规定，工人每五十人选代表一名，农民每五百人选代表一名。一九三〇年五月，赤城五区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有三百多名代表参加，全区九个乡，平均每乡出席代表三十多名。大会开了三天，讨论了各项工作，最后选举产生了五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李永富。召开了万人大会，庆祝苏维埃的诞生。

县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县的最高权力机关。一九三二年二月，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城东八里桥曾小湾召开。大会开了七天，县苏维埃主席张德山向大会作了报告。代表们对报告作了讨论，并改选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后向群众作了传达。

县苏维埃政府（又称执行委员会），是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执行机关。执行委员会产生常委，常务委员会推选主席。执行委员会下设有军事、财经、土地、文化、粮食、交通、保卫等委员会，由常委分头领导各项工作。

各级苏维埃对干部要求很严。如村苏维埃的干部不准脱

产，乡苏维埃干部只准开一桌饭（意思是脱产人员不能超过八个人）。干部必须忠于革命，为民众所信仰，经济地位低（如佃农雇农等）。对不称职的干部及时罢免，如新店乡苏维埃主席黄息定，因他女儿仗着父亲是主席，随便拿没收的地主的东西，被撤职。对经济贪污的处理更为严厉，如杨山煤矿赤色工会的经理高振五，因把一千多块银元弄的没着落了，被逮捕。

在县苏维埃的领导下，县、区、乡还建立了工会、贫农团、赤卫军、少先队、儿童团、妇女会、反帝大同盟和赤色互济会等群众团体。他们都是苏维埃政府的得力助手，在建设苏区和保卫苏区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20、24、29—32）

三、苏维埃政府的任务和活动

我县苏维埃政府是全县人民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它除了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外，还要领导各项建设工作，其主要活动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是苏维埃政权的一项中心任务，县区都设有土地委员会，专门负责这项工作。

一九三〇年春季，随着苏维埃政权的陆续建立，我县大部分区乡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基本上是苏维埃建到那里，那里就开展土地改革。到一九三二年秋，有的收了三个庄稼（指水稻），有的收了两个庄稼。土地改革以乡为单位，首先由土地委员会登记田亩、人口，划分阶级成份，发动群众，斗争和收缴地主的田地契约，予以焚毁。再

把没收地主、祠堂、庙宇的土地和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给缺田和少田的农民。据不完全统计，全县（不包括现属金寨县的和、乐两个区）有十二万一千六百余人分得土地二十二万九千五百多亩。同时，各乡还提出部分好田作红军田，由农民共同耕种，收的粮食作红军口粮。

土地改革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广大农民群众因而更加自觉地拥护红军和苏维埃。

（二）武装建设

县苏维埃政府下设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县以下各级地方武装。

地方武装有少先队、赤卫军和独立团三种。

凡十六岁至十八岁的青少年，都参加少年先锋队，乡设中队部，区设大队部。它是一个半军事性的青少年组织，学军事，学文化，跑交通，做宣传，监视坏人，拥军优属，是农村中一支很活跃的青少年队伍，也是红军的主要后备力量。

赤卫队（后称赤卫军），是农村中一支最普遍的群众武装。十九岁至三十五岁的青壮年，除剥削家庭和有残疾者外均可参加。新开辟的地方，多首先建立赤卫队，因为它是苏维埃政权的主要保卫者。一九三一年四月，县苏维埃将各区乡的赤卫队按三三制进行整编，县成立赤卫军司令部，下辖五个团。赤卫军司令胡植（即陈慕尧），参谋长徐文明，政治部主任李冠英。

另外，为适应战争环境，县区乡还组织有一支常备性的地方武装。乡成立战斗连（亦称模范连），区成立战斗营（亦

称独立营），县成立独立团。他们半脱产或全脱产，都是从少先队和赤卫军中挑选出来的政治思想好、作战勇敢、身体强健的积极分子所组成的，武器装备也较好。一九三一年四月统计，全县地方武装有长枪六百二十五支，短枪六支，手提机关枪（冲锋枪）四架，所以，他们有一定的战斗力，可以配合红军或单独打击敌人。同时，又是红军的预备队，我县组建的独立团、游击师曾多次成营成团的编入红军。

县苏维埃还设有红军委员会，专门负责宣传红军，拥护红军，扩大红军的工作。仅第四区三、四两乡的统计，就有三百九十一人参加了红军。曾在红军委员会工作过的陶玉华回忆，在他参加该项工作的两个月中，就扩大两次红军。这说明我县苏维埃政府对扩大红军的工作非常重视。

（三）经济建设

我县工业、手工业和商业遍布城乡，木材、竹子、药材、茶叶等土特产品，满山遍野比比皆是。土改以后，生产力得到解放，大大推动了我县经济的发展。但是敌人在军事围剿的同时，在经济上亦对我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企图困死我们。县苏维埃政府为打破敌人这一企图，保障军需民用，设立财经委员会，加强经济建设工作。

（1）组织互助合作，发展农业生产。在春秋农业生产大忙季节，县苏维埃政府及时发指示，派检查团到各区乡检查督促生产；发动农民组织共耕队、互耕队和突击队，帮助烈军属和劳力困难户及时耕种和收获；组织生产合作社，生产各种农具，供应贫雇农。如二区四乡苏维埃在谢祠堂组织一个生产合作社，有二十多人，分木工、铁工、篾工、织布等生产小组。生产出来的产品，只算成本，不加利润，只售给

贫农雇农，不售给地主富农。资金困难户，还可以向信用社申请贷款。

(2) 组织经济公社，活跃苏区经济。在没收土豪劣绅和反动资本家的工厂和商店的基础上，县区两级建立了公营的经济公社，乡以下发动农民集资办起消费合作社，加上私营工商业和个体小商贩，形成了一整套赤色商业网点，疏通了商品流通渠道。

经济公社的主要任务是：经营苏区军民生活必需品，专做批发业务，掌握物价的平衡，收购茶叶、药材等苏区特产，对白区进行贸易。群众集资办的消费合作社，主要是经营日用百货的零售业务，组织付业生产，如榨油、杀猪、磨豆腐等。对白区的贸易，由经济公社在赤白交界地区设立接头处。白区商人和老百姓可把食盐、布匹、电池、纸张、西药等货物运到接头处，由经济公社收购。经济公社再把苏区的桐油、生漆、黄丝、茶叶、茯苓、扫帚、木炭、家俱等土特产品销给他们运到白区去卖，并准予用赤区的货币换白区的货币或银元带走。同时，经济公社也经常组织群众把一些土特产品运到白区去卖，换回日用百货和白区货币。结果，苏区经济日渐活跃，敌人的经济封锁被打破。

(3) 废除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累进税。计有粮食税、贸易税、行商税、印花税、烟酒税、屠宰税。对手工业和城镇贫民不征税。

(4) 建立银行，开展信贷业务。具有银行（现在的红旗旅社处），区乡有信用社。办理信贷业务和各种货币的兑换工作。赤区的货币信誉很高，不论布币、纸币都可以兑换面额相等的硬币。

(5) 苏维埃还开办有造纸厂、纺织厂、军工厂、印刷厂、煤窑、铁厂、锅厂、烟店等工业和手工业二十余处，职工近千人。对发展苏区经济，保证军需民用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之，我县经济建设搞得有声有色，并初具规模，全县人民生活有很大改善。

(四) 文化建设

人民在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亦迫切要求活跃文化生活。县苏维埃设有文化委员会，领导全县的教育、文化和卫生工作。在教育上，县城和大集镇设有模范小学和中学，区乡设列宁小学，各村有列宁室、识字班。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办有各种学校四十三所，识字班一百零三个。在文化上，县有红日报社和红日剧团，区乡有宣传队，村有俱乐部、游艺室。卫生方面，全县有医院六所，并经常开展卫生运动，改善苏区卫生条件。

他们所需经费均由苏维埃拨给。也有的学校实行半工半读，学生住校学习，免交学费。学生除学习文化外，还学习军事，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慰问红军，配合中心工作搞宣传，以及读报、演剧，帮助农民识字等。

另外妇女委员会在苏维埃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对封建迷信，反对“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和反对妇女缠足等活动，都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五) 县苏维埃设有保卫委员会，领导保卫局、革命法庭和监狱等部门，镇压土豪劣绅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保卫苏区的安全。

(六) 县苏维埃设有交通委员会，负责交通和邮电方面

的领导。各区成立有邮电支局和交通站。

(七)县苏维埃设有粮食委员会，管理粮食市场。粮食在苏区内可以自由买卖，但禁止向白区外流。所以，苏区粮食非常充足，一块银元可买六、七斗（每斗合三十斤）粮食。

(八)在县苏维埃的领导下，工会、贫农团、赤色互济会和反帝大同盟等群众团体，也都开展了各种有益的活动。

总而言之，我县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充分显示了她的生命力。（23、24、27、30、32—42）

执笔人：刘引之

一九八五年七月

附件（1）

临时办事处成立情况

一九二九年阴历四月初二（五月十日），李梯云、徐其虚、徐思庶、肖方、周维炯等同志在斑竹园文昌宫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讨论和决定扩大红军，发展赤卫队和农民协会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了统一领导这一地区的革命斗争，党在南溪黄鹤湾成立了临时办事处，由徐其虚同志任办事处主任。

摘自《立夏节烽火》，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0年12月版

附件（2）

临时革命政府成立情况

红三十二师建立之后，立即开展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五月十日，在徐子清、徐其虚的主持下，鄂豫皖特别区委，在斑竹园文昌宫召开会议，讨论和决定扩大红军，发展赤卫队和农民协会组织，建立苏维埃政府等问题。为了统一领导这一地区的革命斗争，在南溪黄鹤湾成立办事处，即临时革命政府，占谷堂任办事处主任。接着在南溪林氏祠堂成立了学兵团，由三十二师参谋长负责培训红军骨干。此外还建立

了军需处、红军医院、兵工厂等。

摘自《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年4月版

附件（3）

（河南省委）通告十二号（摘录）

2、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已经过时了，不适应了，我们在乡村中即暂用农协掌握政权——一切政权归农协——发展到一县或数县时，则直行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县政权。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附件（4）

河南组织问题决议案（摘录）

（省委第二次全会通过）

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

（10）农民中的组织工作——要纠正党与群众之混合，农协与农民委员会的混用。农协中可以贫农中农之进步分子为基础；而农委是雇农贫农（……）参加的组织，并是将来

乡村中苏维埃的基础。雇农工会，要在工会之下成立单独的组织。

附件（5）

信阳中心县委扩大会的决议案（摘录）

一九三〇年二月五日

（三）商城问题……

群众的组织很普遍，（农民委员会）在赤村内每一村都有。

附件（6）

一九二九年五月下旬，商南地区的农民委员会（相当于政权机关）迅速建立，青壮年积极报名参军，赤卫队很快发展到四、五千人。

摘自《红四方面军战史》（送审稿）

附件（7）

中央巡视员郭树勋给商城县委的信 （摘 录）

（二）关于一般工作方针：

- 1、积极扩大红军组织，发动庞大的游击战争区。
- 2、努力打破横在鄂东北及商城之间的军事障碍。
- 3、加紧红军的训练工作。
- 4、设法作民团群众中的组织工作。
- 5、肃清乡村的反动势力。
- 6、在非军事区域中，依然要积极利用日常生活斗争口号发动群众。
- 7、扩大群众组织，并使他们武装起来。
- 8、农村政权的建立可以学习鄂东北的经验。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二日

附件（8）

丁际荣回忆

一九二九年九月底，商南根据地全部恢复，于南溪林氏祠正式成立了商城县工农革命委员会。商城县一区、二区、三区、四区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革命群众玩灯演戏，热烈庆祝。

摘自《金寨大事记》

附件（9）

王凤池传略

（一九二九年）九月底，商城县工农革命委员会在南溪林氏祠成立，廖炳国任主席，王凤池任秘书长，不久迁往汤家汇。十二月红三十二师首克商城，改商城为赤城，商城县工农革命委员会自汤家汇迁往商城，改称赤城县苏维埃政府。王凤池同志为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摘自《金寨英烈》第二辑

附件（10）

廖炳国烈士传

（一九二九年）炳国同志随红军重返商南，党组织决定从红军干部中抽调二十名骨干，担任地方区以上政权领导工作。炳国因在作战中左腿跌伤，请求回到地方工作，被任命为商城县一区苏维埃主席。不久，商城县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炳国同志任主席。

摘自《金寨县革命英烈》第一辑

附件（11）

商城县第一区苏维埃成立情况

一九二九年八月底，在果子园蔡家湾成立了第一区苏维埃，主席邓世清，各乡分别成立乡苏维埃。

摘自斑竹园革命史料

附件（12）

曾宪池回忆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中旬，红军主力三十二师在鄂东、豫南打了很多大胜仗，又回到南溪来了。红军一回来马上和赤卫军一起向商南反动势力进攻，成立苏维埃政府。商城县苏维埃政府设在汤家汇姚家祠堂，南溪、汤家汇、丁家埠、李家集、双河一带划为商城县第二区。区政府设在麻河张家祠堂，王世房被选为二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摘自《立夏节烽火》

附件（13）

三区苏维埃政府情况

商城县伏山公社余子店街中余氏祠是商城县第三区苏维

埃政府所在地，区长刘正之，副区长卢篋匠。它位于金岗台脚下，是商南和、乐二区和城区的连接地。

余子店大队管委会资料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五日

附件（14）

张运涵的回忆

一九七八年八月九日

一九二九年刘宪章等人来到二道河一带，发展共产党组织，建立赤城四区五乡苏维埃，四区设在苏仙石，五乡设在二道河街上。先后任五乡苏维埃主席的有赵三、夏四机匠、柯日成。五乡苏维埃成立后建立了赤卫队、童子团、少先队。

民国二十年在沙河建立九乡苏维埃，存在一年多时间。

附件（15）

鄂豫边特委关于成立鄂豫边 革命委员会的报告（摘录）

再者，三十二师自“鄂豫会剿”以后，拖出红军，红军由光回商以后，武装日有增加。前日又攻下商城，已在县城

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县长逃去，今县城都成赤区。

一九三〇年

附件（16）

杨醒生回忆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二日

县城解放后，立即在观井沿子县立第一高小操场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商城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德山，同时宣布十大政纲。苏维埃政府下分设有土地委员会，文化青工委员会，妇女委员会，内政委员会，保卫委员会，粮食委员会等。县苏地址在男高学校（现在一中），红军司令部在文庙。

各级苏维埃主席、委员是民主选举的，一年一选，乡选代表到区，区选代表到县，代表会选主席、委员。

区苏维埃的任务是：1、组织农民生产；2、领导各种组织；3、动员青年参军；4、做好后勤工作；5、搞好地方治安，镇压反革命。

注：杨醒生，一九三〇年任余集区赤卫队指导员、第四区秘书等职，现住武汉市宝丰路十七号。

附件（17）

中央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在 商城调查材料（摘录）

一九五一年八月三十日

一九二九年冬月二十五日晨拿下商城，当时商城改名为赤城，公推张德山为县苏维埃主席，黄本成任商城市（即镇）政府主席。成立了四郊区苏维埃政府。

又

攻占县城后，首先建立赤城县苏维埃政府、市苏维埃政府，并划本县为七个区，设立区苏维埃，区以下有乡、村苏维埃。市苏维埃下设东街道、南街道、西街道，各设有苏维埃政府。

一九三二年正月初五，第三次收复商城，重新组织苏维埃政府，又组织少年先锋队、童子团、妇女会等。

附件（18）

罗歧伟回忆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七日

赤城一区有四个乡，东门一乡，二乡是南门，三乡是岳湾，四乡在三里桥。一区区苏在余家烟店（大十街），有民

警队十多人，有粮食委员会、红色战士委员，区长是陈启昌。区苏脱产干部七人。

第三乡有七个村，下马河是第一村，村干部有七人。

乡村划好后就分田。

原先下马河党组织属六区领导，区委设余子店王楼。上级给两个任务：一是发展组织，二是搞情报，罗昌嗣负责秘书工作。

注：罗歧伟，一九二九年任商城县下马河团支部书记，现住连鱼山乡木头河村。

附件（19）

五区苏维埃建立情况

一九三〇年四月份建立五区苏维埃政府，地址在陈寨，同年秋迁到杨堰，下辖九个乡苏维埃。

一乡武桥，二乡白塔集，三乡楠杆桥，四乡观音山（易冲），五乡新楼（大竹园），六乡莲花塘（双门楼子），七乡三里桥，八乡丰集的许西楼，九乡丰集的沙河畈。

区下设有游击大队（大队长张裕鼻子）、保卫局（局长陶守本）、民政局、工会（主席韩三）、少先队、妇女会（主席盛月之）、宣传队、经济公社（在南司街）、俱乐部等机构。

商城河凤桥公社材料组调查整理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附件(20)

常毅的回忆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一九二九年五月，商北党团领导人组成一个商北行动委员会和商北游击队。

打开商城后，商北行动委员会也半公开活动了。

一九三〇年三月下旬，商北观音山、李家集、草庙集、上石桥等方圆六十余里的地方，在行动委员会指挥下，一个夜晚全暴动了，到处插上了红旗，行动委员会改称五区，并成立十几个乡。

五月在回龙集南头陈寨，召开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开三天，共三百多人，选出区苏维埃主席李永富。

由于五区地方很大，又发展得快，特别是向东北固始方向，到七月份已发展到瓦庙集，赤城县委决定成立商固边特区。

一九三〇年七月，正式成立商固边特区苏维埃政府（在晏油坊），主席李永富，我是少共特区巡视员。

七月下旬，少共特区委员会派我到瓦庙集一带帮助成立固始二区，召开了区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区苏主席为张忠海。

商城五区、固始二区都属特区领导。

附件（21）

瓦庙集区成立情况

一九三〇年二月，在瓦庙集柴中营子成立固始二区苏维埃，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划归赤城十区，第一任主席宋颢子。后与草庙集五区苏维埃合并。

摘自固始革命斗争史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附件（22）

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鄂豫皖区情况

给中央的综合报告（摘录）

一九三一年十月九日

皖西旧的赤区不仅恢复，而且如小南京（霍邱属）、洞沟（商城属）等反动中心都前后被我们消灭了。鄂豫边及皖西北两个赤区中间，现仅有二、三十里路为白色区，在那里成立了一个特区区委和商光边革命委员会。

附件（23）

余世保的回忆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八日，我红四军二十九团来余集发展

革命，在余集成立革命委员会，成立乡苏维埃政府。后建商光边区政府，主席占宏恩，成立三个区：沙区、安区、安北区。

一九三二年正月初五，攻开商城县，成立赤城县政府，县长张德山，商光边区军队和干部统统进城。赤城县成立十四个区。

区成立有模范小学和消费合作社，还成立有工会。我五月初二入党，在工会担任秘书，八月十六日又担任区委秘书。

摘自河南省博物馆

附件（24）

余集农民斗争大事记（摘录）

五月初，商光边区革命委员会在余集街张祠堂成立。主席余世银，边区区长杨国运，边区革命委员会下设保卫局、革命法庭、总工会、看守所等机构。同时成立商光边区特委会，书记戚先平，下设少共团、妇委会。

商光边区下辖三个区，安区：余集、施河、冯店、钟铺一带；沙区：沙窝、沙坪、白雀园一带；安北区：贩西、马槽、高棚一带。

五月中旬，安区苏维埃政府在响塘大平地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正式成立，主席杨国运，安区党委书记余信特。全区划分十个乡、一个市。

一九三二年一月，商光边区特委与赤城县合并，留下一

部分干部充实安区。同月，安区苏维埃由大平地迁到余集张祠堂，这时安区被赤城县划为十四区。

苏维埃的各项建设：

一、政权建设：

安区十乡一市四十八村，均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区乡设主席、常委、执委若干人，村设主席、委员三至五人，分管工商、粮食、财经、土地、青妇、武装等各项工作。

二、群团建设：

边区和安区设有总工会，乡设农民协会，工会设委员长、委员，农协设主席，委员若干人。还成立有妇女会、儿童团。任务是组织手工业工人、贫农和妇女参加社会活动，搞宣传、做军鞋、慰问红军、站岗放哨等。

三、武装建设：

建立苏维埃的同时，区、乡地方武装相继建立，成立有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等，重点乡有赤卫营、游击队，任务是配合红军打仗，打土豪捉劣绅，维持革命秩序等，还负责组织运输，监督坏人，传送情报。全区有赤卫队员一千二百余人，少先队六百人，有四百余人参加红军。

四、经济建设：

区所在地设经济公社，乡设经济合作社，均设有经理、会计、买办（采购），服务员若干，经营杂货、布匹、肉食、生活和生产资料，任务是发展苏区经济，保障军需民用，组织购销。资金农户自筹三至五元不限，到月分红。

五、文化建设：

区办列宁学校一所，乡办小学六所。

六、开展土地革命运动：

一九三〇年夏到一九三一年秋，随着各乡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掀起轰轰烈烈的分田高潮，烧毁地主的田契借约，颁发土地证。五乡有二百余户农民分得田地八百余亩。

商城余集公社提供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附件（25）

李杰山的回忆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七日

民国二十一年农历三月，十二区苏维埃政府在汪春台子成立，主席李禄辉，我任粮食委员。

区委书记张良发，团委书记刘金章，保卫局长陶登明。农历五月二十几区苏搬到龙堂歪庙，全区六个乡。

注：李杰山，原赤城十二区工作人员，现住商城县河凤桥乡观音村。

附件（26）

丁江成的回忆

一九六〇年五月三十一日

一九二九年九月，在汤家汇建立了商城县农民革命委员会，主席张德山。

一九三〇年九月间，县苏维埃设在汤家汇，县苏主席张德山。这时商南共建五个区苏，一区汤家汇，主席杜立保，下辖十个乡；二区丁家埠，主席吴××，下辖十二个乡；三区吴店，主席陈记信，下辖十三个乡；四区沙河，主席葛尔连，下辖十二个乡；五区银沙畷，主席毛为学。

民国二十一年正月，商城再次解放，县苏从汤家汇迁到商城县。在赤城县成立了南五县道区苏维埃，道苏主席张德山。

民国二十一年七月，商城划分为赤南县和赤城县，赤城县苏主席姓张，赤南县苏是一九三二年古历七月初十成立的，共七个区二十多个乡。六区达权店，七区长竹园，当时虽划这两个区但政权未建立。

附件（27）

李占彪的回忆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一九三二年正月初，商城解放，鄂豫皖省委决定成立豫东南道区，并组建独立第四师，道委书记高敬亭，道苏主席张德山，道委住在周宰相家，独立四师师长徐海东，并将商城划为赤城、赤南两县，赤城县苏维埃住在城内。

城区下辖五个乡，东关为一乡，南关二乡，西关三乡，北关四乡，城内为城关乡。我是二乡的人，正月半在陶家祠堂正式成立二乡苏维埃。

一九三三年一、二月间，豫东南道委和皖西道委合并，

称皖西道区，道委书记郭述申，道苏主席张德山。同时重新恢复了赤城县政府，并成立二路游击师，县委书记吴代芬，县苏主席陈亚亭。不久陈病故，由原一区苏主席杜立保任县苏主席，后杜被撤职，刘文炳任县苏主席。下辖三个区：一区汤家汇的胡家店、龙寨、金家湾子一带；二区苏仙石、金刚台、赵家河一带；三区在熊家河、长江河、全军一带。

一九三四年夏秋之间，高敬亭来熊家河肃反，将县委书记吴代芬、县苏主席刘文炳、二路游击师师长朱世升、政治部主任肖新甫等都杀了，石玉田任县委书记，杜昌甫任师长，没有苏维埃主席了，也没有苏维埃政府了。不久杜昌甫被撤职，病死。二路游击师编入二十八军，另组建商北大队，主要兵员是保卫队、民警队、工人纠察队，能扛枪的伤病员，加上区乡机关精简的人员，共二百多人，我任大队副。

我们离开商城时，是一九三五年五、六月份，张富留下坚持根据地，进入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

附件（28）

一九三五年赤城、赤南

两县苏维埃情况

一九三四年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赤城县委、县苏以及警卫队共约五、六十人，在县委领导下的还有两个区，靠熊家河系二区，靠南佛堂子系一区。赤南县约三、四十人，下辖三个区，二区蔡家祠堂、南溪，三区小河，四区胭脂、

麦元。干部、群众都依靠打粮为生。

摘自红二十八军斗争史料

附件（29）

河南省委给信阳中心县委转豫南各县委及 全体同志信（摘录）

一九三〇年五月八日

在发动游击战争与地方暴动之前，我们同志对此任务是要明白的。甚么任务？即是迅速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工作八小时，童工六小时，无情的杀尽土豪地主并推翻其政权，而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组织红军。实现这四大任务之方式，决不是鄂北及商城经过许多筹备期间的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而是游击所到之区，由革命委员会立即召集民众大会（富农及资本家除外），在民众大会上，一律通过，而将区或乡或市苏维埃成立，一切问题，由苏维埃办理。大会前党应即把名单及其他工作要准备好，经过党团讨论，有组织的把会议时间缩短而收更大效果。

附件（30）

关于鄂豫边情况的综合报告（摘录）

一九三〇年

（6）苏维埃

……迨去年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才开始到各县筹备苏维埃，有的先成立区苏维埃，有的先成立乡苏维埃，有的先成立县苏维埃，在每次成立苏维埃时，除代表外，常有成千成万的群众前往参观。农民武装警卫，童子团武装维持秩序，旧式歌乐（没有新式的），做匾对去庆祝，杀猪欢宴代表，以及在庆祝苏维埃大会中都有万人以上的人数（老幼妇女都到会）到会。于此可见群众对政权的要求与革命情绪的高涨矣。现已正式成立各级苏维埃的有四县：黄安、麻城、光山、商城。

（11）武装问题

商城有短枪五十余支，长枪五百余支（内有很多不管用的），成立有游击队、特务队（解决经济）。

（此件报告人未署名，按报告内容、口气和时间判断，可能为曹大骏同志所作——原注）

附件（31）

杨克武的回忆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五日

红三十二师打到哪，政权就建到哪。各级政权都建立农

民协会、赤卫军、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儿童团等组织，发展党团员，成立党团支部。

注：杨克武，原红三十二师文书，曾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现住武汉市元宝山。

附件（32）

吴忠泰同志回忆

一九二九年，老一区九乡苏维埃成立比较早，区苏维埃在佛堂坳，九乡苏设在吴家畈张家大湾。我是乡苏维埃常委，管文化，后到区担任文化委员。

一九三二年正月间，商城打开了，县政府搬进城，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我们九乡选举代表二人参加，男的是我，女的叫周鹤仙。会议是在城东南方向约五、六里的古井子开的。会议开了七天，主持会议的是老主席姓张（张德山），五十来岁，作的报告，总结工作。讨论了巩固发展苏区、扩大生产、发展经济，以及工农商学兵、青年、妇女等工作。最后改选了苏维埃主席。会议结束后，举行入城仪式，打着红旗，敲锣打鼓，放鞭炮鸣炮，整队进城。以后，离城近的就回家，远的还回到古井子，第二天才回去。周鹤仙留下参加工作了，我回到九乡苏维埃。

（根据吴忠泰同志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和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两次回忆及一九八五年八月十六日的来信摘录整理——笔者注）

附件（33）

陶玉华的回忆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一九三二年我在红军委员会任秘书工作，地点在东街牌坊里西门楼子，共有十三人，七个常委，六个执委，任务是宣传红军，扩大红军，拥护红军，慰问红军。我担任这项工作两个月之内扩大两次红军。

鲁交瑞和杨众成介绍我入党，鲁是市镇苏维埃组织干事，杨是街苏主席。

赤城县指挥方英，被保卫局杀害了。

赤城县党代表金池（荆赤）。

附件（34）

苏仙石公社优抚委员会的调查报告

（摘录）

一九二八年秋，党派双河刘宪章来苏仙石开展革命工作，一九二九年二月，在苏仙石南楼建立东区区部，时隔一个多月，改为四区，区委书记张俊，后为李贤良、彭和舟等。

四区苏维埃设在叶氏祠，第一任主席杜少亭，一九二九年秋肃反时被捕，后是叶老冤、唐家成、李应科、张富等。

四区大队长杜新田、梁绪初，一九二九年秋肃反他二

人被捕。以后区队改为八团，团长易干福，团政委王少宏，后为叶宗本。一九三二年秋，八团改为游击大队，大队长徐国松。八团下设三个营，一营张店（现属金寨），二营青岭湾（现属固始），三营苏仙石，营长叶善泽，政委方志洲。

据初步调查，只四区的第四乡和第六乡的三个村，那时就有三百九十一人参加了红军，有五百七十二人参加了游击队、赤卫队，有二百一十六人任区、乡、村苏维埃干部，合计一千三百七十三人。全社牺牲红军二百八十人，牺牲游击队员和赤卫队员五十一人，牺牲苏维埃干部四十二人。

一九七九年七月六日

附件（35）

洪长选回忆

一九六〇年八月六日

一九三〇年古历六月中，区苏维埃政府为了解决当时农民缺乏生产工具的困难，在商城二区四乡谢家祠堂建立了生产合作社，经理洪作选，共有工人二十多人，分五个作业组，木工组五人，铁工组四人，篾工组三人，织布组三人，造雨伞、斗笠组七人。

当时合作社规定：1、生产的工具只算成本和工资，不取利润；2、工具只售给贫雇农，不售给地主富农；3、雇农没钱购买可以贷款。

附件（36）

中央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河南分团商 城组关于余子店乡调查报告（摘录）

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

一九二九年冬第一次打开商城，余子店即发展了赤卫队一个中队，三十人，三十多支枪，不到两个月，发展到百余人，成立一个连，一百多支枪。

一九三〇年春建立了农民协会、妇女、少先队、童子团、宣传队各种群众组织，九月在全乡分田。还组织有八百多人的运输队，随赤卫队下山打土豪、打粮，有三百多人到火线抬担架。妇女会组织有洗衣队，做慰问品。一九三一年全乡有党员三十二人，共青团也建立了。一九三二年建立了手工业合作社，铁木匠十四人，农民消费合作社二个，公营经济公社一个。

附件（37）

付家选的回忆

一九八二年七月

一九三二年一月底，商城再次解放，豫东南道委向省里要财经工作人员，我从余集调到商城经济公社工作。经理余

肇化，副经理曹品三和我。

经济公社是负责工商业的经济工作组织，主要经营管理从地主、豪绅、反革命手中没收的工厂、商店，对私营的小商、小贩也管。当时管理的有二十多个工厂和商店，有职工近千人，社部只有十几人。

商城县工商业布满全城，商业上每天要收购从根据地来的一些土特产，还要派人到外地采购食盐、西药等各种百货，供应红军和合作社来批发之用。

在工业方面，主要是组织生产。

当时苏维埃政府银行发行的货币有两种：一是布币或纸币，二是银币。

附件（38）

新店乡苏维埃发展情况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六日，在新店下街建立了乡苏维埃政府，黄息定担任了乡苏维埃主席。那时很重视苏维埃领导成员的政治表现。后来察觉主席黄息定的女儿仗着父亲是主席，偷偷摸摸拿没收地主的的东西，人们有意见，经过研究更换了黄息定的主席职务，改选汪晓山担任，经过一段发现他的家属也有类似情况，再次改选了乡苏维埃主席，最后选周俊峰当主席。前两任的主席分别担任没收委员和均田委员。

商城达权店公社调查组调查整理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八日

附件（39）

傅友山的回忆

一九八三年十月一日

赤色工会成立后，没收了高富兴、汪培录两家窑主的几大堆煤，由工会洗、筛、卖、高振五当经理。卖煤三人一班值日，卖的钱交高振五，到五月初三，卖有一千多元银元，指望这些钱买布做制服，钱被他搞没了，工会会员意见很大，县苏维埃来了两个人，在苏仙石叶祠堂开会，高振五交待不出钱搞那里去了，会后把高振五带走了，后来砍死在南溪火把岭。

附件（40）

皖西北特委报告（摘录）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八日

.....

商城出纸、黄丝、漆、铁、煤，纸棚苏维埃办有两所。盐场（市集）在四区官（关）王庙甚热闹。

附件（41）

吴作继、李世杰、晏凤鸣等老农谈

六区一乡列宁小学的情况

六区一乡列宁小学是一九三〇年春办的，地址在瓦屋基，是乡苏维埃政府主办的。开始是二个班，及一个识字班，一百多学生，两个老师，晏成敏和王耀之，是周维炯从笔架山调来的，以后又增加了晏宇宙、晏宇席、毛风仪等人。

当时开课有国语、常识、算术、体育、音乐、美术等，课本是乡苏政府印发的，课文是外地传来的，有的是自编的。学生除学习外，还站岗放哨，慰问伤病员，开会维持会场。一九三一年女学生吴风池只身到白区宣传，被白军抓住，壮烈牺牲于城南河湾，临刑时还高呼“共产党万岁！”

一九三一年冬顾敬之骚扰苏区，烧了学校，只剩五间瓦屋。师生克服重重困难，继续坚持学习。直到一九三二年，四次反围剿失败，学校才被迫解散。

现在“六区一乡列宁小学”的校区和校址还作为革命文物保护单位。

一九八一年七月四日

附件（42）

立孝括、文明轩、刘长贵、
刘继明、杨金芳、熊连之等
老农座谈赤城四区三乡情况

那时我们这里属赤城县第四区（先是东区），区政府在苏仙石，区苏主席叶应科。

三乡主席叶海清，土地委员易乃荣，粮食委员段忠良，妇女委员李世珍。学校在金祠堂，有一二百学生，识字班四十余处，每天晚上男女成人都去学识字，有五、六百人参加。成立有赤卫队，队长张西成，成立时只有三十多人，用的是土枪，以后发展到百十人，有土枪也有钢枪。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

固始县苏维埃政权建立情况

中共固始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在部分地区先后建立了工农革命政权——乡、区苏维埃。随着斗争的深入，红色区域不断扩大，一九三一年五月四日，县级政权——固始县苏维埃政府诞生。至此，我县政权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一、固始最早的一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一九二九年五月六日，豫东南爆发了著名的商南起义。在商南起义的推动下，我县南部的方集、段集相继建立了五个乡苏维埃政府（均属商城四区）。十二月六日，共产党员刘宪章、张平舟在二道河河西李牌坊主持召开了有张直夫、柯从舟、王新田、李子青、陈润生等三十多名贫苦农民参加的秘密聚会，商定组织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并任命了各乡、村干部。次日，这里的农民身披牺牲带，手持木棍进行了武装暴动，攻下了吴上楼等土豪围寨，夺取一批钢枪、土枪，成立了六十多人的农民赤卫大队，大队长吴雪樵。十八日，苏维埃筹备委员会在二道河北河湾召开了一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正式宣布成立第五乡苏维埃政府。选举了苏维埃执委、常委，张直夫被公推为主席。这是我县建立最早的苏维埃政权。不久，在青峰岭湾建立了三乡苏维埃政府，叶海清任主席，打纸铺建立了十乡、地仗寺建立了十一乡、沙河

北湾子建立了十三乡苏维埃政府。×××、汪迺康、曾殿甫等分别任主席①。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红军首克商城，成立了赤城县苏维埃政府。红色区域迅速向四面八方扩大，固始西南部草庙集一带的陈集、迎河集、老胡集、汉围沟等地的贫苦农民纷纷举行暴动。一九三〇年六月，在柴中营子（现草庙乡姜寨村）成立了固二区苏维埃政府，下辖八个乡苏维埃政府。建区时，在王染坊召开了二千多人参加的庆祝大会。由上级代表提名，大会选举了固二区苏维埃的领导人，叶兆荣当选为主席。区苏维埃所在地柴中营扎了彩门，贴满了宣传革命的红绿标语。区苏政府大门贴上了“来来来，分配土地；快快快，消灭敌人”的对联和“工农专政”的横楣。区苏主席报告了鄂豫皖根据地和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形势，宣讲苏维埃政纲，鼓励贫苦农民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固二区辖区东到草庙集，西到陈集，南到观音山，北到小胡集，方圆五十余里，一万余户，五万余人。同年七月为了统一商固边区的领导，在商城晏油坊建立了商固特区，辖商城五区和固始二区②。

二、固始东南部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皖西霍邱县革命政权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同时成立了区、乡苏维埃政府。固始东南部的张广、黎集，建立了一批乡苏维埃政府。在张广的长岗、上元建立四乡苏维埃政府（属霍邱县乌龙庙三区辖），在黎集湖、观音台、水帘洞分别建立了九、十、十一、十二四个乡

苏维埃政府（均属霍邱县叶集二区辖）③④⑤。

从一九二九年底到一九三一年初，我县建立了一个区级、十八个乡级苏维埃政府。这时的乡苏维埃政府，一般由九至十一人组成执行委员会（有的在执行委员中又产生三至五名常务委员），负责主持日常工作。主要干部有主席、秘书。下面还设有土地委员、赤卫委员、粮食委员、财经委员，负责各项具体工作。区苏维埃政府，选举主席，同时任命了土地、武装、妇女、财粮等委员。

三、固始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

一九三一年五月初，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皖西根据地得到恢复和扩大。在胜利的欢呼声中，五月四日固始县苏维埃政府在南部山区松树岗（今陈淋乡大营村）成立。陈亭阶当选为县苏维埃主席，军民一千余人参加了庆祝苏维埃成立大会。县苏内部机构很不健全，仅设有秘书，粮食、财经委员会等⑥⑦。县苏维埃建立后，区、乡苏维埃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先后新建立了五个区级、四十个乡级苏维埃政府。陈淋区（一区）辖十一个乡；武庙区（二区）辖九个乡；祖师区（三区）辖六个乡；力集区（四区）辖三个乡，汪棚区（五区）辖七个乡，在洪埠的大店、郭陆滩的刘楼建立了两个乡苏维埃政府。

从一九三一年五月固始县苏维埃政权建立至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西撤这段时间为固始县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全盛时期，县苏维埃政府辖六个区五十八个乡苏维埃，分布在我县陈淋、祖师、武庙、段集、方集、力集、张广、赵岗、张老埠、南大桥、郭陆滩、草庙、汪棚、胡族、城郊、洪埠

二十多个乡。此间，苏维埃的内部机构设置也日益完善。县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军区指挥部、第十政治保卫分局、革命法庭和交通、财经、内务、粮食、土地、文化教育、劳工等委员会。同时还成立了互教会、反帝大同盟等组织⑧⑨。

军区指挥部下设有造枪局、衣工厂；革命法庭下设有劳动改造队；文教委员会办有直属学校、剧团、医院等；内务委员会设有婚姻登记处、赤色民警局；财经委员会下设有经济公社等等。其它委员会也分别建立了相应的机构。与此同时，区、乡苏维埃政府内部机构设置也按照《鄂豫皖苏维埃临时组织大纲》的规定逐渐走向正轨。区苏维埃政府建有政治保卫办事处、赤色民警局、财经特派员、交通特派员、内务、文化教育、土地、粮食、劳工等委员会。乡苏维埃政府设有内务委员、文教委员、土地委员、粮食委员、劳工委员。各级苏维埃政府贯彻执行上级苏维埃政府的指示决议，根据权限，开展工作。

1、实行土地改革，彻底废除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是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一项重大任务。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我县苏区普遍进行了土地改革。

2、县苏维埃政府建立后，成立了军事指挥部，负责组织领导全县地方武装的军事训练和军事部署。

县建立了独立团，下辖三个营，一千余人（枪）；各区按照三三制的原则分别建立了赤卫团、赤卫营或独立营、战斗连；各乡、村均建立了赤卫队、战斗连或模范排。同时各地还将少年儿童组成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负责站岗、放哨、查路条，维护苏区的治安⑩。

3、在县财经委员会领导下，县、区、乡分别建立了经

济公社、消费合作社、货物交换所等组织。

县财经委员会一九三一年十月在县苏所在地的桥头店建立了经济公社，主任柯柳桥，设有采购和营业两个处，职员二十余人，批发、经销日用百货、布匹、食盐等，收购山区土特产茶叶、桐油、竹木制品、中药材到白区换取苏区军民需用的物资^⑪。

县财经委员会三一年秋 还在靠近史河，与安徽叶集毗邻，水陆交通方便的陈淋子办了一个经济公社，曾仲民任主任，会计刘光耀。经济公社开办有染坊、盐站、布百店、杂货店等，全社三十余人，流动资金约三万元。经济公社的经营方式是批发零售相结合，凡乡办的消费合作社均可到此批货，大大方便了群众^⑫。

各区也办起了消费合作社，负责区级财政开支和货物供应。二区经济公社主任吴少成，委员罗延生。二区经济公社在武庙集开了综合商店，经营粮、肉、布、百货及医药等，并在水注冲的秦围子建立了经济交换所，用苏区的土特产与白区的商人换取食盐、西药、布匹等紧缺物资^⑬。

有条件的乡也办起了消费合作社，凡入股的群众可优先购买合作社的货物，每月或每季度还可根据利润多寡分红。陈淋一区七乡在江家油坊开办了消费合作社，社长徐丙恒，八乡在后冲办了消费合作社，社长金玉村，社里出售布百、食盐、杂货，开有油坊、屠宰场。武庙二区五乡在迎水寺、三乡在武庙集、八乡在双竹园、十一乡在杨庙分别建立了消费合作社^⑭。其它乡也建立了经济组织，东部长兴集、西部的石庙集建立了消费合作社，南部段集的大沙地建立了经济交换所^⑮。这些经济公社、消费合作社、交换所为活跃苏区

经济，繁荣苏区市场，促进经济发展，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满足军民的物资需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4、在县文化教育委员会的领导下，全县文化教育和卫生工作蓬勃开展。县文化委员会一九三一年十月在政府所在地的蔡庙兴办了中学，林瑞祥任校长，王令山等任教员，招收学生一百余人^⑩。西二区兴办学校九所，区苏在瓦庙集西的张家碾坊开办模范学校一所，每乡办列宁小学一所，全区在校学生七百余名^⑪。二区一乡在坳口建立了列宁小学，学生三十余名，四乡在张老家建立了学校，在校学生八十余人。全县共建中小学三十余所，学生超过两千人^⑫。

教育事业所需的经费，由各级苏维埃筹款，贫苦农民子弟免交学费。学生除学习文化外，还学习军事常识，参加劳动，慰问军属，读报、演剧，帮助农民识字等。课本由文教委员会编印，废除了封建文化，实行男女同班。

为了搞好文化宣传工作，一九三一年十月在王家楼南院建立了县新剧团，李声芸任团长，张其华（女）任歌舞主任，全团四十余人，配合红军军事行动，到各地演出话剧、扭秧歌、唱苏区红色歌谣^⑬。区、乡也都建立了宣传队，列宁室在苏区也很普遍。西二区在区苏所在地的柴中营子专门挑选最好的五间房子，开办列宁室，陈放多种书报（刊），供人们阅读，以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

县苏维埃政府在王新房子北院建医院一所，院长叶正伍，护士长王义珍，任纯谷等任医生，设有门诊和病房，为红军和苏区人民治疗疾病^⑭。

与此同时，苏区的其他建设工作也都蒸蒸日上，蓬勃发

展。

四、坚持苏区的斗争

一九三二年十月，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转移，留下红二十五军坚持战斗在鄂豫皖根据地，我县人民随之转入保卫红色土地的斗争。

第四次反围剿中我县苏区遭到严重摧残，各级苏维埃政府几乎丧失殆尽，根据皖西北道委和道苏的指示，县委、县苏与赤城县委、县苏合并。这时我县境内苏维埃仅存皖西苏区中的三区（熊家河一带）和二区（窑沟、柳林、青峰岭一带）两个区级政权和部分乡级政权。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奉命离开鄂豫皖，在国民党残酷的反复清剿下，苏区完全丧失，苏维埃的干部和党员实行军事化、战斗化，在窑沟组成商北大队。不久，商北大队在县委书记石裕田的带领下去岳西，编入红二十八军。一部分伤病员和妇女在张泽礼等同志的率领下上了金岗台，组成商南县委、商南游击队，领导商固地区的人民开始了更加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②。

固始县苏维埃政权从一九二九年建立到一九三四年坚持六年之久。此间，各级苏维埃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使苏维埃的旗帜在固始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高高飘扬，在中华苏维埃运动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执笔人：张保友 阎峻

注 释：

①1958年党史调访记录。

②、⑩孙朝荣、柴维生、陆正付、苏挺海等老人回忆固二区苏维埃政权。

③《霍邱县革命斗争大事记》。

④霍邱县委党史办给固始县委党史办的公函。

⑤《张广乡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与发展》。

⑥《红四方面军战史》。

⑦民国二十年五月二日潢、光、固、息、商五县保卫团联防会长马××给南京国民政府的电文（国家第二档案馆存敌伪档案鄂豫皖部分）。

⑧陈淋、祖师、武庙、赵岗、南大桥、草庙、汪棚、洪埠等乡调访材料。

⑨《鄂豫皖区苏维埃临时政纲》（1931年7月）。

⑪、⑬、⑭、⑱《武庙乡党史大事记》。

⑫陈淋经济公社情况的调查。

⑮段集柳林经济合作社情况的调查。

⑯、⑳武庙乡赵阴安、徐开亭二位老人1986年的回忆。

⑰郭汉清：《回忆二区教育工作情况》。

⑲老红军战士史玉清：《回忆固始县剧团情况》。

⑳《皖西革命回忆录》载：林维先《红旗永不倒》；陈祥《艰苦的历程》；石裕田《忆赤城县委的斗争》；李春华《巍巍金岗台》。

罗山县苏维埃政权的 建立及各项建设的发展

中共罗山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

土地革命时期，罗山县的各级苏维埃政权，是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激烈的武装斗争，在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一建立，即着手制定各项制度，开展各项建设，从而使苏区面积迅速扩大，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后来由于张国焘推行“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苏区遭到严重破坏，被迫转入艰苦的游击斗争。

一、工农革命委员会

我县苏维埃政权未正式建立之前，曾出现过代行苏维埃权力的临时组织——工农革命委员会。

一九二六年夏罗山特支成立，从此，罗山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地开展了起来。特支成立后不久，城郊、罗南、朱堂店和九里关等地秘密建立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地主阶级，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穷人当家作主”、“实行耕地农有”等口号。^①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攻克武昌，把全国农运推向了新的高潮。我县农民协会发展很快，由秘密活动转向公开活动，开始向反动统治阶级和地主豪绅展开激烈地斗争。同

月，城郊农民武装红枪会杀了罗山县头号劣绅、河南省参议员方少尧；是年冬，罗山农民武装红枪会会同信阳等县武装农民数千人于武家坡全歼军阀魏益三炮团，拆毁大炮十余尊；年底，九里关农民协会同当谷山农民协会数百人，打掉了九里关税卡；一九二七年三月，朱堂店一带农民武装千余人，将当地头号豪绅、民团团长刘聚庭捉拿，捆往信阳柳林处决^②。这一时期，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农协会会员们，以空前的革命积极性履行农会的权力，惩治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对他们实行逮捕关押、游行示众、没收其财产。农民协会以自己的农民自卫军武装来保护胜利果实，行使了“农会政权”^③的职能作用。它是我县政权发展史上的“萌芽”时期。

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共罗山县第一次党代会召开，建立了中共罗山县委和城区、周党、罗南三个区委^④，进一步加强了党对罗山农民运动的领导。到一九二九年，罗山有组织的农民群众已发展到五、六千人^⑤，更为广泛地同反动势力展开激烈地斗争。

按照一九二八年七月召开的尹家咀会议关于“在黄安、麻城、光山、罗山、孝感、黄陂等县，在未建立正式苏维埃政权之前，先建立县农民委员会，作为临时政权机构，以建立和维护地方的生产秩序”^⑥的决议，一九二九年八月下旬，在宣化地区召开了工农兵代表会，建立了罗山县革命委员会，甘元景任主席^⑦。一九三〇年十月，红一军攻克罗山县城，在城内建立了罗山县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由七人组成，主席徐万发、副主席陈定侯（红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宣传委员李博安、组织委员蔡慕章、裁判委员张弄辰、肃反委员

杨光敏、没收委员姚抚民。与此同时，在徐堆建立了一个城区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徐恩久）和七个乡农民革命委员会④。各级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行使了苏维埃的权力⑤。一九三〇年春，宣化店地区所进行的一次土地改革和城区进行的土地分配工作，就是在各级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完成的。工农革命委员会工作的开展，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我县苏维埃政权是在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的。罗山县地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边缘区，在建立苏维埃政权时，已有根据地中心区域县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经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根据群众基础，召开工农兵代表会，一次性选举产生县、区两级苏维埃政府。再由区苏维埃政府召开代表会选举产生乡苏维埃政府。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下旬，罗山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宣化店召开，选举产生了“罗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宏良，后郑思广、潘天成。县苏维埃政府机关设在宣化店。同时，还选举产生了新的罗山县委会，徐恕凤任书记。在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同时宣布成立六个区苏维埃政府：一区苏宣化店（今属湖北大悟县），辖七个乡苏（包括后来发展的漆湖乡苏），区苏主席刘祖义；二区苏姚老沟（今属湖北大悟），辖乡苏和区苏主席待查；三区苏杨、万店，辖七个乡苏，区苏主席谢守俊；四区苏卡房（今属新县），辖三个乡苏，区苏主席阮德成（后为潘锡志）；五区苏潘新店，辖十一个乡苏，区苏主席房恒平；周党为县直属特区；

辖五个乡苏，特区苏主席刘全初^⑩。

我县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权的诞生，标志着工农革命委员会已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不久，鄂豫皖特委负责人王平章同志在宣化店主持召开了区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研究了扩大根据地（向罗北发展）及解决苏区粮食等问题。决定建立罗北工作委员会，以便加强对罗北工作的领导，郑新民任委员会主任，郑卓吾任副主任，余范文任秘书^⑪。在县特务营的协助下，青区苏维埃政府在小余湾宣告成立，主席甘席祯。区苏辖子路山，双桥、甘岗三个乡苏^⑫。在鄂豫皖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第二次“围剿”的大好形势下，罗山北部发展了近百里的苏区。到一九三二年秋，罗山县苏区的发展和苏维埃政权的建设达到了全盛时期，全县建起了区级苏维埃政权九个^⑬。

苏维埃建立之后，在省苏的指导下，县、区、乡三级苏维埃的机构设置不断健全和完善。县苏维埃政府下设文化、财经、粮食、土地等委员会及革命法庭、政治保卫局、交通局，军事上设有罗山县军事指挥部。为了更好的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还建立了县总工会、少共团、贫农团、妇女会、少先队、童子团、互救会、反帝大同盟等群众组织^⑭。他们在建设苏区和保卫苏区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当鄂豫皖苏区处于蓬勃发展之时，张国焘极力推行“左”倾错误路线，主力红军被迫撤离鄂豫皖区。苏维埃区域全部沦入敌手，全县九个区苏政权丧失的只剩下一个半区^⑮。到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六日，在商城豹子岩重新组编红二

十五军，使鄂豫皖区的革命形势稍有好转。七月中旬，红二十五军转移到我县朱堂店南北地区，清扫黑团，镇压反动分子，发动群众分配土地。恢复和开辟了一块南北长六十余里、东西宽四十余里的小根据地，并建立了朱堂店区苏和朱堂店、何新湾两个乡苏，扩充了一百六十多名红军战士，建立了一支有三十人枪的游击队和两个便衣队^⑩。红二十五军从罗山何家冲出发长征后，革命形势再次转入低潮，新建的苏维埃政权被迫解散，苏维埃区域变成了游击区。从此，罗山人民进入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三、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制度

我县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随着工作的开展，建立了各种民主制度，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成果。

1、民主制度。在选举方面，苏维埃组织法规定：“凡年满十六岁之男女而非剥削的劳动者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均由选举产生，“遵照一定比例选举之”，“乡一百五十人选代表一名，区五百人选一名，县五千人选一名”。“一年或半年改选一次，连选连任”。各级苏维埃代表的成份规定为：“工人占五分之二，农民及其它群众占五分之三，其中，妇女占代表人数的四分之一。”当选代表的条件是忠实勇敢，立场坚定，社会关系好，不消极腐化，没有地区观念和宗族观念。

各级苏维埃常委会委员的产生，先由各级党委提出候选人名单，经上级党委批准；然后由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选举时可另选名单以外任何人。常委会委员每届任期六个月，不称职或立场不坚定的可随时罢免，进行改选。

乡苏维埃委员的产生，先由党团开会研究，确定候选人名单，然后征求群众意见，再召开群众大会选举，以举手表决或鼓掌通过的方式，一年改选一次，连选连任，当选的委员百分之九十为党团骨干。

2、法纪制度。苏维埃政府严禁贪污、赌博等，对违犯者，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以批评教育、打屁股、服劳役直至判处徒刑或死刑等处理。群众中有打官司的，先经乡苏维埃处理，乡苏不能判决的可介绍到县苏法庭审讯。法庭解决不了，则开公审大会判决。

3、劳动制度。县区苏维埃干部一般都属脱产干部；乡苏维埃干部，除主席和妇女委员外，其余不脱产；村苏干部则均不脱产。

4、婚姻制度。苏维埃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反对封建买卖婚姻，反对童养媳。男女结婚时，双方到乡苏维埃政府提出申请，然后持乡苏介绍信到区苏政府办理登记手续。离婚的，也须到乡苏政府办理离婚手续。但离婚后双方在三个月内均不得结婚，如有和好的，还可重新登记结婚。

四、苏维埃区域的各项建设

罗山县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即着手进行政权区域内的各项建设工作。

1、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是苏维埃区域内首先开展的一项中心工作。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各级政府便有组织、有计划地宣传“土地政纲”和“土地法”，进行土地革命。我县苏维埃区域内自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一年春，普遍进行了土改，消灭了

封建制度，推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农民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生产率有了飞跃发展。

2、武装建设

地方武装是苏维埃区域的守卫者。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军事委员会便集中领导和大力发展地方武装，脱产的和脱产的农民武装组织普遍地建立起来，并不断地得到发展壮大。县建有赤卫军、独立团、特务营；区、乡建有游击队、赤卫队和脱产、半脱产的常备队、预备队。这些地方武装在保卫红色政权、巩固革命根据地、防止敌人抢群众的财产和到白区打击民团、配合红军作战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为红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县地方武装曾多次成营成团的被编入正规红军，仅罗山独立团就六次编入红军^⑰。据不完全统计，罗山先后有五、六千人参加红军^⑱。仅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罗山县委在三区苏冯河召开的五个区扩红会议，一次就有一千五百余人踊跃报名参加红军^⑲。

3、经济建设

县苏维埃政府特别重视经济建设工作。在宣化店开办有印刷所、修械所、被褥厂（该厂有工人三十余人），搞得最活跃的是潘新五区苏办的消费合作社（陈元之任经理），通过商贩到白区去销售苏区的土特产，购回苏区所需要的纸张、油墨、军用布匹等急需物资，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了苏区的经济。此外，还修复了许多塘堰和大小水渠，改造了山区长期以来的羊肠小道。到大忙季节，各乡苏发动农民组织共耕队、互耕队和突击队，帮助烈军属和劳力困难户及时耕种和收割。不少地方还组织有互助组、合作社。这些，都标志着苏维埃时期的农业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

期。

4、文化建设

随着农民物资生活的提高，苏区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县苏设有文化委员会，领导全苏区的文化、教育和卫生工作。在文化上，区、乡成立有宣传队、俱乐部等；在教育上，三区苏在杨店创办了一所列宁小学，有学生四十余人（一切费用均由公家负担），各乡村均办有识字班。至今我县一些健在的老前辈还是当年杨店列宁小学的学生。医疗卫生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县苏在宣化店设有县医院，铁铺大乘寺还设有红军分医院。该分院医生和看护人员有三十余人，他们除了医治红军伤病员外，也为地方群众看病，免收药费，因而，群众的医疗条件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苏区各项事业的发展，为巩固苏区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土地革命时期，我县建立的苏维埃，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完成了她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在豫南土地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注 释：

- ①见《信阳党史通讯》1984年第三期第9页。
- ②见中共信阳党史资料汇编《丰碑》第二辑第53页。
- ③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五辑211页。
- ④见《罗山县革命斗争史简介》第4页、第5页。
- ⑤见《郭述申巡视豫南报告》，1929年。
- ⑥见《麻城革命史资料》第一辑74页。

- ⑦⑩⑪见《罗山县革命斗争史简介》第7、8、9页。
- ⑧见《罗山县革命斗争史简介》第10页及城郊座谈材料。
- ⑨见《信阳党史通讯》1984年第三期第10页。
- ⑫见1983年10月青山座谈会综合材料。
- ⑬⑭见1931年10月9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鄂豫皖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及《信阳党史通讯》1984年第四期第10页。
- ⑮见1934年6月26日《鄂豫皖省委给鄂东北道委的信》。
- ⑯见1930年(曹大骏)《关于鄂豫边情况的综合报告》。
- ⑰⑱⑲见《罗山县革命斗争史简介》第31页。

执笔人：于勇书

光山县苏维埃政权的创建

中共光山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

光山县的苏维埃政权，是在创建柴山保根据地的过程中建立；在武装割据不断扩大的进程中发展；在整个鄂豫皖苏区政权建设发展到新阶段而相应地达到全盛时期。其机构设置也日益完备；革命政权下的各项事业都获得了蓬勃发展。

柴山保地区最早建立的乡级苏维埃政府，始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下旬，县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这是河南省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她的诞生，在豫东南地区政权发展史上开创了新局面。

一、苏维埃政权的初建

光山苏维埃政权的初建，是我党在鄂豫边区历经艰苦探索开辟柴山保根据地的必然结果。

1、一九二八年夏季，工农革命军第七军进入光山南部的柴山保不久，便开始对那些反对我党主动开展统一战线，继续坚持反革命立场，控制有一定数量土著武装的反动地主，在分化争取其部下多数之后，予以坚决惩治。通过瓦解反动的红枪会，打击首恶分子，消灭数股反动势力赖以支撑的地主民团武装，到年底，一部分地主、保长陆续逃跑，有的暂时接受了我们的统战。整个敌对势力已土崩瓦解，外来入侵之敌曾多次被打退，革命势力控制了局面，有足够的力量对剥削

者在普遍实行五抗（租、徭、税、债、捐）的基础上，废除地租剥削，没收一切出租的土地归佃农，实行谁种谁收。从而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扫除了障碍。

2、一九二九年春季，党在光山南部地区已建立起了弦南、弦东、弦西、殷区四个区委，基层支部已先于建立起来，党员有二百人。党在群众中已深深扎根。穷苦人已充分发动起来，并建立有穷人会、兄弟会、手艺会等群众组织和赤卫队、革命红枪会等群众武装。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培养出了一批骨干活动分子，做了必要的组织准备。

3、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前，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的、鼓动人心的土地革命宣传。例如在群众中普遍教唱易学、易懂、易记，易于调动阶级感情，启发穷人革命的歌谣；党组织议定许多激发穷人闹革命的宣传口号，如“打倒欺骗和屠杀民众的国民党政府！没收豪绅地主土地归农民！建立苏维埃政府！不缴租、不完粮、不上捐、不纳税、不还×人债！枪决保长！缴清乡团的枪！分配土地和工作给从反动军队哗变出来的劳苦兵士弟兄们！”（见特委何玉琳1929年5月7日报告）这些口号都曾达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的程度。同时，还印刷有油印刊物，如特委何玉琳主编的机关刊物《英特纳雄耐尔》，在第一期上就刊载有富于强烈鼓动性的“土地革命”，“被压迫民众的出路”等文章。还有戴季英主编的刊物——《群众》，如第三期刊载的题目有“穷人过年”，“农民极喜看，文字通体用土话白话，故效力很大”。这种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革命宣传鼓动，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4、白沙关暴动，一举歼灭反动地主武装数百人，为苏

维埃的建立进一步创造了条件。八月间，柴山保地区接连建立了三个乡级苏维埃，紧接着，在南胡家成立了弦南区苏维埃政府。到八月下旬，光山县苏维埃政府在大朱家宣告成立，参加大会的代表共一百二十多人。大会选举程炳煌为政府主席，土地委员秦汉文，武装委员付梅臣，审判委员郭步仪，财经委员王宗文，妇女委员陆汉清，内务秘书韩浚川①。

新政权在豫东南最先建立，连当时党中央就感到可喜。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向中央报告记载：“在光山现在许多乡村成立了苏维埃的组织，开始实行分配地主的土地，由乡苏维埃发给耕种的执照。”报告还进一步陈述：“光山有县委组织七人，同志约千余人”，“是农运最好的区域，……有组织的农民群众有三四万人”，“在短时间内可以召集有共二万的群众作武装的斗争”。上述情况表明，光山当时革命势力比较雄厚，以这些已经创建的红色区域作基础，去进一步扩大发展苏维埃政权的范围，已具备有相当好的条件。

二、苏维埃政权的发展

作为指导全县政权建设中枢的县委县苏建立之后，更大范围的区、乡苏维埃政权便进入有计划、有组织的发展阶段。光山当时的革命发展形势，据县委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报告：“①县南的豪绅被我们打倒后，有的跑了，反动势力整个崩溃；②县西区与县南相同；③县殷区反动派易本应被我们打败了，现在恐慌得不得了；④县东区长兴集一带豪绅完全跑了。”县委和县苏维埃采取适应形势发展的措施，使光山县的苏维埃政权建设由南向北迅速发展起来。

首先组织若干个工委、工作组进入党秘密活动地区，加强领导力量，传播建政经验，创造建政条件。工委或工作组的骨干来源有三个方面：①从县中北部党的秘密活动分子中挑选三十名同志，经特委党务干部学校培训后，参加白沙关暴动，经受了实际斗争的锻炼。②从县南已经建政的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抽出一批骨干活动分子，如王耕农、陈子州、韩家虎、付梅臣、占以锦、吴太清（女）、杨乐羊、张世纯、张世茂等都曾参加过派往县中部地区的工作，韩家虎后来就直接担任白雀区委书记。③特委从黄安、麻城两县抽派一部分同志，邱江浦、熊启飞、张敬霞、周启厚（后任望城区委书记）等，当时都曾分别参加工委或工作组负责。他们利用走亲戚，串朋友，做生意，看风水，给地主当长工等多种形式作掩护，以串连发动民众，秘密建立农会为前提，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很快使建政准备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其二，用武装割据发展苏维埃政权。根据光山当时的情况，扩大武装割据是在两种情况下进行的：一是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利用革命武装主动向反动地主武装进攻，扩大革命地盘，建立革命政权。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国民党内部发生蒋、冯、阎三军阀大战中原，进攻苏区的军队应调参与混战。红军主力趁敌守备空虚，主动向外出击；县苏维埃政府则集中领导和地方革命武装，成立了光山县农民赤卫军总队，并挑其精壮青年四百余人，配备快枪百余支，建立起了一支县、区脱产常备队。与不脱产的赤卫军预备队相结合，配合留下的部分红军一起行动，一面巩固根据地大本营柴山保，一面乘地主武装暂时失去国民党正规军的支持，由南向北，实行武装推进，横扫地主武装，摧垮反动政

权。元月二十九日，来合云率游击队打开白雀镇，击垮、重创魏苍洲、陈老五民团。农民协会组织公开，贫苦农民张顺益等二十余人参加游击队。二月十三日，游击队打开赛山寨，驱逐李茂楼、刘缙儒民团。游击队以白雀为基地，波浪式地向前推进，不久，相继占领双轮河、斛山铺、砖桥。与此同时，自二月二日（正月初四）开始，高敬亭率弦东区游击队由浒湾向北推进，沿途击溃数股地主武装。三月上、中旬，游击队配合“红三十一师与红三十二师一部，联合攻下光山南部的致和、大福、古耳三个地主山寨，并击溃光山县敌自卫团，缴枪二百余支。接着，红三十一师又先后攻占浚陂河、晏家河等地，消灭反动民团和红枪会各一部，缴获两批造枪机械；八十余名造枪工人自动参加了革命工作”。（见《红四方面军战史》第76页）通过武装占领，控制了光山中部广大地区。在此基础上，四至八月份，先后建立起了殷棚、白雀、双轮、砖桥、浚陂河、夏清、杨帆、望城八个区级苏维埃政权。二是在敌人大举围剿，根据地军民取得反围剿斗争胜利，扩大了割据区域，随即建立革命政权。如文殊、陈棚两个区苏政权都是在一九三一年五月鄂豫皖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建立的。

光山县从一九二九年八月开始至一九三二年六月止，先后共建立起了区级苏维埃政权十八个，相当县、区级的市苏维埃政权四个（新集、浚陂河、砖桥、白雀），总共有一百九十七个乡镇苏维埃政府。此外，还有一个商光边区革命委员会，下辖部分乡苏②。

光山县苏维埃的机构设置，是在边区政权建设日益完备的情况下健全起来的。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鄂豫皖边区在

新集召开了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光山县委书记高敬亭当选为政府主席。这次大会通过了土地法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经济政策、婚姻、劳动、青年以及苏维埃临时组织大纲等决议，标志着鄂豫皖苏区政权建设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鄂豫皖政府颁布的《苏维埃临时组织大纲》的实施下，是年秋，光山县苏维埃的机构设置已相当完备，下设有内务、文化、财经、粮食、土地等委员会，以及革命法庭、政治保卫局（王大鹏任局长）、交通局、县军区指挥部（戴季英任指挥长，陈子州任参谋长）。

三、革命政权下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第一项重大任务，就是实行土地革命，彻底废除地主阶级的土地剥削制度。全县先后实行了土地改革的乡共一百八十八个，占乡政权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点四。在土改运动中，还实行免债，当众毁掉地契、债卷、帐本。穷苦人免除了债务，分得了土地，住有房，吃有粮，一家饱暖，男女老幼，各得其所。全县青年参加红军的达七千余人。不脱产的赤卫队经常配合红军作战，负责维护地方治安，保卫苏区。儿童团站岗放哨。妇女组成宣传队。苏区内每逢庆祝胜利和纪念日、传统节日，都开展文化娱乐活动，跳秧歌舞、耍龙、舞狮子等。世代的愁眉苦脸变成心情舒畅的笑脸。从下面两首歌谣，即可看出翻身后的农民的心情：

分田又分地，自种又自吃。

分了翻身米，个个都欢喜。

学学文化课，走着革命路。

唱唱革命歌，人人真快乐。

×

×

万年冰山开了冻，

千年铁树开了花。

工农群众是一家，

大家齐心有办法。

地主豪绅、封建迷信都打倒，

土地还家，同心保田保国家。

谁敢破坏苏维埃，

我们坚决打倒他。

发展苏区经济，是夺取革命政权后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战胜敌人，保障红军的物资供给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府都十分重视苏区的经济建设，在艰苦的条件下发展农业生产，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以村为单位组织变工、换工、换耕，共同车水、下粪、播种、收割，为红军家属代耕。号召每人种五棵南瓜，发展家禽家畜，家家户户纺棉花织布，提倡发展农、牧、副业生产。农忙时，在战争许可的情况下，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分别下乡参加劳动。

财贸工作：在县苏维埃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的领导下，设有会计科、税务科、工农银行分行，并在白雀、浚陂河设置有国营综合商店。由上述机构分别负责经营、管理没收地主、豪绅、具有反革命行为的工商企业的财产和缴获敌军的货币、金融，以及对内、对外贸易，收缴私人工商税款，发放边区货币，组织信贷等工作。在一部分经济比较繁荣的

区、乡，还办有集体性质的消费合作社、农副产品采购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刘传颢、张殿强就分别在白雀、双轮两区担任消费合作社经理。如当地出产的松、杉木材，棉花、烟叶、土麻、茶叶、土布、棉线、竹器、皮张、蚕丝、中药材等农副产品，都由采购合作社经营，或在苏区内进行地区性余缺调剂，或集中上交经济公社，统一组织向赤白交界区联络外销，以换回军民需要的粮食、食盐、西药、细白布、染料、鞋、袜、红白糖、火柴等，除留作军用外，由消费合作社负责供应给群众。

经济建设的蓬勃开展，克服了敌人经济封锁带来的严重困难，对支援革命战争，改善群众生活都发挥过重要作用。

面向劳苦大众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是苏维埃政权的显著特点之一。一九三一年下半年至一九三二年上半年，普及工农群众的文化教育，在光山苏区内得到破天荒的发展。各区、乡开办了许多初级小学，有的称列宁小学。劳动人民的子弟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学校对贫雇农及红军子弟实行免费教育。为了体现布尔什维克教育的政治化，苏维埃政府规定，反对使用一切带有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教材，编写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模范课本，作为学校教材。例如：

“列宁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他一生都为革命工作。苏联的十月革命，是在他领导之下完成的。”同时，还把当时具有实际革命意义的宣传资料作为政治课的基本教材。例如光山县苏维埃文化教育委员会编印的列宁小学课本第二十六课课文：“你几时到新集去？我明天上波陂河去。”第三十四课课文：“我读了一个月的书，就能看介绍信。”列宁高等学校课本第八课课文：“我们的飞机来了，大家快来看飞

机。昨天向黄安县城抛了两颗炸弹，把敌人吓得发抖。这是红军的‘列宁号’飞机，一点钟能飞五百里路。”国语课文开始教应用文，学写介绍信、路条、通知等。还教有诗歌、散文，有热情歌颂共产党的文章，有宣传革命道理的文章。如“春风起，秋风凉，打倒地主不交粮”，就是当时比较流行的课文。

在社会宣传方面，各学校都组织有宣传队。为了适应战时环境需要，学生还轮流站岗放哨，巡逻守夜，星期天进行军事训练。对成人教育方面，采取发展以扫盲为中心的社会教育。这是当时苏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村都利用夜晚时间，以办夜校、扫盲识字班、读报组等多种形式，对成人进行文化教育。识字班教识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讲共产主义美景，教唱革命歌曲，如“工农闹翻身，参加当红军，英勇奋战杀敌人！学了文化课，看了列宁报，革命道理我知道”等等。此外，在干部教育方面，县委在徐畝还办有党训班。

在文化事业方面，县苏维埃政府在徐畝办有“音乐队”、“俱乐部”，波河、白雀市苏政府办有“列宁室”等。各区妇女会都有临时组成的宣传队，乡有宣传组。他们在集镇自编自演革命节目，自编自唱革命歌谣，在农村更为普及。宣传队还到医院作慰问演出，表扬歌颂红军英勇作战的革命事迹。有时宣传队还跟随红军到前线，部队每占一地驻扎，宣

传队即到群众中去宣传土地革命。通过这些有革命意义的文化娱乐活动，大大鼓舞了苏区人民的革命热情。

注 释：

①《新县革命史》，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九月版。

②《鄂豫皖中央分局报告》，一九三一年十月九日。

执笔人：韩宗德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光山县苏维埃政权的创建》主要附件

一九五一年鄂豫皖老根据地

河南部份调查材料节录

一九三〇年四月，光山县南部建立了白雀区苏维埃政权。一九三〇年六月四日，建立了泼河区苏维埃政权。以此两区为中心向外发展，在一两个月时间内，先后建立砖桥、双轮、斛山、夏清四个区苏，与南部五个区苏和商城苏区相联接，形成了大块的根据地。县苏维埃政府设于丁李湾，一九三一年初迁往徐畝。

一九三一年五月，建立了望城、陈棚、杨帆三个区苏，成为根据地的外缘区。光山县西南隅的黄湾等四个乡，曾于一九三〇年二月建立殷棚苏区。时光山县苏下辖内务、文化、财经、粮食、土地等委员会及革命法庭、政治保卫局、交通局、县军区指挥部。党群组织在中共县委会领导下，有少共县委会、总工会、贫农团、妇女部、反帝大同盟等。另设有兵工厂及各种训练班，规模很大。县境内大部分分了田。……有七千人参加了赤卫师。

《光山县志约稿》节录

二十一年五、六月间，赤×势力达于西北二区之横大路、张宋店、北向店；五区之刘家店、卧龙台、吴家寨；四区之仙居店、陈善楼、孙铁铺，皆闻风惊溃，民间土寨，直无守业可言。

付家明的回忆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我是一九三〇年六、七月份由白雀区苏介绍参加红军的。原在红四军十师二十九团。区里领导有个姓熊的（熊启飞），还有一个姓朱的，土地委员叫付家贵。

郭易后回忆白雀工委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一九二九年农历五月初六，党的活动从郭家河发展到白雀园。以韩家虎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开始进驻白雀镇，秘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准备向土豪劣绅作斗争。一九三〇年七月，工作委员会在白雀成立，主要任务是发展苏维埃，实行土地改革。

许盛荣的回忆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九日

我先参加游击队，后转入正规部队，在红四方面军七十三师二一九团。我是由白雀区苏维埃参军的。我记得沙窝集苏维埃政权先成立，紧接着白雀区苏政权就成立了。主席姓周吧，他以后也参军去了。这个时候县苏维埃政府在徐畈，还有砖桥、望城、南向店、晏河、南王岗、杨帆、蔡桥、张棚、槐店、油坊、斛山、双轮河、崩河坎都是红色区。这些地方都有区乡苏维埃组织，我在这一带打游击。当时都搞了分田分地。

李传载的回忆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四日

我民国十九年参加乡农会，地点设在桂畈。当时乡苏维埃主席叫桂国番，后来是李传柱。转新区苏维埃派有五个连的赤卫军守在扶桑店，我是曹长顺连里，还有连长吴志主，是吴大湾人，还有个连长叫刘景万。砖桥区苏维埃主席叫李传道。

槐店乡一九七八年普查材料

一九三〇年七月，望城区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在王南洋成立，区苏机关设在大地主王作廷家中，区委书记周××

(黄安人)，主席阙克向。下辖十二个乡苏政权，即西周湾乡(今王南洼)、宋桥乡、梅湾乡(现归泼陂河乡)、陈洼乡、张洼乡、草店乡、汪店乡、小刘湾乡、周湾乡、冯河乡、张岗乡、杨大湾乡。

一九三〇年六月，砖桥区苏成立，在今槐店乡东北部发展有王畷、扶桑店、官围孜、油坊等四个乡苏政权。

熊庭志的回忆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二日

杨帆区苏维埃政府是在民国十九年七月建立起来的。在未建立以前，红军游击队和夏清区的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在那一片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不久晏河一带乡苏维埃建立起来了，才向杨帆发展。开始是县苏维埃政府派来陈维寿等六个同志为工作组，在杨帆南头河沙滩召集贫雇农群众会，宣传土地革命的政策，动员乡农会中的青年参加赤卫军。

吴太清的回忆

我是新县人，民国十八年在家乡入党，后到夏清区黄板桥一带劝党。民国二十年，和曾汉清、王右清、张国清等七个女同志，随红军到文殊街上建立了文殊区苏维埃。因这里头一年就建立了几个乡苏维埃，工作很方便，很快又建立了陈棚区苏维埃。

新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中共新县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

新县位于大别山腹地，鄂豫皖三省边陲，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红军的发祥地之一。

新县苏维埃政权的创建始于柴山保根据地的开辟。早在黄安失守后，吴焕先、石生才、曹学楷、徐朋人等就曾多次来到柴山保地区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先后在曹湾、梅花、程七、代岗、大吴家、胡子石、王湾等地建立了党的支部和党小组，共发展党员五十多人。

一九二八年，工农红军开辟柴山保后，七月召开的尹家咀会议决定“在恢复老区工作的同时，开展柴山保地区工作”，以便“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立足点，作为对敌斗争的依托。”接着红三十一师第一、二两个大队南下黄麻老区开展斗争。十月中旬，在王树声、廖荣坤等领导下，田铺、酒店等地农民，配合一、二大队，消灭了何铺乡段暇清乡团，随即又攻下杨泗寨，击退麻城驻敌一个营的进攻。到年底，黄麻北与我县南部地区的大部分地方，重为革命势力所控制，柴山保以西之官堰保等地区，工作逐步展开，为实现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创造了条件。

尹家咀会议还决定，一般群众组织统一为农委会。在弦南区委领导下，弦南区农委会于一九二八年秋在柴山保成立，主席尹良太，委员有程炳琛等。光山县农委会于一九二八年

十一月在新县芦家山成立，主席程炳璜，委员有芦从珠、吴文宝等。到一九二九年春，我县各区、乡（含弦东、弦南、弦西、箭河、酒店等地）农委会相继建立。各级农委会成立后，就成为代行各级政权的领导机关，开始筹备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白沙关暴动后，柴山保地区相继召开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建立新政权，先建立乡苏，后建区苏，再建县苏。一九二九年八月间，首先在柴山保地区建立了三个乡苏和弦南区苏维埃政权。一乡苏在胡子石建立，到会代表八十多人，投票选举王功才为主席。二乡苏在大朱家成立，主席曹华容（后为朱瑞义）。三乡苏在梅花店，主席王成富。不久又在南胡家选举产生了弦南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尹良太，委员程炳璜、张厚礼、刘明晓等。区苏先后迁冯塆、罗氏祠等地办公。弦南区苏建立后，四乡苏（郭家河）、五乡苏、六乡苏、七乡苏、八乡苏、九乡苏亦相继建立。

一九二九年八月，光山县苏维埃政府（所辖的弦南、弦东、弦西、八里、沙窝、千斤、新集市全部及河区、夏清区和紫云、乘马的一部或大部均属今新县范围）在新县大朱家宣告成立。在庆祝柴山保地区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大会上，人民无不欣喜若狂，载歌载舞，激情满怀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庆祝工农民主政权的成立！”

白沙关暴动后，紧接着党又于七月中旬胜利地领导了卡房农民暴动。一九三〇年春即在卡房地区建立了三个乡苏和弦西区苏。一乡苏在谭洼，二乡苏在卡房东堂，所辖范围有卡房（现卡房村全部）、居畝村、古店以南地区。后来王畝亦并入。三乡苏在牛冲。一九三〇年五月间，在东堂召开弦西区苏维埃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约有五千余人，大会选举尹

良太为主席（见附件一、二、三、四）。

一九三〇年上半年，还成立了弦东区苏维埃，主席是付梅臣。下设五个乡苏：一乡苏董店、二乡苏斛山、三乡苏水塘、四乡苏彭大湾、五乡苏代咀（见附件五）。

在此之前，紫云和乘马区也先后建立了区、乡苏维埃。紫云区有一乡苏（包括詹湾、曹冲、石岗、箭河、代湾）、二乡苏（杨家畝）、三乡苏（油榨湾、汪墩）、四乡苏（塔尔岗、汪家岗）等，乘马区有四乡苏（王楼）、六乡苏（何铺）、七乡苏（黄土岭）、九乡苏（计河）等，现在都属新县范围。

到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弦南、弦西、紫云、乘马各区苏维埃政权普遍建立；弦东、八里靠南的部分地区均已建完。唯新集和县北一带敌占区，反动势力联防森严，工作进展十分困难。尤其是千斤、吴陈河等地（谓之白区）民困、土匪、豪劣反动势力甚为猖獗。于是，党组织决定发展武装割据，由南向北，武力推进。同时，派出骨干力量协同活动在千斤杨高山的杨乐羊、余店的余梦痕及八里、吴陈河等地党的负责同志开展工作。

一九三一年二月上旬，红军打开新集（今新县城）后，将其划分三个管理区，随即建立了管理区苏维埃。一区苏（现工商联旧址），主席吴隆胜、盛长庆；二区苏（在原城关镇所在地），主席秦汉文（女）、汪泽吾；三区苏（在县城南头老理发店隔壁），主席何从福。三月底，新集市苏维埃宣告成立（地址在原城关镇），市苏主席刘顺全（见附件六）。五月，在八里的长河柳林召开成立八里区苏维埃大会，到会的有五千余人，并有文工队奏乐，热烈庆祝新政权的诞生。八里区共辖八个乡，一乡在冯楼（一说余冲）；二乡在西河；

三乡在嵒山；四乡在黄湾；五乡在郟道；六乡在神桥；七乡在李南冲；八乡在熊河（一说毛铺）。六月间，沙窝区和河区的苏维埃分别在沙窝和泼河（泼河今属光山辖）建成。沙窝区下辖杨畈、冲洼、黄家洼、沙窝、马庄、香米碓、沙坪、潘店、朴店等九个乡苏。河区下辖九个乡苏，其中一乡苏（郑店）、二乡苏（苏畈）、三乡苏（管郑河）今属新县范围。

八月间，红军攻克了吴陈河地区各山寨后，根据地向北扩展，在晏河建立夏清区，共辖九个乡苏，其中吴尖山、扶南湾、阳土墩、邱店四个乡苏今属新县。九月，地方武装配合红军包围了千斤的大山寨和打油尖寨。打下大山寨、打油尖寨后，又接连拔除杨山寨、龙石寨、天星寨、邵新寨等十余座反动堡垒，人心大快，当地群众唱道：“千斤九里十八寨，红军一扫寨寨开”。冬，在杨店召开庆功大会，并宣告千斤区苏维埃政权成立，区苏主席施传胜。下辖九个乡苏：一乡苏胡冲，现属陡山河乡；二乡苏北杨湾；三乡苏大吴湾；四乡苏王洼；五乡苏杨店；六乡苏余店；七乡苏沙石湾；还有今属苏河乡的八乡苏夏店、九乡苏墨河（见附件七）。

到一九三一年底，新县苏区的发展和苏维埃政权建设达到了全盛时期。新县建立区苏十个，乡苏六十四个，村苏五百多个。

一九三二年秋，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红四方面军被迫西撤，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大部分地区也随之丧失了，我县根据地只剩下箭河、郭家河、酒店、田铺、城郊、代咀、陈店、八里、沙窝等几块地区。

在最困难的紧急关头，夺回政权，保卫政权是当务之

急。十二月高敬亭率部由商城到周河一带恢复了区苏维埃，
区部设在牛冲。

一九三三年元月十八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日）起，卡房地区一些主要村庄相继被敌占去。此时，弦南区与罗山西区区委、区苏维埃等机关都迁往卡房地区牛冲一带大山上，罗山四区（即卡房地区）下辖三个乡苏维埃，区苏主席潘锡志。一乡苏卡房，主席林大义；二乡苏胡河，主席胡三来；三乡苏牛冲，主席张宗刚。五月，牛冲又被敌占领。于是，县、区、乡各级机关便随罗山独立团（十六团）进行游击活动。不久，十六团编入红二十五军，区、乡干部即转为便衣队，分散活动，与敌斗争。

一九三三年七月鄂东北道委成立，我县的一些区苏亦先后恢复。如弦西区苏（卡房一带）设在牛冲，主席胡三来。下辖三个乡苏，分别设在牛冲、胡湾、古店、底河等地。七月十七日，敌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正式开始，原存在和后来恢复的苏维埃政权遭强敌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我县党组织决定广泛地建立便衣队，使党的活动和政权的工作得以坚持下去。此时，苏维埃政权的正常活动不能开展，原来的区、乡苏负责人、共产党员不能归来，就带着乡政府的印章到处走，走到哪里，乡政府就在哪里办公。

一九三四年秋，根据地绝大部分都已沦陷，完全成了白区，唯以卡房为中心的天台山、凌云寺、连康山等大山继续为我所控制。各级苏维埃干部都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开展游击战争。从此，苏维埃这种政权形式就被党政军合一的便衣队所逐步替代。

新县苏维埃政权，自一九二九年建立到一九三四年底前

后坚持六年之久，为广大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做了大量的艰苦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与此同时，游击队、赤卫军等地方武装和各个群团组织亦先后建立健全起来，在建立和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说明：整理此文除根据附件外，主要参考了《新县革命史》（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九月版）。

执笔人：杨传锋

附件一

卡房乡老人张宗月、黄永福的回忆

民国十八年阴历六月十三日早晨，卡房农民组织起来打了卡房、黄冲两处的反动地主武装。从此，卡房的革命就公开了。

民国十九年春，这里开始建立了苏维埃。共三个乡：潭洼为第一乡，卡房第二乡，牛冲第三乡。我乡主席叶道增，秘书林正义（后林正柏），财粮委员林培发，土地委员谭炳林，武装委员邓永言，我（张宗月）任宣传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妇女委员余文英。

成立乡苏不久，四月初，又在东堂召开成立弦西区苏维埃大会。这次大会很热闹，有湖北的、有弦南区等地的代表参加。当时，弦南区的人抬来了很多整猪，上面装着大红花，还送有贺喜匾，并带有宣传队，会上宣传队演唱了《八月桂花遍地开》等歌。

在区里工作的有尹良太（区苏主席）、陈子舟（区委书记）、方思达、王功再、姜子臣、叶绪康、叶绪广、胡应堂、王用芝等人。各任什么职务记不清，只记得区妇女委员是居何采，武装委员王宇堂（何山王注人）。

四料湖

附件二

卡房乡谭佑伯的回忆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三月间，我们这里就成立了第一乡苏，在谭注祠堂开的会。主席胡廷解，他是胡河人。在群众大会上选举的。常委林培发，秘书姜子臣，妇女委员姜子兰，财粮委员胡大全，武装委员林道生，宣传委员叶道增、林正义。

附件三

五料湖

卡房老红军张崇礼、张崇志和李明简、李树奎的回忆

民国十九年二、三月间，我们这里在东堂成立了乡苏，四月间又在这里成立弦西区苏维埃。成立区苏前，开了七天会（筹备会），由各乡苏委员和代表参加。当时张崇志的妻子胡青福和张崇志的五弟媳黄青洲参加。开大会时，尹良太、李本矿、林培发、胡大径、叶道增等讲了话。当时参加大会

的约有五千余人，李明简、李树奎当时是童子团，扛着木枪，排着队参加了一天的大会。

附件四

余文英的回忆

民国十九年三月至四月初（桃花已开罢了），我们这里开始成立乡苏。当时乡苏在东堂庙西边屋内办公，区苏在正殿办公。区苏成立半个多月后迁往郭店，到秋下，乡苏又迁往庙岗，后又迁往蛤蟆墩。民国二十年，三乡改为第一乡苏。

注：余文英，卡房乡人，一九三〇年弦西区二乡苏妇女委员。

附件五

郭店乡周钦平、张永

郝、吴先志、周应寿的回忆

弦东区苏在邱湾成立，是一家大地主徐富源的房子。区苏负责人有江楷东、梅光荣、付梅臣等。秘书林隐臣，区苏主席付梅臣，妇女委员秦汉文。打开新集后，区苏挪到圪洼。区下设五个乡苏，我们乡属二乡苏，在邱堂一个庙里办公。乡苏有七个委员：周钦发（文化）、方厚珍（粮食）、

蔡少姬（妇女）、还有余凤贵、徐贤学等。乡苏主席占正富，秘书蔡宏新。

附件六

吴芝兰的回忆

一九三〇年腊月二十三日（阳历是一九三一年春）打开新集城后，分三个区，接着建立三个区苏维埃。一区苏主席吴隆胜、盛长庆，二区苏主席秦汉文、汪泽吾，三区苏主席何从福。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成立新集市苏维埃，市苏主席刘顺全。市苏下有贫农团、市工会、少共国际团、童子团等组织。

附件七

千斤乡老人杨光禄、余定怀等回忆

一九三一年秋，打开打油尖山寨后，先建立乡农会，紧接着就建立乡苏、区苏。区政府设在千斤杨店祠堂，区主席是施传胜，经济委员杨德雨，秘书杨家顺等。区苏下设九个乡苏，杨店是五乡苏。

光山县的土地革命运动

中共光山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光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于一九二八年秋至一九三二年秋进行了为期四年的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首次摧毁了沿袭数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土地革命前光山县基本情况

土地革命前，光山乡村同其他地区一样，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雇农民则很少占有土地，甚至根本没有土地。在县西南的殷区，曾、蓝、岳、傅等二十余家大地主霸占了殷区百分之九十的田地、山林、竹园。当地有一首民谣反映了地主霸占土地的情形：“青龙河边到牢山，曾、蓝、岳、傅都占完。岳家的水田，傅家的竹园，蓝家的森林，曾家的炭山。”^①封建地主阶级凭借这种土地私有制，对广大贫苦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手段极为残忍。

索取高额地租，是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手段。农民租种地主的田地每年要缴纳六成甚至更高的地租。除此之外，还要服无偿的劳役和附交各种租税。

放高利贷，是地主盘剥农民的另一种毒辣手段。水旱灾

荒的年份或青黄不接的季节，农民生活困苦之际，便是豪绅地主趁火打劫之时。他们不顾人民的死活，加大利息，大放高利贷，刮起民脂民膏。当时，白雀区就流传着这样一句歌谣：“高利盘剥重租砍，压得农民筋骨断。”可见，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是何等之残酷！

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更是多如牛毛。当时，在光山有“民团牲畜捐、户口捐、枪弹捐、斗行捐、关卡税、厘金税、自治费、屠宰捐、烟酒印花税”等几十种捐税。各种捐税必须按期缴纳，并“预征至民国二十一年”②。

在封建统治下，农民身受地租、高利贷和各种捐税的重重盘剥，被迫失去土地，卖儿卖女，流亡他乡。加之军阀混战，田地荒芜，村庄被毁，农民终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无力改进生产，农业生产日趋萧条，农民生活每况愈下，大部分农民沦为长工、佃户和乞丐，就连自耕农也难得幸免。当时，光山大半的自耕农不得不另外租种别人的田地变为半自耕农。积债累身，逼到卖掉自己所有的土地，还清欠债以外，剩余的只够租种地主的田产的押金，而变成完全的雇农了③。

这些表明，封建土地制度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是农民陷于贫困和社会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彻底砸烂封建土地制度，变革生产关系，解除封建剥削和压迫，是光山人民的强烈愿望。

二、土地革命的发展与土地分配

一九二七年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毛泽东同志在“八七”

会议上提出的对《农民宣言》中明确指出：“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④“八七”会议的召开，揭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给光山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正确方向。

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鄂豫边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麻起义。一九二八年春，起义中诞生的工农革命军进驻光山南部柴山保地区。党和红军在这里找到了一个稳定的立足点，开始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开辟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

光山县土地革命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二八年秋工农革命军进驻柴山保不久到一九二九年底，是光山县土地革命的酝酿、准备和初步开展阶段。在这期间，党领导光山人民进行了减租减息，开展了“五抗”斗争，并在开创根据地初期开展了打土豪的斗争，土地分配开始在县南部进行。

工农革命军进入柴山保后，由于当时革命力量还很薄弱，处于游击作战阶段，不足以直接摧垮反动统治而实行土地分配，党和红军发动农民进行减租减息，镇压反革命首恶分子，帮助农民建立农会，发展党的组织，为开展土地革命创造条件⑤。

一九二八年七月，党和红军在柴山保召开了尹家咀会议，决定“普遍实行五抗（抗租、抗裸、抗税、抗债、抗捐）与没收地主、反动派的土地财产同时进行。”由于当时赤白对立，反动统治有相当势力，加上战争频繁，局势动荡不安，在光山实际上只开展了“五抗”斗争，而未能实行土地的没

收。

一九二九年春，中共光山县委正式成立。为了给开展土地革命创造有利条件，县委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实行男女平等”等口号，领导全县人民开展打土豪的斗争。三月，县中北部白雀、砖桥、泼河、晏河、槐店、文殊等地几百名革命分子，随同县委机关前往柴山保⑥，接受党的培养和革命斗争的锻炼。后来又各自返回家乡，投身于土地分配的激流之中。

五月，鄂东北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根据“六大”精神，制定了《临时土地政纲》，决定没收地主豪绅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已佃者拨给佃农耕种，未佃者分配给无地农民、失业工人和退伍士兵。随后，红军开始出征外线作战，实行土地分配，把土地革命推向深入。在这大好形势下，土地革命在县南部已经展开，六月至十一月，南部的柴山保、观音保、官堰保地区先后进行了土地分配。

土地革命的深入，使革命战争获得了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军于六月、八月、十月连续粉碎了敌人的“三次会剿”。在这期间，红军往返转战，歼灭了不少反动武装，而且每到一处，即宣传革命主张，发动群众，镇压土豪劣绅，开仓分粮，号召农民起来进行土地革命⑦。

十一月下旬和十二月底，鄂豫边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分别在光山南部胡子石和细吴家召开。这两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土地问题，作出了《群众运动决议案》，制定了《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细则》的颁布，标志着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形成了一条正

确的土地革命路线。从此，我县土地分配进入全面展开的新阶段。

第二阶段：一九三〇年春至一九三一年四月，是光山苏区土地革命大发展时期。在这期间，党领导人民按照《细则》确定的政策，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分配运动，砸烂了封建土地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早在一九二九年六月，光山南部柴山保地区根据《临时土地政纲》先后进行了土改，分配了土地。随着革命力量的壮大和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土地分配由县南向县北逐渐推进。

一九三〇年是光山县苏维埃政权大发展时期，分配土地是苏维埃政权的中心任务，是革命的基本内容。苏维埃政权建到哪里，土改就在哪里蓬勃展开。在这一年里，殷区、白雀、双轮、砖桥、浚河、望城（今槐店）、夏清（今晏河）、杨帆等区基本上都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分配了土地。土改开始较早的白雀、砖桥、浚河、双轮等区的大部分多到一九三二年秋，收割了五季庄稼^⑧。其它地区有的收获四季，有的只收获二季或一季。

一九三一年春，文殊、陈棚在已建立乡苏政权的基础上，成立了两个区苏，先后亦进行了土地分配。

在党的领导下，土地分配由各级苏维埃政权机构中的土地委员会具体负责进行。分配土地的方法，一般采取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是打土豪、毁契约。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和斗争地主、豪绅分子，对罪轻的抓来问罪和游行示众，对罪大恶极的予以枪决，并举行群众大会，当场宣布没收其财产，令其

交出田契借票和帐本，当众烧毁，“从政治上把地主豪绅阶级的威风打下去，把广大农民的腰杆撑起来。”

其次是调查人口及土地状况，确定分配标准。逐户登记人口，并根据当时田地的肥瘦、水源和离村远近评等级，丈量面积，造册登记。

其三是划分阶级。这一时期，边区还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各区在具体作法上不尽一致，但基本上都是根据占有土地情况和是否存在剥削以及剥削的程度进行划分的，一般确定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五种成份。当时潞河区是这样划分的：以拉纤、推车、肩挑为生活的是苦力工人；打长工，没有田的是雇农；有点田，大部分生活来源靠租田种收入的是贫农；自耕自种，自劳自食，不剥削别人的是中农；有轻微剥削的是富裕中农，自己也劳动，部分收入靠剥削的是富农；不劳而获的是地主⑨。

其四是分配土地。区（市）苏维埃派人到各乡，同土地委员一起召开农民代表大会，按土地分配标准当场公布各户分配面积。并将户主姓名、面积、田界写到木牌上，由土地委员带领群众去田野插牌分配，指明田界。最后，由乡苏维埃政府发给土地使用证，明确土地使用权。

由于当时各乡村田地面积多少不同，在执行中采取了以村为单位“田多多分，田少少分”的分配方法⑩。各村农民平均分得的土地有一斗、二斗、三斗不等。在一些地方，柴山地也分配进去了⑪。红军官兵的家属在分配土地时，得到照顾，多分田，分好田。乡苏维埃组织人力帮助代耕，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官兵的斗志⑫。

第三阶段：从一九三一年五月张国焘左倾错误路线开始

贯彻，到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西撤。在这期间，张国焘推行极“左”路线，给正在巩固发展的光山土地革命运动造成一定的损失。

一九三一年四月，张国焘来到鄂豫皖苏区。他以极“左”的土地政策全盘否定土地革命已经取得的成果，认为“土地革命的利益，大部分被豪绅地主富农窃去了，雇农、贫农、中农、工人（要土地耕种的）没有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要求“地主阶级和富农土地应全部没收过来。地主阶级土地没收后，不能取得任何丝毫的土地，富农如果要耕田地，可分给以较坏的劳动份地，但必须以自己劳动去耕种。”^⑬决定不问已否分配土地的区域，概须发动群众，按新规定（人口与劳动力混合起来）重新分配土地。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错误路线只是贯彻精神，多数地方并未实行，在少数地方曾产生过坏的影响。

一九三二年秋，敌人又开始了第四次军事“围剿”。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红军几战失利，于十月份西撤。至此，光山人民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不得不告一段落。

三、土地革命的重大意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光山县的土地革命，尽管遭到“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但始终是按照土地革命的基本要求，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地主占有土地的剥削制度，满足了广大贫苦农民数千年来对土地的强烈要求。据统计，全县十八个区苏和相当于县区级的四个市苏所辖范围内，计有一百八十八个

乡苏实行了土地改革。其中，今属光山县境的殷区、白雀、双轮、砖桥、泼河、望城（今槐店）、夏清（今晏河）、杨帆、文殊、陈棚十个区苏，九十三个乡苏实行了土地分配，有100238人分得了田地，分别占当时乡苏政权和管辖人口总数的91.2%和88.78%^①。人民分得了土地，并成为土地的主人，极大地调动了人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改善了人民生活，广大农民群众更加自觉地拥护红军和苏维埃。红军攻打潢川仁和集时，白雀区人民男女老少齐上阵，驮背肩担，从几十里远的后方给红军送饭，解决了红军和光山赤卫师近万人的吃饭问题^②。土改后，光山县委和各级苏维埃政府进行了扩大红军的工作，一批批优秀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殷区先后有三批计一百一十余名青年参加了红军。他们当中，有的成为优秀的红军干部，有的成为著名的抗日英雄，有的成为我军的高级将领，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宝贵贡献^③。

事实证明，我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无论是作为对沿袭数千年封建土地制度彻底否定的第一次伟大的成功的尝试，还是对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支援革命战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 释：

①②见《殷区普查资料》。

②《鄂豫边特委报告》，1930年1月10日。

③见《东方杂志》24卷16号《各地农民状况调查—光山》，载于王全营《鄂豫皖苏区土地政策的演变》。

④见须立《鄂豫皖苏区的土地革命》（初稿），载于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时期工商税收史料选编》下册。

⑤⑦见《第四方面军战史》。

⑧见《光山县革命斗争大事记》。

⑨白雀鸡冠大队黄土垮付传钱谈话记录。

⑩见《渡河乡志普查资料》。

⑪原成都军区司令员尤太忠谈话记录，1982年4月12日。

⑫原重庆市纪委第二书记滕定金谈话记录，1982年4月21日。

⑬白雀土庙村邹大湾贫民恢复团谈话记录，1985年10月13日。

⑭见鄂豫皖军委总政治部《怎样分配土地宣传提纲》。

⑮见光山呈报苏区县资料《报告》。

⑯见《白雀乡志普查资料》。

执笔人：刘德忠

新县土地革命情况简述

中共新县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

大革命前，我县土地占有极不合理，据统计，占全县总人口百分之六点六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十万八千三百七十四亩，为全县土地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其中，极少数地主、富农，在该区占有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七、八十，甚至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占全县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仅有土地二万八千四百七十八亩，占全县土地总数的百分之十一。点八。柴山保地区，人口不足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陈寿堂、王成君、杜子元、吴文璐四家大地主，每人平均占有土地四十一亩，而贫农每人只占地二分半。全县土地到处都由地主所霸占。“东有彭颂臣，西有黄吉安，北有李挽澜，南有石子谦。”新集城还有曾远卿、刘俭甫。这些南霸天、北霸天，霸占大量土地，利用这种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对农民进行极其残酷的经济剥削。地租是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形式。地租剥削一般占土地产量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高的竟达百分之九十。箭河南程家河贫苦农民方志清，租种大地主石子谦三亩五分地，每年交租子一千五百斤，几乎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九十。卡房贫农吴长青，一九二四年，租种大地主黄吉安山谷梯田一石八斗，照租约每年交租二十石。在那时，山间梯田常年产量每斗田（半亩）只能产一石谷（丰年稍多一些），而黄家的租额是按丰年确定的，本来就不可能交全租。这年又遇上大旱，一石八斗田，吴长

青只收了六石四斗谷。但黄家却硬要二十石租。结果，逼得吴家倾家荡产，也只能交上十八石谷。

除了地租剥削外，地主阶级对农民还进行凶残的高利贷盘剥。地主将收的租子囤积于家，以高价卖给或高利借给农民。农民向地主借粮，以年为期，借一石，利息一石甚至一石五斗；以月为期，利息两斗。周河大地主彭颂臣，每逢荒年，打开粮仓，高价售粮。他原来每年收五百石租，不几年发展到一年收一千七百石租。

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下，劳动人民日益贫困，长期挣扎在死亡线上。“现时主要的是要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几千百万农民自己自下而上的解决土地问题，而共产党则应当做这一运动的领袖，而领导这一运动，并且共产党应当在政府中实行一种政策，使政府自己赞助土地革命之发展的政策。”（“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在党的领导下，我县广大农民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的四年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随着鄂豫皖根据地的开创、发展和统一，我县的土地革命也经历了“谁种谁收”、开始分田到全面分田的过程。

一九二八年五月至一九二九年四月是我县土地革命初期实行“五抗”，土地谁种谁收阶段。

一九二八年七月鄂东党组织召开的尹家咀会议，就土地问题作出了普遍实行“五抗”与没收地主、反动派的土地财产同时进行的决定。

秋季，鄂东党组织为适应佃农的要求，制定了“谁种的田归谁收去”，没收豪绅地主反动派的土地财产，照人口分给贫雇农。自耕农不分土地进去，也不拿出来，没收富农好

的土地，分给不反动的小地主以坏地，但无所有权的土地分配原则。

一九二九年五月到年底，根据地迅猛发展，土地革命开始了以分配土地为中心内容的新阶段。

一九二九年五月，鄂东北特委第二次联席会议，根据“六大”关于土地问题的精神，制定了鄂豫边区第一个土地法令——《临时土地政纲》。《临时土地政纲》共两章十一条。其中有关没收的条例规定：“凡地主所有之土地得一律没收之；凡豪绅所有之土地得一律没收之；凡经肃反委员会宣布有反革命行为者，无论已否惩办，其所有之土地得一律没收之。”这一规定改变了“谁种谁收”的没收办法，将没收地主佃田，不没收非佃田，改为没收地主一切土地，这就将地主所霸占的土地基本夺了回来。

《临时土地政纲》颁发后，半年左右时间，我县南部地区的柴山保、观音保、官堰保及箭河等地区土地分配基本结束，田铺、酒店、周河等地正在紧张地进行中，其他凡已建立苏维埃的地区亦逐步开始了土地分配。

一九二九年底至一九三一年春，是我县土地革命全面开展阶段。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鄂豫边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定了《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细则》在《临时土地政纲》的基础上作了许多重要的修正和补充。

一、《细则》规定，不仅对豪绅、地主、反革命分子所有之土地一律无代价的没收，而且规定“凡祠堂、庙宇、教堂、祖积、公积所有之土地及一切公产官地一律没收之”。

这样就合理地扩大了土地没收的范围，增多了农民土地分配量。对富农，确定分配其剩余的土地，以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

二、为了分化敌人和有利于团结多数，《细则》规定，反革命家属无反动嫌疑者，可以分给土地；无反革命嫌疑而逃亡在外者，其土地财产由当地乡农会代管，待其返回后即交还之。

三、确定了联合中农的策略方针。《细则》规定：“没收和分配时，不得侵犯自耕农利益。”“中农在别乡之土地交别乡分配，本乡得以同量之土地分给该中农（如无土地调换别乡不能分配）”。

在《细则》精神指导下，一九三〇年春以后，我县的土地革命运动便全面开展起来。当时鄂豫边的土地革命在我县箭河一带搞试点，曾在黄谷畝召开会议，郑位三作了报告，吴焕先具体领导这一工作。分配土地的步骤，是根据各村土地总数，按人口平均，划出成份，再分土地。各地分配土地的基本作法是一致的，由于各地人口、土地数量不等，所分土地数量稍有差别。一九二九年冬，曹门进行土改时，是先提取红军田、政府田作为公田，其余的土地好坏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当时曹门每人平均分田二斗。柴山保地区分田办法是“中间不动，两头平分”，分田标准是每人平均三斗。

一九三〇年底，我县的土地分配基本完成，一九三一年春，又在新开辟的苏区进行了土地改革。今属我县所辖的十个区苏，六十四个乡苏，五百多个村苏都进行了土改。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有十九万七千七百人参加了土改，共分得土

地二十万二千七百二十亩，人均一亩多。土地革命取得了重大胜利。我县土地革命的过程，也反映了鄂豫皖苏区土地革命的日益深入和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的日趋完善。

一九三一年四月张国焘来到鄂豫皖苏区后，积极推行王明的“左”倾土改政策。七月在鄂豫皖苏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会上，通过的《重新分配一切土地》的决议，全盘否定了过去土地革命的成果，贯彻王明的“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地主阶级与富农土地全部没收”，“使中农自动地拿出土地来平分”、“对过去分得好的土地不愿拿出来重新分配的人，要号召广大群众起来与他斗争”等等错误政策。这些错误政策，严重地侵犯了中农的利益，过火地打击了富农，不给地主以出路，扩大了打击面，无形中使我们树敌过多。

张国焘的“左”倾错误路线一开始就遭到了根据地内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和反对。吴焕先、徐朋人等同志就曾提出过：“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那让他们吃什么？”“春耕时节，将土地打乱重分，势必影响生产”的质问和反对意见。由于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和反对，使张国焘推行的那套“左”的政策没能在我县贯彻下去。我县原属光山管辖的弦东、弦南、弦西；原属黄安、麻城所辖的紫云、乘马等地区，大部只在一九三〇年进行过一次土改，没有在一九三一年再打乱平分。

此文主要根据以下资料整理而成：

1、《新县革命史》。

2、《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

3、代咀乡袁光祥、袁光信、袁理；陈店乡鲁永恩、曹华荣；周河乡雷华礼、张先桃、张述松；卡房乡邓永言；千斤乡余定怀；八里乡付凯江、陈华义、王光钊、余少东等知情老人座谈回忆资料。

执笔人：杨传锋

固始县土地革命概况

中共固始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固始县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奋起推翻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在占全县苏区三分之二以上的土地上一一六六个区五十八个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不仅首次摧毁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改变了土地所有制，而且促进了红色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二十年代的固始农村，同旧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的手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只有很少土地，甚至没有一点土地。固始西南乡占当地人口百分之七的张、叶、姚、陈、韩五家地主，却霸占着当地土地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东乡大地主李梦庚“霸占的土地跨两省四县（固始、阜阳、霍邱、颍上），共计二十多万亩，挂着‘双千顷’的牌子”，“从他家走进城里所经一百二十里路程，可以不用踏入人家的土地一步”①。西北乡一蔡姓恶霸地主，依仗权势，在他任反动民团大队长十年期间，“买地买心不买边”，强占土地六、七千亩，住宅百余处。从他家放马到二十多里外的尹家岗，可以不吃别人地里草②。

地主阶级利用霸占的大量土地，对农民进行极其残酷的经济剥削。固始的地租一般为收成的五至六成，高的达七

成。除春、秋两季主粮外，还有各种附加的“小粮”，如黄豆、棉花、芝麻、栗子以及鸡粮、鸭粮、鱼粮、肉粮。此外，每年夏秋收获时，要请地主吃着粮酒、议粮酒，地主家里红白事，或逢年过节，都要送一些土特产礼品。农民遭到天灾人祸交不起租，地主就把它转为高利贷，月息大加一，大加二，“驴打滚”，几个月就加一倍。在地主阶级的压榨下，广大农民日益贫困，长期在死亡线上挣扎。他们迫切要求砸烂套在头上的枷锁，砸烂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

二

固始县的土地革命运动，从一九二九年秋开始到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西征，历经三年。

一九二九年秋，在党的领导下，首先进行了分粮、抗租、抗捐斗争。在这段时间里，固始各级党组织从整顿发展农民协会开始，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组建农民武装，镇压罪大恶极的豪绅地主和反动分子，举行工农武装暴动，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革命政权，为固始县的土地革命作了充分准备。

土地革命的锋芒，集中指向了地主阶级。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道河李牌坊大地主李少伯向农民强加租捐，二道河农民在第五乡（当时属商城四区）苏维埃主席张直夫领导下，在二道河北河湾召开大会，声讨李少伯剥削农民、搜刮民脂民膏的罪行。会后进行示威，抗租抗捐，并当场砸烂了地主的大斗。接着，先后打开了金竹园、阮家楼、涂小圩子等豪绅围寨，开仓分粮③。

一九三〇年，固始北乡春荒严重，青黄不接，民不聊生。代店党组织和农协会组织五百多名穷苦农民，巧妙打开六安知县赵亚琴的庄园——五子庙，分了他家的粮食。接着又打开了南赵圩、梁圩子、左圩子、李圩子、沈圩子以及东西周圩等七处地主圈寨，均分粮食计五十余万斤④。这次春荒斗争持续两个多月，不仅解决了固始北乡农民的饥饿问题，而且还严惩了那里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进一步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在斗争中农民群众得到了锻炼。在开展抗租和春荒斗争的同时，党领导了多起工农武装暴动，建立工农政权，从而为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一九三〇年夏，随着固始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区乡苏维埃政权的相继建立，固始大部分区乡陆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第一批土改的二道河、青峰岭、长江河、张店子等乡的贫苦农民当年就收获了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到一九三二年连续收了五季庄稼。随后进行土改的段集、祖师、刘楼、钱老楼、武庙等乡收了四季庄稼⑤。这个时期的土地改革，基本上是按照《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规定的政策进行的。有的地方，根据《细则》精神，还制定了本地的土地政纲实施细则。如一九三一年二月代店乡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代店乡土地政纲实施细则》（见附件）。大致过程是：

1. 宣传发动，建立组织

首先是各级党政干部认真学习有关文件，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弄清政策，明确方法。在武装骨干的基础上，发动各个群众团体运用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向群众宣传党的土

地政策和法令，动员干部、群众检举揭发顽固派，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坚决予以镇压，造成强大声势，把地主阶级的威风打下去。如一九三一年春，二道河乡土改一开始，首先召开了数百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布没收地方民团头子、李牌坊劣绅李麻子的土地，当众烧毁了他的契约债卷，公审后予以镇压⑥。通过实际斗争，进一步宣传群众，发动群众，解除群众顾虑，鼓舞群众斗志。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区、乡苏维埃都专门建立了土地委员会，具体领导土改工作。

2、调查登记，划分阶级

各级土地委员会建立后，发动农民，调查当地各户的政治经济状况，然后按照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划分阶级。根据土地占有量和是否存在剥削以及剥削量，一般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

3、制定方案，分配土地

在进行土地分配的过程中，各地根据上级的有关政策规定，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具体的分配方案。如“中间不动，两头平分”，军烈属、贫农分好田。有的先提取红军田、政府田作为公田，留做临时接济军烈属或留做分给外籍红军伤病员养伤安家使用。亩数多少，视该乡土地情况而定，由政府管理，代耕队代耕。

在分配方法上，根据土质好坏、水源条件，离村远近、产量高低和户主人口多少等情况，进行肥瘦搭配，写上册子，然后土地委员带领群众到田间具体说明哪些田地分给谁家（叫做“踩田”）。若无异议，插上牌子，注明分得土地的户主、数量和田界，随即张榜公布，征求各家意见。在大家认为可行后，即当众定案。段集乡的窑沟、青峰岭、夏楼

三个村的三百一十户农民，一千二百多人，在乡土地委员易道贵带领下，采用上述方法，分了土豪王少怀、王兰台、易贯生等人的一千多亩土地^⑦。据陈淋乡典型调查，固始县一区当时有土地三万五千一百二十亩，人口一万七千五百，人均二亩。由于各乡土地、人口多少不一样，所分土地数量也不同（详见下表）。

乡 别	姓 名	全家人口	分得土地	人 均
三乡（凉亭）	刘金信	7	14.9	2.1
九乡（大营）	李大江	10	55	5.5
七乡（徐楼）	王大汉	6	12	2
八乡（汪岭）	华祖山	6	8	1.3

一九三一年夏，张国焘到鄂豫皖边区不久，就极力推行王明极“左”土地政策，他全面否定鄂豫皖根据地过去土地革命的成绩，说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充满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高利贷者”，定言“鄂豫皖苏区土地虽经过几次分配，但因过去路线上的错误……解决土地问题多不正确”，所以要“重新分配一切土地”。并且强调“地主就不分土地给他，要他做苦工”，“富农分坏的土地”。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固始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在“把以前所分给富农的土地与地主豪绅、流氓、无耕种能力的分子的土地没收过来给贫农、雇农耕种”，“决不能存在慈善心

理，把田地分给了地主豪绅家属”，“对于富农，留下一部分坏地给他耕”等这一系列错误政策的指导下，从秋季开始重新分配一切土地。当时固始一区即按照新政策重新分配了土地⑧。这种极“左”的土地政策和做法，在不同程度上侵犯了中农利益，不给地主、富农生活出路，树敌过多，在客观上起到了帮助敌人，危害革命的作用。

一九三二年秋，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鄂豫皖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四次“围剿”，中央分局和四方面军主力于十月份西撤，固始革命根据地随之变为游击区，土地革命运动从此告一段落。

注 释：

①《六安中心县委向中央的报告》，1930年；《河南省农村调查》1934年8月版。

②1964年《蔡荣山霸史》。

③1958年党史调访记录。

④《固始县洪埠乡苏区资料汇编》38页。

⑤张长松等老人回忆。

⑥1985年6月红军流落人员吴兰荪回忆。

⑦1985年12月27日杨国发、李付田老人回忆。

⑧1979年7月李德忠、王占彪等回忆。

执笔人：孙克新

附：



代店乡苏维埃土地实施细则

一、没收细则

第一条 凡豪绅地主所有之土地，一律无代价的没收。

第二条 凡祠堂、庙宇、教堂、祖积、公积所有之土地及一切公产官地一律没收之。

第三条 凡经革命政府肃反委员会宣布没收财产之反革命分子所有之土地一律没收之。

二、分配细则

第一条 凡没收之土地得照下列情形分配之：（一）无地之农民（二）少地之农民（三）红军的官兵（四）退伍的兵士（五）愿耕种之小贩及其他职业者（六）凡豪绅反动派已经解决，其家属确经当地革命团体证明无反动嫌疑者。

第二条 分配土地之多少以食粮需要（全家人每年需多少粮食吃）为主要条件，在此条件之外，当地如有宽余之土地得依照耕种能力分配之。

第三条 凡鳏寡孤独残废及无力耕种者，由当地农委会酌量分配土地，其耕种办法得由雇人耕种或由当地农委会负责办理（或帮耕或〔代〕耕）。

第四条 分配土地男女有同样权利。

第五条 分配土地不可以土地面积为标准，须以出产多少为标准。

三、附则

第一条 焚烧豪绅地主一切契约，发给得分土地者土地使用证。

第二条 取消包佃制和批字顶礼押字。

第三条 凡没收之随田棉地得按分配细则分配之。

第四条 得分土地之人如若死亡或不愿耕种时须将土地退还乡农会另行支配。

第五条 没收和分配时，不得侵犯自耕农利益。

第六条 凡无反革命嫌疑而逃亡在外者之土地得由农会代为佃给有耕种能力者耕种，其他一切财产及租棵均由该乡农会负责保管，俟逃亡者归即交还之。

固始代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张树金

中华民国二十年二月十二日

注：此件由固始县洪埠乡倪岗村雷新震（75岁）提供。

罗山县土地革命的开展

中共罗山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

土地革命前，罗山县有可耕地一百一十五万多亩，二十七万二千入。其中近二十万农民无土地，三万多农民有少量土地，而少数地主却占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①。县城刘氏官僚地主一家就占有土地二万五千多亩②。这极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度，使广大农民陷入苦海深渊。在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指引下，我县的土地革命，随着武装斗争的开展，苏维埃政权的陆续建立，逐步地开展起来。

罗山的地主阶级不仅霸占着大量的土地，而且还掌握有大量的武装。特别是罗山南部山区的地主豪绅，建山寨，办教堂，立民团，残酷剥削和压迫人民群众。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〇年间，罗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十多起暴动，建立起六千余人的农民武装，有力地打击了土豪劣绅，为建立农村政权和分配土地奠定了基础。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罗山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罗南宣化店召开，正式选举产生了罗山县苏维埃政府。县苏下辖宣化店、丰店、王店、杨店、万店、卡房（弦西）、潘新店（陈望楼）、周党等六个区苏③。在同年冬及一九三一年春，罗山各区苏先后都进行了土改。一九三四年七月，红二十五军在罗山开辟了朱堂店新苏区，在铁铺和涩港等地又进行了土改。

罗山苏区的土改是按照中央《临时政纲》及《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的精神进行的。其原则基本是按人分田。穷人分好田，地主分坏田，红军家属给照顾。土地分配前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传，各村建立评议小组，由各村土地委员、农会主席、妇女主席及群众代表组成，在各级苏维埃的统一领导下进行。

执行按人分配，就是把没收豪绅地主及反动分子的土地全部或者大部按人头平均分配。参加分地的人口，包括本村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从边缘地区来居住的红军家属和基层群众，以及豪绅地主家庭人口。根据土地多少，按人头计算平均数，由评议小组评议后，进行插标定块，落实到户。耕牛、农具随田分配，有不少是几家合分一条牛。另从没收豪绅地主粮款中抽出一部分买耕牛，分给红军家属和贫农。有部分乡苏发有红纸油印的临时土地证，大部分没有发给土地证。

大部分乡苏在分配时留有集耕田，约二至三石，由政府 and 游击队或自卫队耕种，其收入用于乡公用开支和群众武装的补给。

对于缺劳力的红军家属和孤寡老人，由村长组织群众代耕。分给豪绅地主的土地，而全家逃亡了的，由群众自愿代耕，谁种谁收。有的逃亡户中途回家的，责令付给代耕报酬。

罗山苏区在土改后，一、二、三、四区各收了两季麦、一季稻，五区、周党、青区等地，大部分只收了一季麦。进行了土改的地区，按规定每斗田交二十斤红军粮，一、二区苏所交的红军粮送到罗南宣化店红军仓库，其它几个区苏送

到杨店陈祠堂红军仓库。在交粮时，许多户都自愿超标准交了红军粮。（见附件一、二、三）

红四方面军西撤后，红二十五军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阶段，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在罗山的朱堂店、铁铺地区，恢复和开辟了小块苏区，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同时进行了土改。这次土改是在红军工作队领导下进行的，其分配原则与方法大致与原苏区土改相同，但较为粗糙。（见附件四、五）

另外，一九三〇年秋，红军攻克罗山城后，罗山城在工农革命委员会临时政权领导下，进行了土改。这次土改进行得很仓促，主要是将地主已经佃出的土地没收过来分配给佃农耕种。分配土地时没有丈量折亩，按照家庭人口，每人三斗，算好后写个分田通知。当时有的村已定块兑现，有的村土地还没分到手，因红军南下，这里又被国民党占据，土地分配即被迫停止了。（见附件六）

罗山苏区土改认真执行了《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深受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取得了伟大胜利。十八个乡（镇），二百八十一一个行政村，就有十五个乡（镇），二百一十二个行政村进行了土改，所分土地数占全县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六点八。土改后农村生产出现了大好形势，群众至今念念不忘。

注 释：

- ①中共罗山县委一九八五年报苏区统计数字。
- ②《河南省农村调查》，一九三四年八月版。
- ③《丰碑》第五期104页。

执笔人：黄光第

附件一

李绍堂的回憶

(1984年11月2日)

我叫李紹堂，79歲，烈屬。於一九三一年參加土地革命，任羅山縣第一區蘇（宣化店）合作經濟買辦。我的家，屬羅山縣第一區第二鄉蘇李畝村。在一九三〇年冬開始土改到三一年春結束。全村四個灣，二十六戶，一百五十七人，分田是在土地委員張仿南領導下進行的。紅軍家屬分最好的田，窮人分較好的田，地主分壞田。每人分田二斗五升，以畝石為界。每人交紅軍糧大米四十斤，送到宣化店河西會館。那時，我家八口人，在土改時分得地主袁子修的好田二石一斗，大耕牛一頭，水車一部和一些小型農具，棉被一床，衣料四件。土改後收了兩季麥，一季稻。

附件二

李四清、熊天楮的回憶

(1985年7月4日)

李四清的回憶：在民國十九年臘月，成立二鄉，也叫楊店鄉蘇。屬三區蘇管。鄉蘇維埃政府設在姜榜，主席盧成才，秘書李仲書，我當清算委員，土地委員是謝正茂。在民

国二十年春，进行土改。土地委员先到区苏开会，学习土改政策，划成份，研究方法。散会后，召开群众会，讲土改的事，接着领着群众到田间去分田。

熊天楷的回忆：在民国二十年，三区苏下辖张湾、黄洼、陈墩、山边、董堂、关店、杨店七个乡苏。先后在三〇年冬，三一年春进行土改。分配方法是一样，就拿张湾乡苏（住在鲁畷张云根家）来说，主席冯玉文，我开始当司务长，后来当秘书，土地委员冯光瑶，在三一年春进行土改，每人平均分三斗田。我家七口人分了二石一斗，分大地主陈子香的田。只是写有分田名册，听说有的乡苏发有红绿纸印的土改证，我们没来得及发，谷刚黄时，国民党来了二十五个师，分五路进攻苏区，打得玄得很，我们撤到了大山林里。

附件三

三区谢林村土改情况的座谈

参加座谈人员：

刘天胜，68岁。一九三〇年任三区苏儿童团团长。

吴瑞卿，72岁。一九三〇年三区苏赤卫队员。

李四清，74岁。一九三〇年任杨店乡苏清算委员。

熊天楷，81岁。一九三〇年任张湾乡苏秘书。

座谈时间：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八日。

谢林村包括有许山边、方菜园、柿子园、谢湾、道人石湾、甘河沟、莲塘、河埂、南店、独庄、山塘洼等十一个自然村。一九三〇年冬至三一年春分田时共有四十八户，二百

零七人，其中地主两户，富农两户，其余都是雇农、贫农、中农。

谢林村的分田活动是在乡苏的领导下，由村长谢明忠、土地委员刘正鼎主持进行的。分田原则是：①红军家属分好田；②地主分坏田，地主逃跑了的田留下；③按人口每人三斗（没有丈田折亩）；④暴动点上逃到中心区来落户的，一样计算人口分田；⑤农具随田分配；⑥由苏维埃从没收地主粮款中抽出部分，为雇、贫农买耕牛。对红军分得的田和无劳力的户分得的田，由村长组织群众代耕。规定每斗田交大米二十斤，送到杨店陈祠堂（是苏区特务营驻地）。

分田以后，只收了一年粮食，一九三二年国民党来了，地主富农也都回来了，土地证未来得及发。农民刘天胜家四口人，分田一石二斗，收谷子二千六百多斤，除送粮外，还有二千三百斤。

附件四

陈国新、黄开禄的回忆

（1984年10月20日）

陈国新的回忆：我叫陈国新，77岁，住涇港刘楼村桃园组。

一九三四年春，红二十五军从东边过来，住在昌湾一带，约一万人。捉住了大土豪翟席宇，没收了翟的家财，分了他的田地。

当时负责分田的叫土地爷。这次叫我参加扛一个大锄，走不多远挖一个坑作分田记印。我家分了两块大田，一个四

斗一个二斗共六斗。后来把翟用石头砸死了。

黄开禄的回忆：一九三四年，红军来了不少人，满山遍野都是，仅我湾就住了二百多人。

红军来后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分粮，打富济贫，穷人不还富人钱等，在刘楼进行了土改分田。

附件五

翟守明、杨发银的回忆

(1984年8月22日)

翟守明，69岁。杨发银，62岁，新四军战士，祖居在昌湾泉水沟。

一九三四年，我们这里成立了农民协会，领导人是柴子新、杨本字，上韩湾、下韩湾的农会领导人是万永地。农会领导我们分田地，将大竹子劈成片子写上字，插作标记，每人按四斗进行分配，没收土豪劣绅的田。我记得是在翟家湾南头竹林里开群众大会，把杨湾土豪吴二驼子的妈斗了后，群众要求杀掉，后用石头砸死的，接着又打掉了北安山地主陈怀的武装。建立政权后进行土改的。红军在十一月十六日撤走，国民党打来了，我们分的田又被地富夺走了。

附件六

熊恩普、张正雨、沈炳贵的回忆

熊恩普，75岁，一九三〇年冬任城区沈畈村农会组长。

他说：一九三〇冬，红军攻克了罗山城，在城内建立了“罗山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接着建立城区临时革命政权。属城区所辖的沈畈、张畈、双林、蚂蚱祠、新小湾、卢尚湾、代湾等七个大村庄就建立七个革命委员会。政权建立后就进行打土豪分田地。因为我们城区的土地几乎都被地主霸占，大地主多，成份是明摆着的，没有坐下来划分成份。如沈畈的大地主何二蛮子、沈锦如；张畈的大地主是吕华亭；双林的大地主是陈兴桥；蚂蚱祠的大地主是曾广礼；新小湾的大地主是方荣屈；卢尚湾的大土豪是叶尧清；代湾的田地也被曾广礼侵占了。赤卫队员几乎都是这些大地主的佃户，没有划成份，就是佃户斗地主，佃户分地主的田。

张正雨，82岁，一九三〇年冬任城区张畈乡农民革命委员会主席。他说：我们穷人掌了权就跟地主豪绅斗，先捉地主家中的人，抄他的家，分浮财，这几个村子搞得热火朝天。分田地只是沈畈、双林、张畈进行了。蚂蚱祠、新小湾、卢尚湾、代湾等四个村子正在准备进行土地分配，上级通知停下来了，当时不知因啥。后来才听有的干部偷着说：中央派了个张国焘来了，他对原来分田地有意见，说地主不该分田，又有新规定，所以没有往下进行。不久国民党打来了，连分了的田地也没收到粮食。

沈炳贵，74岁，现住龙山乡沈畈村。他说：

民国十九年秋，红军打进罗山城后，我们这一带成立了沈畈乡农民革命委员会，主席王文田，宣传委员姓余。会址当时设在我湾，我是赤卫队员。这年十一月，我们把桃园大土豪何二蛮子和他的小老婆，沈畈的大地主沈锦如都抓来了，抄了他们的家，分了他们的土地。这两家大地主田地

多，沈锦如一家就侵占土地七百多石（折五千多亩）。他们地主成份是明显的，我们赤卫队员大部分是他的佃户，所以没有划其它什么成份。在分田时也没有到田间地头去丈量折亩，只是按家中人口，以自种为主，每人三斗，地谁种是谁的，算好后写个分田通知。我家四口人，分大土豪沈锦如的一块四斗田，一块六斗田和三斗地，还分了三挑子谷和一床被子。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八日

商城县土地革命概述

中共商城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指引下，党在领导商城起义和开辟豫东南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同时，在商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前的商城，同其它地区一样，耕地被少数地主占有着，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则只有很少土地，甚至没有土地。地主阶级利用封建土地制度，向农民索取高额地租，予收租地押金，加要各种小徕，进行极其残酷的经济剥削。大革命时期商南汤家汇附近的八个村，共有田六千三百余亩，地主富农占有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七十五，寺庙、祠堂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广大中贫农只占有百分之二点五。银沙畈一带方圆几十里的田地、庄园、山场，绝大部分都被大地主黄光桐一人霸占，仅田地就达二千四百五十多亩。凡租种他的田地，无论平常年灾年，都要交全部收获量的百分之八十。他将收的租子囤积起来，青黄不接时，以高价卖给农民。伏山乡农民雷家春民国十六年七月初四日的佃田字就写道：“今佃到顾彦记名下金岗山白杨树南冲田地、山场、庄房一份，每年春季承大麦稞一石五斗，小麦稞一斗，秋季承稻稞二十一石，木子稞五斗，桐子稞三斗，鸡稞十斤，均清送到家。稻稞乾扬洁净，包仓出卖。当存无利押租钱六百三十串文，不种之日原数领取无利。山场看管兴蓄，不

得砍伐。庄房随时修整，不得倒塌。如私自摧残森林，败坏庄房，荒芜田地，或租裸不清，情愿田主估价在租钱内扣除，任田主另批另佃。”（原件存商城县档案馆）

债息高得惊人，一般年息达百分之三十五至五十，高者月息竟达百分之十至二十，并且接复利计算。（附件1、2）

农民除受封建地租和高利贷的残酷剥削外，还要负担反动政府加于他们头上的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一般说来，清末留下的各种捐税，直到大革命前夕仍然被保留下来，而且还增加了不少新的名目。“当时大体的杂税有：人头税（无论男女老少，连刚刚出生的也要给），屠宰税（杀猪牛羊每头交5%的税），灶头税（每户只要冒烟有灶都要给），油盐税，柴草税，烟酒税，茶叶税，印花税，门牌税……地保税，棉花税，枪支弹药捐（不定期的收），户口田亩税，团防税，犒赏费（逢年过节要给团匪犒赏费），保甲经费等不胜枚举。”①差不多物物有税，事事完捐。一九二六年，军阀任应歧部在商城驻扎，“一年间就预征了四年的粮”②。“冯玉祥到后，却只知拿苛捐杂税和（豫）东南民众做见面的礼物，他从民国十八年预征到二十一年的钱粮（任军在东南所征收的无效）。”③农民劳动一年的全部收入，交了租和付不清的捐税后，被榨取得一干二净。真是“旧社会农民头上两把刀：地租重，债息高”，“穷人面前三条路：逃荒、上吊、坐监牢。”

商城的土地革命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一九二八年春到一九三〇年初为第一个阶段，即土地革命初期的分粮抗租反捐税阶段。

一九二八年七月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指出：“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底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到一九三〇年二月以前，虽然“光复商城后，召集市民大会成立了临时县苏维埃”，革命武装斗争有很大发展，但由于商城初次解放后时间还很短促，全县农村大部分还没有建立起工农政权，所以除南乡斑竹园等地开始“打土豪分田地”外，“农民群众的斗争仍然停留在分粮的运动”，“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都没有开始”。这个时期，中共商城县委和各级党组织通过农民协会，积极领导全县人民，着重开展了分粮抗租反捐税等经济斗争④。

一九二八年大旱，商城是非常荒歉的年岁，“平均的收成，只有三四成”。一九二九年春荒严重，广大农民“有一半以上没有粮食吃”，“处于饥荒的威胁中”，加之军阀的横征暴敛，兵匪的骚扰，把农民逼上了绝路。

中共商城县委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在全县范围内发动群众开展分粮抗租反捐税斗争。“一九二九年到处建立农协，开展打土豪减租减息，抗捐抗税。县自卫队周凤山带领四十余人，到李集、南溪一带征粮，农民协会组织农民拿枪提刀进行反抗，他逃回城，不敢再来了。”“在商城的北乡，农民自动的和收捐税的军队作战，（商城北区）军队再不敢去了。”南司农民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分了杨老湾的杨子先和杨小湾的杨七爷等土豪家的粮食⑤。武家桥党支部领导农民在赵下家竖起大旗，后又移到堆子堰，分了陈泽夫和郭五麻子的粮食和财产⑥。苏仙石党员易千福等领导农民分

了易湾易姓地主的粮食，并开展抗租抗捐斗争，不向地主交租子⑦。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夜，红三十二师副师长漆德玮带领三十多名红军战士，和余集赤卫队七十多名队员，在商城西乡最大财主——胡冲雷念成家，查获铜币三大缸，银元九万七千块，粮食三万多斤，步枪两支，子弹一百多发，还有大量衣服和其它物资。除留下银元三万块作为红三十二师的经费，枪弹留给赤卫队外，其余的钱、粮、物，全部分给了群众。第二天，在李湾又分了大地主余子谦的五万多斤粮食及其它物资。此后，在一九三〇年元月一个月內，余乃勤领导余集赤卫大队，带领群众，在余集的何冲、皮冲、雷冲等地，先后打了余以昌、田义富等十多家土豪劣绅，分了他们家的钱和粮食等物资⑧。（附件3）

这段时间里，商城的党组织经过恢复和整顿，有很大发展，组织秘密农民武装，开展兵运工作，发动商城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为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同时，分粮抗租反捐税斗争的开展，不仅暂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的饥饿问题，而且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极大地锻炼和鼓舞了人民群众，推动了武装起义和根据地的开辟。正如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九日中央给河南省委的指示信所指出的：“反军阀苛捐杂税的斗争，是土地革命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我们对于农民群众自发的——以及为豪绅地主富农所领导的——反捐税抢粮的斗争必须认为，在客观上有其土地革命的意义。党的策略，便是不仅参加这一斗争，而且要力争这一斗争的领导权，使这一斗争发展成为游击战争，没收地主土地……”。一九三〇年春天，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由商南一隅扩大到商城大部分地

区，进而形成东南连接六、霍、罗、麻，西北到光、潢、固边区，方圆二百余里的根据地。在上级党的领导下，商城的土地革命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一九三〇年春到一九三一年五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之前，为第二个阶段，即土地革命蓬勃发展，并取得显著成绩的阶段。

一九三〇年春天以后，随着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区乡苏维埃政权的陆续建立，商城大部分区乡陆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苏维埃政权建到哪里，土改就在哪里展开。第一批有斑竹园、白沙河、牛食畷、小河、吴家店等乡先进行土改，到一九三二年秋，收了三个庄稼（水稻）。接着，从一九三〇年二月到四月，一区、四区、五区、六区各乡也都进行了土地改革，除一区的汤家汇、南溪、马河岗、双河、洞沟收了三个庄稼外，其它各区乡收了两个庄稼。这个时期的土地改革政策，基本上是按照《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进行的。其主要内容就是没收豪绅地主和祠堂、庙宇之土地，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将所有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除逃跑的大地主外，一般地主也分给薄田种。地面上的庄稼随田分配，房屋、耕牛、农具及其它财产的处理，与土地处理大致相同。（附件4、5、6）

土地分配在党组织领导下，由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土地委员会（村苏维埃为土地委员）具体负责进行。在方法上一般采取了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是发动群众，对地主豪绅进行斗争，罪大恶极群众要杀的就杀，当众烧毁地主的田契债票，从政治上把地主豪绅阶级的威风打下去，把广大农民的腰杆撑起来。二是进行人口和土地调查，确定土地分配标准。土

地调查有的依照习惯面积（石斗）计算，有的重新进行丈量登记，再根据肥瘦、水源等条件评定上中下三个等级。三是划分阶级。这一阶段没有统一的标准，大致情况是：地主：主要依靠剥削，占有比较多的土地，请长工，放债多，利息高。富农：自己有田地、房屋、耕牛、农具，请个把人，多少放点债。中农：有田地，全靠自己劳动，够吃。贫农：有点田地，又种一部分地主的田，没有耕牛、农具，靠租借，不够吃穿，还欠债。雇工：一无所有。四是分配土地。按人口多少，把各户应分土地计算好，将户主姓名、应分田地数量、地点、界址写在牌子上，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后，就地插牌，指明边界。最后乡苏维埃发给土地使用证。南溪乡不管地主、富农、祠堂、庙会公田和中农、佃农的田地，一律丈量，按人口多少，平均分配，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便顺利结束了⑨。（附件7）

在商城苏区土地改革即将开始的时候，中央《关于接受国际对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贯彻了下来，强调“应坚决的反对富农”。信阳中心县委扩大会于一九三〇年二月五日据此作出决议案，强调“以雇农、贫农为基础，以中农为同盟，反对富农”，说因为“在商城富农全走到反动地位，因此红军对富农等于对待地主。”中央巡视员一九三〇年元月曾到商城传达中央“反富农指示”。由于当时商城县委对反富农政策的怀疑和抵触，加之“立三路线”在中央统治时间不长，所以后来不久的李立三“左”倾反富农政策，在商城土地改革中危害面不大⑩。（附件8）

土地改革使广大贫苦农民第一次分到了土地，广大苏区到处充满生机。一九三一年二月十日鄂豫皖特委的报告说：

“赤区的工农生活，的确改善了，肃清了苛捐杂税，得到了土地，一切政治上自由平等，都确定了他们热烈起来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精神上物资上农民都能自愿的起来帮助红军与政权。”但是，这次分田斗争中也有缺点，主要是商南有的乡村“无论富农中农贫农，机械的每人分一亩田”，剩下的归苏维埃，造成了一些田地的荒废①。

3、一九三一年五月到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为第三个阶段，即张国焘推行极“左”土地政策，在商城造成很大危害的阶段。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张国焘担任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局书记以后，极力推行王明极“左”土地政策，全面否定鄂豫皖苏区过去土地革命的成绩。五月二十四日张国焘在关于反二次“围剿”及其他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指责“皖西土地分配得一塌糊涂，最坏的是商城”。七月，鄂豫皖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给皖西北特委一封信中责令“皖西北苏维埃对于土地问题应重新彻底分配，任何一个地主不应分得土地，富农只能分得比贫农、中农以较坏的土地”。十一月七日，由鄂豫皖军委总政治部发布了《怎样分配土地》，在《土地问题解答》中强调“地主就不分土地给他，要他做苦工”，“富农分坏的土地”，富农小孩和妇女“要分最坏的土地，由他自己耕种。”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商城县委于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发出了《为重新分配土地告商城工农劳苦群众书》，完全否定了自己过去由于执行正确的土地政策而取得的成绩，竟说“过去分配土地，不仅富农偷取了土地的利益，而且小地主也分配了土地！”“这样正使富农及豪绅地主的残余得以

阴谋破坏和阻碍土地革命的深入，损害了农村的基本群众的利益，动摇了无产阶级雇农、贫农与中农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同样也反对富农企图缩小和阻碍土地革命的巩固的革命的联合战线，所以我们要坚决的反对和坚决的斗争，必须要彻底地重新来分配。”怎样重新分配呢？《告商城工农劳苦群众书》讲了七条办法，强调“豪绅地主及其家属、反动派以及一切不是靠自己耕种土地过生活的人，都没有分配土地的权利”，要求“分配土地的时候是以乡为单位”，“以出产量来计算”，“按人口和劳动力（就是有耕种能力的人）混合比例的方法来分配所有的土地”。并由红军团政治处颁发《土地使用证》。当时商固特区基本按照上述办法分配了土地，“没收地主豪绅的全部土地财产和最坏富农的全部土地，以乡村为单位实行平分土地，照顾军烈属、贫苦农民，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分到的田发给土地证”。“那时正是秋收时，分给谁家的田，归谁收。”（附件9、10、11）

在商南，为了“重新分配一切土地”，对头一年进行的土地改革又进行了复查和调整。“划错成份和分错土地的加以纠正，隐瞒田亩数的重新处理……在复查调整时，许多地方都出现过‘左’的倾向。如斑竹园，在复查时又进行抽肥补瘦，把富农手里的一些好地，再拿出来分配。在南溪、汤汇一带，土改后第二年（一九三一年）夏天，又进行‘调反’……调反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富农，如果富农分得的田，比某贫农还要好些，就要和这户贫农调换（先是换割，后是换种），房子好的也要和贫农调换住（衣物可以拿走，家具和农具随房子一齐调换）。到一九三二年，再一次宣

布‘调割’，即富农田里的稻子长的比贫农田里的还要好，就要与贫农换着割。但由于敌人进攻，‘调割’没有最后实行。”⑫

这个阶段的土地政策，虽然仍是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这个过“左”政策，造成树敌过多，在客观上起到帮助敌人，危害革命的作用。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央分局和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后，根据地仅剩金刚台一带游击区，国民党反动派恢复了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疯狂进行反攻倒算，农民的土地得而复失，商城的土地革命也就告一段落。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商城县先后有一百零三个乡实行了土改，十二万一千六百多人分得了二十二万九千五百多亩土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附件11、12）

注 释：

- ①丁江成、李发灼、蒋星辅的回忆。
- ②徐立谓的回忆。
- ③郭树勋给中央报告，1929年2月11日。
- ④豫南（巡视员郭树勋）报告，1930年2月21日。
- ⑤李大用的回忆。
- ⑥许从发谈堆子堰暴动情况。
- ⑦易少轩、易成铸的回忆。（①——⑦均见《丰碑》第三期《商城起义和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一文的附件。）
- ⑧《西乡火炬》，见《大别山烽火》。

⑨《从入农协到参加红军》，见《丰碑》第一期。

⑩郭述申同志谈土地革命时期商城县革命情况，见《丰碑》第二期114页。

⑪《鄂豫皖边区劳苦群众的奋斗》，见《丰碑》第二期285页。

⑫金寨革命历史资料。

执笔人：罗高松

附件（1）

金寨县党史节录

一九二九年以前的土地占有情况，虽无全面统计，但就以下的调查亦可见一斑。赤南二区（汤汇附近）的八个村，有田约六千三百余亩，地主、富农占有全部土地的75%（其中一廖姓地主又占全部地主所有田地的三分之一），寺庙、祠堂占有全部田地的22.5%，广大中、贫农只占有2.5%；赤南三区七乡六村（太平山汪家湾），有五十余户人家，地主一户（汪耀才），每年收两百余石稞，占全村土地三分之二……当时的地租一般占全部收获量的70—80%，高者甚达90%，最低也在50%以上。每年农民除缴纳稻稞外，还要向地主交纳麦稞、豆稞、棉花稞、鱼稞、鸡稞、梓油稞以及请租酒、服劳役等名目繁多的额外负担。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利率之高也是惊人的，一般利息（其实往往是一季稻时间）达15—50%，高者竟达月息10—20%以上，按复利计算。

附件（2）

商城大地主黄光桐

在银沙畈地区的盘剥情况

一九二一年以前，商城有四大恶霸地主：周、熊、杨、黄。商南地区恶霸黄光桐的盘剥统治区，长约七十华里，宽约三十五华里。在这个范围内的田地、房产、庄园、山场，绝大部分是黄光桐的，光田地就达2456亩。他们与地方的封建势力反动民团勾结在一起，敲榨勒索农民财产，霸占收买农民田地、房产、庄园、山场。所霸占去的田地、房产、庄园、山场又租给贫苦农民，租给时要租约和交押金。押金约占买田款的六分之一，不交押金得不到田种。凡是租种他的田地的佃户，每斗田不管平常年或灾荒年都要交80%（即一石租粮交八斗）给他。收的租子当地囤积，到青黄不接时，以高价卖给农民，压得农民抬不起头来；生活万分痛苦，当地几百户贫苦农民没有一户不欠黄光桐的债的。

除交租外，还要交麦棵、鸡棵、鱼棵，日子久了就成了他的剥削制度了。盘剥的手段很多：（一）以田买田，买就是把佃户租种的押金再拿去买田，扩大剥削范围。（二）加押金，在佃户生活较够糊口时，地主就想点子来加押金，每斗田增加一倍，交不起押金就不给田种，撵其搬家。（三）利用山中树木，判给农民烧炭，种茯苓，剥削群众血汗。

口述者：余兴友 曹士林抄录

一九六〇年八月十六日

注：余兴友，住汤汇银沙畈。

附件（3）

豫南（中心县委）报告（节录）

一九二七（九）年十月

东南及沿铁道一带的农村虽然没有象西南的饥荒和集中土地的状况，然而地主阶级的剥削，依然利害。土匪在东南和豪绅勾结起来，向贫苦的及耕农进攻（如息县、固始），所以土匪日多，农民的痛苦必然增加。最近土匪军队的盘据摊派军费，供给柴草，有所谓民团捐，军装捐等捐，使农民求死不得，求生不能。东南在商城光山等处农民群众已经由反捐税分粮运动进入到土地的革命，光山农民在短时间可以召集上万的群众做武装的斗争，在罗山非红色区域，群众在党领导之下去打毁税局，开群众大会枪决豪绅（罗山宣化店），在商城的北乡，农民自动的和收捐税的军队作战，（商城北区）军队再不敢去了。

附件（4）

老红军座谈土改问题记录

一九六〇年五月七日

民国十八年四月斑竹园苏区先分，分后插秧，开始打土豪。参加红军的分好土地分好屋，贫雇、工人分好的，地主富农分坏地。田地按人平均分的，边打边分，苏维埃政权建

立到哪里就分到哪里……

开始分田以插牌子为记。发展农会，乡苏设土地委员会，村乡区主席，下层设土地委员，后来乡苏维埃发给农民土地证。南山里每人平均一斗田。先分田后分房，先红军后工人（木匠、铁匠），地富分最坏的田。分出地富，流氓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地主，小资产阶级富农，半资产阶级中农，流氓无产阶级赌博、好吃懒做的，常要饭的双弓子，狗腿子，帮地主跑庄子的。

第一批：斑竹园、白沙河、牛食贩、小河、吴家店等五个乡苏维埃先改，收三个庄稼（一九三二年七月）。后来建区苏维埃，学了人平方法平分土地，每人平分一斗田，贫农与地主调整田调换村庄……

对土豪进行群众斗争。罪大恶极的通过斗争，群众说杀就杀。大地主都跑了，一般地主也分给田种，分给薄田地。

阶级：土豪劣绅，富农，富裕中农，中农，贫农，贫民，雇工。土改时，富农以上的，全部财产打光……

一九三〇年二月，瓦屋基、余子店、柏树湾、四道河共四个乡（后六区），收两个庄稼，到一九三一年八月。一九三〇年二月，东王庙、赵河子、苏仙石、二道河、朱裴店、四顾墩、王坳、杨楼、丰集（四区），收两个庄稼。一九三〇年四月，上石桥、南司、赵棚、观音山、武家桥、白塔集、东李集、回龙集、王集（后五区）收两个，一个没收到。一九三〇年四月，汤家汇、南溪、马河岗、双河、洞沟（一区）收三个庄稼。

附件（5）

方英在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 皖西北特委工作的报告（节录）

在土地方面，特委成立（四月二十七日）时，才有两区分配了。两个月来土地问题发生很严重的问题，过去并按人口来分配，这个当中豪绅地主分得了土地，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使贫农得不着很好的土地，对豪绅地主发生了慈善的现象。如商城一区分配了一部分的土地给豪绅地主家属……商城二区自动组织共耕队，互相帮助耕种……

一九三一年六月

附件（6）

中央关于“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的 决议（节录）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皖西北地方苏维埃政府对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的报告上，又说：“商城市分配土地，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主要的是没收的原则应用到中农的土地上去。所以商城不是没收豪绅富农的土地，而实是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六月底）。

从这一段话看来，则是“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是“犯了极严重的错误”。……

中央根据各苏区分配土地的经验，必须使全党同志了解，在实行平分土地的过程中，中农的土地以不动为原则。对于那些利用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去侵犯中农利益的“左”的企图，必须给以最严厉的与坚决的打击。但是我们不反对而且赞成在“基本农民群众（自然中农也在内）愿意和直接拥护之下”去实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因为这是土地革命最彻底的办法。

原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一）548—549页

附件（7）

吴忠泰的回忆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日

我原籍商城县吴家店吴家畷马王冲东岳庙，和吴氏祠对面，中间是一条河；土地革命初期，是商城县一区（吴家店区）第九乡。

一九二九年前后，我家九乡是漆少伯（共产党员）经常到田世润（共产党员）家来，商量分土地。先调查造册，划分地主、经营地主、富农、中农（没分上中农和下中农，有富裕中农）、贫农、雇农。划成份的标准是：

地主：主要是依靠剥削，不论有多少田地，请有长工，放债多，利息高。经营地主：佃田地多，自己不劳动，靠请几个

长工，放高利贷。富农：自己有田地、房屋、农具、耕牛，请个把人，多少放点债。中农：自己有田地，不请长工，没钱放债，全靠自己劳动，够吃。贫农：有点田地，又种一部分地主的田，住人家房子，没有耕牛、农具，靠租借，不够吃穿，还欠债。象我家七口人，住田家的房，种田家的田，还欠债，老大跑九乡边开山地，种黄豆、玉米、小米，老二帮工，穷得找不着对象，就我在家放牛，读了二年私塾，划为贫农。雇工：一无所有。

我家分田家龙的三斗田，不交租，自己有五升，在枫树湾，离我家住的地方有六华里。分配土地时，家有红军的，都按人分了土地给家里；同时，每个乡还划分有红军公田由群众耕种，收的粮食主要是救济红军家属。

注：吴忠泰，六十九岁，原任武汉军区副参谋长，现任顾问。

附件（8）

信阳中心县委扩大会的决议案（节录）

一九三〇年二月五日

（二）对中央文件的报告和讨论

A、中国农村关系之特点（特点共计十点，结论四点）

- 讨论：1、从此地事实看来，富农在农村剥削者，有时更超过于地主劣绅。
- 2、农运与反帝运动不可分离。
- 3、富农含有买办性……

C、党在农村中之任务与策略

讨论：1、以雇农、贫农为基础，以中农为同盟，反对富农。

2、富农有半地主性的封建剥削。

3、以雇农为无产阶级基础……

D、过去的错误（共计三点）

讨论：1、在商南富农全走到反动地位，因此红军对富农等于对待地主……

决议：由孔文彬同志负责起草接受（中央接受国际对于农运指示的决议）的决议。

附件（9）

为重新分配土地告商城工农劳苦群众书

（节 录）

过去分配土地，不仅富农偷取了土地的利益，并且小地主也分配了土地。分配土地，没有分配山场、竹园及森林。分配土地不是按照人口和劳动力的混合比例及土地生产量作标准来分配；而是按照人口的多少来分配（这样将会使人口多的人家得着很多的土地，而不能耕种，因老小太多，壮丁太少，以致田荒地废；而另一方面有劳动能力的人家又有力无处用……）。分配土地，有劳动能力的人反比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分得少些。分配土地，只是多退少补，原来耕种那块土地的人仍然还是得着那块土地没有变动（富农正是企图要地主豪绅、高利贷者的土地转交佃农手里即算了事）；分配土

地甚至红军士兵及游击队队员还未分得土地；而豪绅地主家属及流氓地痞倒反分得了土地；有些地方，土地还未分配，只是任人耕种（恰恰适合于富农的利益）；分配土地还发生重徭减裸的舞弊情形；分配土地还未有经过土地委员会及群众大会的讨论和通过，仅有几个苏维埃委员简单的指定；在分配土地的时候，地面上的粮食不是把富农的粮食随田分配，贫农和中农的粮食仍归原来主人收割，而是所有地面上粮食都随田分配；在人多田少之区乡，亦未能使农民群众自动的迁移一部分到土地宽裕人口较少的地方，分得较多的土地耕种。因为不执行我们土地法令所规定的分配土地的原则与方法的结果，在一方面富农多余的土地或较好的土地未拿出来，地主流氓地痞分得土地，山场、林木等都未分配，致使土地本来够分配的地方亦感到土地少（相对的少），人口多（相对的多）不够分配的困难；另一方面，因为没有使群众了解移居的益处，挤住在一个人多（绝对的多）田少（绝对的少）的区、乡，土地虽分配了，总是不够耕种。过去分配土地不得当，不仅损害了中农利益，并且也损害了贫农利益，这样正使富农及豪绅地主的残余得以阴谋破坏和阻碍土地革命的深入，损害了农村的基本阶级的利益，动摇了无产阶级雇农、贫农与中农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地主资产阶级，同样也反对富农企图缩小和阻碍土地革命的巩固的革命的联合战线，所以我们必须要坚决的反对和坚决的斗争，必须要彻底地重新来分配。怎样分配，才不违反真正劳苦群众的阶级利益呢？才能使土地革命利益落在真正贫农和中农身上呢？

第一、就是将以前的豪绅地主和祠田公产以及一切反动

派的土地，没收来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豪绅地主及其家属、反动派以及一切不是靠自己耕种土地过生活的人，都没有分配土地的权利。

第二、要按人口和劳动力（就是有耕种能力的人）混合比例的方法来分配所有的土地。打一个比喻来说，某一乡统计有田地一千六百斗，统计人口有一千人，可是内中有六百人口有劳动力的，其余四百人口是没有劳动力的（如孤老寡废者），那么，平均分配起来，有劳动力就应当得二斗，没有劳动力的，就应当得一斗。如果某家有一个有劳动力者，还有一个没有劳动力者，那就共总得三斗。其余照此类推。

第三、除大森林、大竹园及水堰这些无法分配的东西交苏维埃管理外，其余山地、池塘、菜园……等等，也都要按照平均分配的方法来分配。这一个分配的标准可以根据价格的高低来计算。比如：某一块菜园地出产量，可以值得三十串钱，那么就当作三十串钱的地面一样来平均分配。

第四、分配土地，要以出产量来计算，就是说，这一块土地如只出产一斗稻子，那么就是一斗田，出两斗就是两斗田。这样分配起来才公平。

第五、分配土地的时候是以乡为单位。首先由乡苏指定十个或二十个忠实可靠的丝毫没有感情作用的人，组织土地委员会，在可能范围内亦可由群众大会选举土地委员会，由土地委员会把全乡的土地、人口调查统计出来多少，然后再按照上面所说的“人口和劳动力混合比例”及土地生产量做标准，来平均分配。如果发现营私舞弊或分配不适当，马上可提出来重新决定。

第六、凡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革命劳苦群众，不分男女

都应当享有土地的权利。失业工人要土地，当然也要分配给他。红军士兵更应当有分得土地的优先权。

第七、大家要多分得土地，只有组织移居队，经过区苏或县苏移居到土地较多人口较少的地方去，要打破保守观念，怕离开家寓不敢出门……

中国共产党商城县委会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附件（10）

红四军十师二十九团政治处

颁发的土地使用证

（抄 录）

土地使用证

反动

今没收 地主 余光乐土地四亩五斗升合，坐落胡家畈
豪绅

地方，特分给商城县安区八乡分配农会 会员余先民永远耕种。

此 证

红四军十师二十九团政治处（印）

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附件（11）

常 毅 的 回 忆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日

一九三一年六月成立了特区，特区管辖五六两个区。特区苏维埃政府设在蔡店沙子岗，特区的少共书记是胡玉书。当时六区管草庙集、瓦庙集一带。

区苏维埃成立不久，为巩固苏维埃政权，发展苏区经济，便成立了区、乡土地委员会，成员是党团员和贫雇农，实行分田地。当时有个土地大纲，区乡土地委员会进行讨论，没收地主豪绅的全部土地财产和最坏富农的全部土地，以乡村为单位实行平分土地，照顾军烈属和贫苦农民，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分到的田地发给土地证。当时我家分了十五亩田。那时正是秋收时，分给谁家的田，归谁收。人民情绪很高，见面时都是喜气洋洋，青年踊跃参加红军，当时经我宣传动员，有三百多名少先队、赤卫军参加红军。五区游击大队由原来的十余支长枪、两挺手提机关枪，扩大到六百余人，五十余支枪，大队长叫张豁鼻子。

附件(12)

土地改革图表

(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二年)

项目 \ 年度	1929	1930	1931	1932	合计
实行土 改乡数	20	45	11	27	103
分得土 地人数	15470	61800	12680	31672	121622
分配土 地面积	56622	95150	37500	40259	229531
备 考					

抄自商城县革命历史展览馆

赤城红日社

中共商城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

“赤城红日社”，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红三十二师攻占商城，成立赤城苏维埃政府以后创办的文化宣传机构，它下设三个单位，即“红日报社”，“红日印刷厂”，“红日剧团”。在那革命烈火遍地燃烧，人民群众的斗争激情奔涌的形势下，赤城红日社极受欢迎，它为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在配合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有着不朽的功绩。

一、赤城红日社的建立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红军乔装取商城，长期受帝官封压迫的商城人民得到了解放，人民群众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这是鄂豫皖苏区红军首次用武力解放的县城。

商城解放以后，虽然群众初步了解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苏维埃是自己的政权，但实际情况如何？有什么政策？今后怎么办？这还是普遍担心的问题。这时，红三十二师司令部和赤城苏维埃政府及时贴出了安民布告，印发了《告边区群众书》、《告红军书》、《慰问红军家属书》，宣布共产党的政策，提出了工农当家作主的号召，使得群众安下心来，增强了参加斗争的勇气。

这些布告，就是赤城县委叫城内一家“文明石印馆”赶印出来的。原来，商城一解放，县委和红军司令部就派人找

到文明石印馆，组织了十多个印刷工人，向他们宣讲了革命形势，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些穷工人，本来就有革命的要求，于是，他们日夜奋战，几天之内就印出这些布告。

根据这种情况，赤城县委、苏维埃政府及红三十二师司令部领导人，便注意到了宣传教育的作用，在苏维埃政府中设立了文化委员会这个机构，委任原办过“商城书社”的共产党员吴靖宇为主任，创办“赤城红日社”，吴靖宇兼任社长，接着成立红日印刷厂、红日报社、红日剧团，组织发动有文化、思想进步的人员参加工作，配合党的中心任务，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一九三〇年正月，红日社随苏维埃政府迁到商城南部山乡，一九三二年二月再次迁回商城城内，轰轰烈烈地活动了近三年时间。当时，皖西北特委曾向中央报告说：“各县委区委均设有宣传部，支部也有宣传干事，除商城县委宣传部尚能经常进行宣传工作时，其他各县各区及支部都不能建宣传部经常独立工作。”而当时商城县委宣传部的的主要工作是由文化委员会担负的，可见红日社在苏区文化宣传建设上有一定的成就。

二、红日印刷厂

早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员吴靖宇等人曾开办“平民夜校”，用以宣传马列主义，提高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文明石印馆的工人大部分是该校的学员，通过夜校学习，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文明石印馆的老板周雁宾也是个开明绅士，倾向革命，愿意为共产党做点工作，献点资产。所以，赤城红日社成立以后，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就以文明石印馆为基础，创办了“红日印刷厂”，任周雁宾为厂长，二十多名

工人，三架老式石印机。

红日社成立不久，因国民党反动派对商城的疯狂反扑，一九三〇年农历正月十八，随红三十二师和苏维埃政府撤退到商城南部的南溪、汤家汇一带，红日印刷厂驻在南溪吴家湾的吴家祠堂（秋天又移驻禅堂庙）。迁移时，文化委员会主任、红日社长吴靖宇领着工人将城内几家文具店的纸张、油墨全部买光，将机器拆开，挑的挑，抬的抬，运到商南。从此开始了更为艰苦的工作。

县委、县苏移驻商南以后，便对红日社进行了调整、充实和具体的分工。这时印刷厂困难重重，不仅要按期印完每期报纸，还要印刷苏区党政军的各种宣传文件和“列宁小学”的课本，印刷量非常大。从城里带去的石印机，是传统的老式印刷工具，工序多而复杂，每个机器要四个人操作，摇一下，印一张，工人们轮流值班，人闲机器不闲，昼夜工作，以保证印刷任务的完成。

由于大量用纸，时间不久，就出现了纸张危机，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严密封锁，用纸就更为困难。苏区党组织一边设法到麻城、固始、商城县城等地购买，一边动员全苏区节约用纸。那时，编辑们写稿，甚至县委、苏维埃政府起草文件都用废纸，省下好纸交给红日社，想尽一切办法保证报刊的印刷。还有不少同志为到白区买纸，被反动派认出，献出了生命。

在几次反“围剿”斗争中，商南苏区屡遭进攻，印刷厂的同志历尽艰险。敌人对红日社极为恼恨，有时专门派兵袭击。但印刷厂的全体人员毫不畏惧，同心抗敌。敌人来了，同志们将机器埋起来，拿起枪打敌人；敌人走了，又把机器

挖出来，用水洗掉机器上的泥土再继续印刷。只要红军打了胜仗，或党有什么重要指示精神需要宣传，他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千方百计保证完成任务，让报纸撒遍苏区，及时报告每一个好消息，鼓舞人们的斗志。

一九三一年初，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商南根据地与英山、霍山、黄安、麻城根据地连成了一片，纸张问题得到了解决。这时，党组织又给印刷厂送来一副木印箱子（收缴反动大地主的），是采用活字印刷的方法制的，印刷起来比石印快而简便（现首都军事博物馆存展有其字块）。这样一来，扩大了报刊的印刷量，提高了印刷速度，使得工作越来越展开了。

三、红日报社

红日社成立之初，主要是以创办“红日报”为主，以后由于革命需要，才逐步发展，规模渐大。红日报社开始设在蔡巷口周雁宾家的房子里，根据县委的安排，由陈世鸿任总编辑，顾醒吾、吴月芳、钟宝太等人任编辑。编辑们四处采访，收集撰写稿件，然后由县委领导审阅，交印刷厂印刷。出版“红日半月刊”，“红日五日刊”（单张的）和“红日画刊”、“红日漫画”等报刊。

“红日报”第一期是撤退到商南后出版的，报纸有四开新闻纸那么大，正版报头“红日报”三个字用红色套印。重要内容的标题也都是印为醒目的红色。整个红日报内容，有党指导苏区全面工作的文章；有红军打了胜仗，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消息；有敌人的活动情况和骚扰苏区、残杀人民的罪行；也有根据地军民英勇杀敌，努力生产的模范事迹。另

外，编辑们还精心组织了一部分短小的小品文、诗歌、精彩的漫画，以及大量激动人心的革命歌曲。

报社还设立了发行组，均由十四、五岁的小孩子组成。报纸印出后由这些孩子充当邮递员，发往苏区各地。

红日报问世后，以她丰富多彩的内容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在人民群众中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赤城县委依靠红日报社这个宣传阵地，还创办了机关刊物——“咆哮”旬刊，单张两版版面，着重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导苏区各级机构领导的工作。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商城县委也出版机关报《少年先锋》，向青年进行宣传教育，指导其参加革命活动，如一九三一年出版的第十三期上登载的《怎样来纪念十月革命节》。少共商城县委儿童局也出版了八开纸大小的《共产儿童》。以上几种机关报均为刻印。在当时，由于材料和环境的限制，连红日报也曾刻印过。

红日报社不但出版红日报，还大量印刷《告白区人民书》、《告白区士兵书》等宣传品，散发到六安、苏家埠、商城等敌人的巢穴里；分化瓦解敌军，启发白区人民的觉悟。这些宣传品散发以后，经常有三三两两或成班成连的白军士兵怀揣宣传品，来苏区投诚，特别在驻商城的吉鸿昌部队中影响更大。

四、红日剧团

在红日社几个下属机构中，红日剧团的活动甚为活跃。商城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歌之乡，群众对歌曲特别喜爱。红日剧团创办后，便在苏区产生了很大影响。

商城刚打开不几天，红三十二师司令部收到一首民歌，

名曰《打商城》，其中唱到：“民国十八春，红军打商城，打得敌人乱纷纷，喜坏我穷人……”。编此歌的人叫王霁初，司令部的同志了解到他具有很厚实的音乐才能，便动员他参加了革命。十多天后，他写了《八月桂花遍地开》一歌。此歌一唱，便广为流传，影响很大。王霁初的活动，为红日剧团的前身打下了基础。当时红军司令部、县委、县苏都认识到，开辟并巩固根据地，不能没有一个宣传队伍，于是决定成立一个剧团。文化委员会、红日社的同志们赶紧筹备，招收青年男女参加剧团，王霁初贡献出他自己开戏班子的一套行当，又指导购买了一部分道具，在苏维埃迁到商南后，“红日剧社”正式成立。王霁初当团长，二十多个演员，除少数老演员，大多是新招收的年轻人，大的十七、八岁，小的十三、四岁，有吴赤慎、岳赤荣、张赤原、廖赤月、桂赤廷、曾赤萍等。这些人原不叫此名，进了剧团以后，王霁初将每人的名字的中间一个字改为“赤”，以表示参加革命，当红色演员的意思。

红日剧团的演员在王霁初的指导下，严格训练，演技逐渐提高。戏剧脚本、歌词、舞曲等都是王霁初和报社总编陈世鸿等人创作的，有不少是改编传统的曲调，添上新内容。由于王霁初有着丰厚的艺术功力，所编节目独具风格，悦耳易唱，优美感人，带有京戏味，使人在看演出的过程中，既能受教育，又有一种快慰的享受。他们演唱的节目很多，其中有《八月桂花遍地开》、《打商城》、《穷人调》、《反动派沙嘴》、《空树枝》、《兵变歌》、《乌鸦》、《杜鹃》、《十二月宣传歌》、《送郎当红军》等等。红军的战斗，苏区人民生活中一朵斗争的浪花，一个闪光的思想，一

桩感人的事件，他们都能够信手拈来，变为宣传演唱的材料。

演员们带着这些节目，四处奔走，爬山涉水，风餐露宿，为苏区人民演出，配合党的中心工作进行宣传教育。红军打了胜仗，区乡成立苏维埃，欢送子弟兵参军，土地改革，欢迎白军士兵起义投诚等，他们都去演出慰问。有时路经白区，冒着枪林弹雨冲过封锁区，碰到反动分子的干扰破坏，演员们毫不畏惧，勇敢与之斗争。红日剧团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鄂豫皖苏区，群众欢迎，红军欢迎。剧团不但演出，而且走到哪里，还把革命歌曲教到哪里。当时整个苏区，大人小孩都自觉不自觉地学唱革命歌曲，开会唱，甚至连走路，到田地里生产也唱。在歌声的鼓动下，人们踊跃参军，勇敢地与地主豪绅斗争，影响极为广泛。

一九三一年秋后，皖西北道委领导在看过红日剧团的演出后，和赤城县委协商，将剧团调到道委，使剧团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四五个月后，鉴于剧团的宣传教育作用很大，群众对剧团很欢迎，赤城县委在原剧团调回两个老演员，重新组织了红日剧团，有十多人，吴月芳任团长。一九三二年春天，红军第三次攻占商城，县委、县苏各机关从商南迁回城内。这时，王霁初带领皖西北道委剧团回到商城城关，协助赤城红日剧团，在县政府大操场、城隍庙、南河湾搭了几个大戏台，连日演出。城内和城郊的群众听说原来的红日剧团回到商城，扶老携幼，纷纷涌去观看，学唱歌曲，一时城区革命歌声响不绝耳，更增添了解放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欢乐气氛。皖西北特委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八日，向党中央报告说：“……商城红日剧团有经常的组织和按期的演习，成绩

尚好。”

由于党的重视，革命的需要，群众的喜爱，红日剧团在鄂豫皖苏区的活动影响很大。如今，许多从鄂豫皖苏区出去的老红军、老同志，和现在还活着的老人们，每当问及，都能唤起他们激动的回忆，情不自禁地唱上一段。

本文根据以下资料整理而成：

(1)《赤城红日社》，载《大别山烽火》，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红日剧团》，载《大别山烽火》。

(3)《皖西北特委报告》，1931年8月18日。

(4)吴冠宾同志的回忆，1982年7月。

(5)吴淑慎同志(原“红日剧团”演员)的回忆，1982年7月。

(6)张宜清同志(原“文明石印馆”工人)的回忆，1985年8月。

(7)周鹏三同志(原“文明石印馆”工人)的回忆，1985年8月。

(8)《王霁初》，载《烈士永生》1985年第5期。

(9)《皖西北特委组织工作决议案》，1931年4月。

(10)《“八月桂花遍地开”的由来》，载《星火燎原》1982年第3期。

此外，还参看了首都军事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纪念商城起义五十周年纪念馆”展品和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等书刊。

执笔人：桂诗新

一九八五年八月

鄂豫皖苏区卫生工作简介

张全德

鄂豫皖苏区卫生事业是随着根据地斗争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九三一年秋，苏区各级政府建立后，所有的苏区县都建立了卫生行政组织，多数苏区县，都建有县医院，采用多种形式，全面地开展了群众性的治病和防病运动。

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苏区卫生事业遭到空前的破坏与摧残。尽管革命历程极其艰难曲折，但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苏区的卫生事业，在党的领导下，从未间断过。

一、红军卫生工作的发展

鄂豫皖区红军的卫生工作，大体上分以下几个时期：

(一)萌芽时期：从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退出黄安县城转移到木兰山后，到进入柴山保站稳脚跟的一九二九年夏，是红军卫勤工作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红军刚刚诞生，人数少，装备差，对敌斗争以朴素的游击战为主。后勤各项保证工作还没有固定的组织，有些尚未建立，有些刚刚诞生。仅有个别简陋的红军医院，如鄂豫边的刘家湾（今属红安县七里区）医院与商南的斑竹园（今属金寨县）医院等①②。

(二)形成时期：从一九二九年夏到一九三〇年夏，是鄂豫皖边区三块革命根据地、三支红军统一形成时期。这一时

期，刘家园医院已迁移到箭厂河，红军的卫勤保障工作体系逐渐形成，不但有后方医院，红三十一师及红三十二师前方医院也开始建立起来，对伤员已开始进行分级救治，对保障部队战斗力发挥了很大作用。

（三）发展时期：从一九三〇年夏到一九三二年秋，是卫勤工作的发展时期。一九三〇年五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苏区代表及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确定工农红军编制草案，规定了连至集团军各级卫生组织编制^③。会议精神传达到鄂豫皖苏区后，红军卫勤各级组织机构都较系统的建立起来。除箭厂河医院扩建为红军后方总医院外，还建立了一些分医院、临时医院和地方医院。前方军、师有医院，团、营有医务所，伤员的阶梯救治体系已粗略的建立起来。并且医院还分中医（内科），西医（外科）。箭厂河后方总医院还设有传染病房，对伤病员已开始进行分类收容。一九三一年底箭厂河后方总医院还新盖了一座全区独一无二的两层“走马转楼”，人称“洋房子”。全院医务工作人员共约二百多人，另有学员一百多人，能收容伤病员一千多名。由于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卫勤保证工作随着根据地的不断巩固与发展，逐步建立了比较雄厚的后方基地，医疗机构也有了较为健全的组织体制和管理制度，使得卫勤保证能力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

（四）坚持斗争时期：一九三二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卫生工作便进入到艰难的坚持斗争时期。这时，根据地丧失殆尽，大部分医院被敌人捣毁。红四方面军离开苏区后，留下的总医院部分医务人员及大批伤病员活动在天台山、老君山、卡房、仰天窝、茅草尖一带的荒山野林里，继续

为伤病员服务。只在新集西北的连塘（康）山及赤城、赤南还保留了几个分医院。

二、苏维埃政府卫生组织的建立

早期的苏维埃政府还没有力量发展卫生事业，苏区的卫生防病工作，多由红军医院担负。由于战争升级，战斗频繁，红军卫生医疗任务逐渐繁重起来，于是苏区的卫生事业就在红军卫生工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特别在一九三一年夏至一九三二年秋，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分村、乡、区、县、省（特区）五级。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各种委员会工作概要说明》中指出：在省、县苏维埃政府的内务委员会中设社会保险局、卫生局（县为卫生科）等。社会保险局按照工作条例办理社会救济事业；卫生局按照规定的卫生计划办理饮食清洁、医生登记、防疫、卫生检查、水井检查等；劳工委员会中的劳动检查所，还负责检查工厂卫生。区、乡、村苏维埃政府，设有文化卫生委员，负责所辖区内的文化教育和卫生工作④。这些规定充分说明党和政府对卫生工作是非常重视的。

三、苏区地方医院

为了配合根据地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不少县先后建立了医院。如：

（一）固始县医院：固始县苏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在武庙集、锁口镇、王新房子南院设立有地方医院⑤。

（二）金家寨医院：一九三一年四月，皖西特苏在金家

寨成立，特苏下设有医院，此医院为皖西与豫东南地区最大的地方医院⑥。

（三）罗山县医院：罗山县苏维埃政府于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在宣化店成立时，曾设有县医院，后因战争迁往王吉榜，最后又迁至祝家山（今均属大悟县）⑦。

（四）河口县医院：一九三一年秋河口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时（今属大悟县）在河口镇设有县医院⑧。

（五）陂孝北县医院：一九三一年夏，陂孝北县苏维埃政府在花园（今属孝感县）成立时，设有县医院，后因战争迁往仙居顶（今属红安县）⑨。

（六）霍山县医院：霍山县第二届苏维埃政府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在诸佛庵（今属霍山县）成立时，曾设有医院和药房⑩。

（七）五星县医院：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星县苏在燕子河（今属金寨县）成立，县苏下也曾设有县医院。地点在燕子河街北头⑪。

鄂豫皖苏区极盛时期，拥有六座县城、二十六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当时，凡有条件的县（特别是老苏区）都成立有县医院或临时医院。不过这些医院存在时间不长，一九三二年秋后，均遭到敌人破坏。其后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未再建立过地方医院。

四、苏区民间医院

根据地除苏维埃政府设有地方医院外，还有消费合作社中的药房，社会上私人开业的药店以及散在民间的中医、中药人员等。这些医疗形式是边区医疗卫生事业中的一支重要

辅助力量，在解决缺医少药问题上，发挥了很大作用。

（一）消费合作社中的药房。苏区消费合作社除经营日常生活必需品外，还设有药房。此药房是个药材购销与行医结合的组织，药房内配有医生为群众看病。象这样的前店后医的药房遍及苏区所有区、乡，大大方便了群众。

（二）私人药店，坐堂应诊。一些中医、中药人员在城乡开设药店，既看病、又售药，很受群众欢迎。如新集有保元堂、太和堂，箭厂河有大生祥、吴子英等药店。这些药店多为祖传，他们通晓中医理论，重视药品炮制，在群众中颇有声誉⑫。

（三）散布在民间的中医药人员单独行医。社会上有些散在的中医、中药人员，他们边种田，边为群众看病，特别在疫病流行时，他们发挥了很大作用。如田铺乡（今属新县）的韩晓阶、光山县弦南区的杜子钦、黄安县紫云区（今新县箭河乡）的戴绍义、石生钊等，都是当地较有名望的中医。他们为革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五、便衣队的“山林医院”

便衣队很有群众基础，是坚持鄂豫皖革命斗争党政军一体化的第二支主力，在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便衣队除担负宣传发动群众，配合主力作战，补充兵员，打粮，征粮等任务外，还担负掩护红军伤病员，进行妥善安置和治疗的任務。红二十五军长征后留下的二三百名伤病员，都是由便衣队协助医院安置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红二十八军和鄂东北独立团在作战中负伤和掉队的伤病员，也大多是由便衣队收容安置的⑬。

为了便于伤病员的休养治疗，便衣队协助医务人员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在深山野林里办起了“山林医院”。如一九三六年岳西县大岗岭及英山、霍山、岳西三县交界的鹤落坪一带的山林里都曾办过医院，医务人员负责治疗，便衣队负责采办药物及生活用品。赤城金刚台的妇女排也收治了不少伤病员⑭。这些山林医院对红军的卫勤保证工作，起到了很大作用。

六、根据地卫生防病工作

鄂豫皖苏区始终未建立专职卫生防疫机构，根据地的卫生防病工作主要由红军医院来担负。由于敌人对根据地不断的进行野蛮的屠杀与经济封锁，到处疮痍满目，田园荒芜，生产破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而疫病时有流行。如一九三〇年天花流行，病死者甚多；一九三一年瘟疫大流行，党政干部及群众病者达三分之一以上，有些区委及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因染病竟致影响日常工作的开展⑮。

根据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卫生防病问题，确实是根据地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一九三一年二月十日《鄂豫皖特委报告》中曾提出：“卫生问题是个严重问题。……现在伤病又多，疾病亦易发生，以至农村中健全的人很少，特委已开始厉行卫生运动了。”于是一九三一年二月的“鄂豫皖特委扩大会议”向全区军民发出号召：注意苏区卫生，开展卫生运动。一场移风易俗，讲究卫生，预防疾病的群众性卫生运动，就在苏区内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首先由各级苏维埃政

府进行动员，广泛宣传，发动群众，使群众明了，疾病可以帮助敌人，减弱革命力量，影响革命斗争任务的完成；号召群众扫除过去统治阶级遗留下来的一切污秽，纠正不良卫生习惯，破除顽固守旧的迷信思想，并提出通气、通光、通水、清洁等简便易行而有效的防病方法，从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经过这次运动，使苏区的卫生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九三一年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苏区的财政经济、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建设大大发展。一九三一年七月政府卫生局（科）建立后，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卫生计划和工作报告，并对各项卫生措施，具体组织实施与检查，苏区的卫生防病工作，就不断的深入开展起来。

苏区卫生运动的开展，不单是一项清洁运动，而且也是一项与革命斗争相联系的政治任务。并且由于群众自觉的自身的不良卫生习惯与头脑中封建迷信的守旧思想作斗争，从而起到了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作用。

一九三二年秋以后，苏区的卫生事业和其他各项事业一样，均遭到敌人野蛮的破坏。因此，地方上的卫生工作，就无法单独开展了。

七、红色卫生队伍的建设

（一）上级派遣

胡明政、邵达夫、张克彬等同志，都是从苏联回国后派到苏区来的，苏井观同志是从潢川“三友药房”派来的。上级派遣的卫生人员为数较少，有些还在党内斗争中被“肃掉”。他们来到苏区后，多担任领导工作，对苏区的卫生事

业作出了很大贡献。如苏井观，忠心耿耿为党工作，对苏区及红四方面军卫生工作的开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吸收当地卫生人员

苏区民间散布不少中医、中药人员，有些比较先进的分子，被吸收到革命队伍中来，如戴淑先、刘典初、吴子南、刘子凤等人，都是当地较有名望的中医，他们参加革命后为苏区的卫生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成为卫生队伍中的骨干力量。如吴子南叔侄三人，原在固始县三河尖开药店，由于倾向革命，连人带药都参加到红军医院中来^{①⑥}。

（三）留用起义或被俘卫生人员

国民党军队中医务人员，有些受红军的影响，在我党号召下，少数人投入到革命队伍中来；还有不少被我俘虏的国民党医务人员，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愿留在苏区工作。如一九三〇年三月，双桥镇战役，俘虏了国民党三十四师所有医务人员，经过教育后，大部愿留在根据地工作。这些起义或被俘国民党医务人员，大多经过正规学习，医疗技术水平较高，后来大部都成为红军卫生工作中的骨干力量。如钱信忠同志为苏区培养训练了大批医务人员，对苏区及红二十五军的医疗卫生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自己培养

自己培养是发展苏区卫生队伍的主要途径。培训的对象有三：即苏区列宁学校中的学生，农村略识字的男女青年及部队中的年青战士。培训的方法有三：即在学校或医院中办学习班，在工作岗位上边工作边学习，及选拔一些有文化基础的青年战士或卫生员，跟师学习。

自己培养的卫生人员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培训时间短，

不正规，但是他们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丰富的战场救治和卫生防病工作经验，土办法多，适应性强，能吃苦耐劳，不怕牺牲，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完成任务。如在大别山坚持十年斗争，从童养媳成为护士长的张映清同志，及曾被红二十八军授予“医务模范”光荣称号的范绣楼（范明）同志。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鄂豫皖苏区培训的各类卫生技术人员，据不完全统计约有五、六百人。

八、苏区卫生经费的供应

在根据地建立前后的一段时期，苏区的财政来源主要有三：一是取之于民，就地筹集解决；二是打土豪，没收地主的财产；三是取之于敌，以战养战。一九三〇年春，开始土改后，苏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逐步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一九三〇年九月苏区实行农业累进税；一九三一年二月，建立苏区银行，共发纸币票六万元；十月，特苏又作出商业累进税之规定。这样，苏区财政就大体上向统一筹划、统一货币、统一管理的供给制过渡，直到一九三二年秋，苏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发展，战胜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保证了党、政、军的供给，支援了战争。故这一时期，医院经费、物资的来源都由特苏转给各级苏维埃政府作计划供应。

一九三二年秋以后，斗争环境恶劣，群众生活也非常困

难，医院后勤物资的供应也更加困难，医务人员的生活还要靠下山打粮或挖野菜来维持。

注 释：

①林之翰《我们的红色医院》，载《鄂豫皖苏区革命史资料选编》（一），华中师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1979年6月。

②谭克绳等《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第48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

③刘燕鑫等《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工作大事年表》，载《湖北卫生志》第七辑，湖北省卫生志编辑室编印，1985年4月。

④《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各种委员会工作概要说明》，新县党史办、文管会提供。

⑤固始县文化馆资料摘抄，1984年6月7日。

⑥张经安《三打金家寨》，载《立夏节烽火》，中共金寨县委宣传部编印，1980年12月。

⑦《大悟县苏区医疗卫生工作》，大悟县卫生局编志办公室编印，1984年5月24日。

⑧同⑦

⑨同⑦

⑩《霍山县革命大事记》第24页，霍山县委宣传部编印。

⑪《沈万荣谈燕子河医院情况》采访记录，1983年12月19日燕子河区医院供稿。

⑫杜德明等《新县卫生志》上册第29页，新县卫生局编印，1983年12月。

⑬《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史资料选编》，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八军战史编委会，1982年12月。

⑭《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后勤工作概况》，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战史编委会，1983年12月20日。

⑮方正良《箭河公社卫生志》，载《新县卫生志》下册。

⑯《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鄂豫皖区情况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1年10月9日。

杨山煤矿工人武装暴动

中共固始县委党史办、固始杨山煤矿委员会

河南省固始县杨山煤矿（原属商城县）工人武装暴动，爆发于一九二九年十月五日。这次暴动是根据党的“八七”会议和“六大”会议精神，在著名的商南起义的影响下，在本矿区工人不断进行合法斗争并得到锻炼的基础上，按照中共商城县委指示举行的。胜利后，矿工们在党的领导下，迅速建立起自己的组织（杨山煤矿赤色工会）以及自己的武装（杨山煤矿工人纠察队），开始了武装割据的斗争。在斗争中，这支矿工武装由于得到工农红军的支援与邻近地区农民赤卫队的相互配合，因而连续取得胜利，创造了一块革命根据地，为革命事业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骨干。

杨山矿工武装暴动，在我国工运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中国煤矿史》、《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都把这次暴动写入了它的重要篇章。现将这一暴动的前后情况分述如下：

（一）

早在三百年以前，杨山农民就利用矿山资源，办起小煤窑。到了一九二〇年，杨山地区的小煤窑多达二、三十处。那时，当地豪绅和外地资本家见有利可图，便互相勾结，依仗权势，在杨山陆续办起几个规模较大的煤矿，并挂上“杨山无烟煤经销公司”的招牌。几年时间，矿工猛增到一千

四、五百人，壮大了工人阶级队伍。矿主唯利是图，只知从矿工身上榨取血汗，而不关心矿工的死活。矿上的劳动量过大，安全设备极差，更无劳保、福利条件，造成矿工大量伤亡，矿工被矿主、工头鞭棍打死打伤的事件也是屡见不鲜。杨山脚下的风波石经常躺着血迹斑斑的矿工尸体。因此，灾难深重的杨山矿工早就富有冲破牢笼，谋求解放的革命思想与反抗精神①。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鄂东北地区胜利地举行了黄麻起义。革命风暴迅速卷向了豫东南地区，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一九二八年初，中共河南省委为了加强对发展中的工农运动的领导，在潢川城关建立了中共南五县特委，所辖潢、商、固、息等县也分别建立了县委。同年三月，南五县特委领导的固始大荒坡起义失败后，新建立了的各县委虽然都遭到破坏，但商城县委不久即告恢复，特别是商城南部的和区、乐区党组织仍有较好基础，并成立了商南区委。此后，商南区委一面在和、乐两区抓紧工作，准备举行武装暴动；一面派李梯云、詹谷堂等领导同志到商固交界的二道河、杨山等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以便在党的领导下，相机行动，配合商南暴动②。他们通过原来在杨山一带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员刘宪章、张平舟、雷长友、张泽礼，首先把杨山煤矿的优秀工人吴雪桥、汪作清、彭仁桥、高五堂、晏永香、柳玉芝等发展为党员，建立起杨山煤矿党支部，由张泽礼任支部书记③。

杨山煤矿党支部建立以后，立即对杨山煤矿历史上的斗争及矿工生活状况进行全面调查，对当时革命形势进行认真分析，确定了“从加强经济斗争入手，充分发动矿工群众，抓

紧培养骨干，争取早日举行暴动”的方针。不久，党支部又围绕这一方针，针对杨山煤矿现实问题，决定向矿主提出三条要求：1、增加矿工工资；2、实行“三八”制；3、改善矿工食宿、医疗条件与井下安全设施，作为发动群众开展经济斗争的奋斗目标。然后通过党员秘密串联，很快把三条要求传达到矿工群众中去，得到了矿工对这次经济斗争的积极支持。商南起义的胜利，更鼓舞了矿工们的革命斗志。在党支部的指示下，张泽礼和吴雪桥便以矿工代表的身份，将矿工们的三条要求首先向岭东矿主高富兴，岭西矿主汪培禄提了出来。接着各煤矿、矿窑都热烈响应。顿时，整个杨山沸腾起来了！矿主们被这一行动所吓倒，慌忙接受了矿工的三条要求。

时隔不久，反动矿主高富兴图谋报复，制造了残杀矿工吕天顺的血案。矿工们义愤填膺，连日游行示威，高喊“打倒土豪劣绅！惩办反动矿主！为死难工友报仇雪恨！”。党支部抓住这一时机，立即带领愤怒的矿工包围了高富兴的老巢——高家楼，吓得高富兴逃进固始城内。

仅在一九二九年夏季，杨山煤矿就接连四次成功地开展了这类斗争，大灭了矿主的威风，大长了矿工们的志气，也锻炼和提高了矿工们的斗争本领。从此，杨山矿工便由经济斗争转上了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

一九二九年七月，杨山煤矿党支部再次对当时革命形势进行全面分析，认为本矿举行武装暴动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决定把党支部工作重心放在暴动前的准备工作上。随之，党支部对暴动前的准备工作着重抓了四项：1、在矿上继续开展合法斗争，进一步争取矿工，组织矿工，以扩大暴动力

量。2、派骨干与附近地区的农民赤卫队取得联系，以便在暴动时给予配合。3、组织秘密游击队，采取“摸瓜”的办法，积极为暴动筹集武器和经费。秘密游击队组成后，第一次摸的是老鼠寺大劣绅祝大朋（外号祝鳖）摸回撅把子手枪一支，银元宝十只④。4、设立秘密联络点。由张泽礼及其爱人晏永香（均系共产党员）在岭东煤矿的花石板开设个铁铺，借以掩护，为暴动搜集和传递情报⑤。经过一段紧张工作，一切准备妥当。

正当矿工们跃跃欲试的时刻，中共商城县委特派员王泽五来到杨山，连夜召开煤矿党支部大会，传达县委关于“杨山矿工立即举行暴动”的决定。会上，通过周密研究，制定了暴动计划，成立了暴动指挥部，张泽礼任总指挥，雷长友、吴雪桥任副总指挥⑥。

（二）

一九二九年十月五日，天高气爽，矿工们听到暴动信号以后，分别从岭东、岭南两处，奔赴暴动集合地——北矿⑦。苏仙石、峡口等地前来援助暴动的农民赤卫队员也恰好赶到了。张泽礼马上代表杨山煤矿党支部和暴动指挥部进行动员。大家情绪激昂，斗志旺盛，暴动的呼声震天动地。然后由雷长友一声令下，数百名起义者兵分三路，高举红旗，挥舞长矛大刀，飞奔山下的曹黑楼、徐下楼和桥头店，出敌不意，从劣绅家中夺取土枪六十多支。

当晚，这支暴动队伍得胜回山，在拐套子宣布成立杨山煤矿工人纠察队，共有八十多人，由张泽礼任队长兼党代表，叶金山任副队长，李一清任教练⑧。接着连夜奇袭二十

里外的集镇——樟柏岭，捉住劣绅项白胡子和刘谦夫，搞到一大批钱。然后派纠察队员徐裁缝、周长德到力集和西余集，用这批钱买回钢枪三支⑨。

可是，反动矿主高富兴仍盘据在高家楼依仗几支钢枪，继续与我为敌。高家楼位于矿山腹地，对工人纠察队威胁很大。如果不把高家楼打开，纠察队就站不住脚，更不利于创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加之高富兴是剥削残害工人的罪魁，不打开高家楼，工人们的仇不报，心也不甘。在这种情况下，纠察队决心攻破高家楼。可是，当时纠察队缺乏好武器，对高家楼攻打两次，不但没有攻破，纠察队员小刘反而被高家楼罗范傻子开枪打死⑩。于是，纠察队便派张一红到斑竹园向红军求援。红三十二师师长周维炯闻讯后，当天就率领队伍赶到杨山，纠察队配合红军，一举攻克高家楼。在这场战斗中，除高富兴带着几个喽罗逃窜外，纠察队活捉了杀人凶手范傻子，作恶多端的监工马仁科和高富兴的老婆吴小脚。范傻子、马仁科当场被处决，吴小脚被关押起来，作为与高富兴谈判的人质⑪。

在此期间，杨山煤矿还成立了赤色工会，雷长友被选为委员长，张泽礼、彭仁桥、高振武、柳玉芝等被选为委员⑫。矿山的一切权力都归赤色工会，工人们成为矿山的主人。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参加生产、管理生产，使煤炭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与发展。煤矿生产所得的利润，一部分用于革命经费，一部分分给工人。

（三）

杨山煤矿工人纠察队在攻克高家楼以后，又立即与当地赤卫队紧密配合，乘胜出击，先后攻克了郭家楼、李家寨、

秦北围、姚老家、吴上楼、洪下楼、凌家尖楼等十几个豪绅围寨，还杀死大恶霸李少伯等，开辟了一块以杨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

杨山煤矿工人纠察队所取得的辉煌成果，不仅有力地配合了商南起义，而且对临近地区工农革命斗争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杨山煤矿工人纠察队也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队员很快发展到一百八十多人，拥有长、短枪八十多支。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日，在赤城县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上，张泽礼被选为赤城县总工会委员兼赤城县工人纠察队长。杨山煤矿工人纠察队长由叶金山接任，党代表由张南太接任。它除了选送优秀队员补充红军外，还不断配合红军外出作战，多次荣立战功。

杨山暴动时的骨干，经过战斗洗礼，后来有一大批担任了领导职务，为革命事业作出很大贡献。例如张泽仁被调任观音山赤卫队长；吴雪桥被调任斑竹园赤卫团党代表；周长德被派到商城蚂蚁山煤窑参与暴动领导，暴动成功后担任工人纠察队长；晏永香被选为四区工会监委；雷长友被选为赤城县总工会委员长，不久又提升为县苏维埃副主席、保卫局长；汪玉川被选为皖西北特区第一任主席；张平舟担任小河区党委书记；张泽礼担任赤城县委书记、游击师长。同时，也有一批矿工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成为革命烈士。《河南省革命烈士英名录》所载的烈士名单，其中就有杨山煤矿工人纠察队员三十多名。

一九三二年秋，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红四方面军被迫西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几乎全部沦于敌手。杨山这块由暴动矿工多年建设的革命根据地被敌四十五师

侵占以后，敌师长戴民权便派一个加强连（连长朱友生）在山头修筑碉堡，长期盘据，给杨山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⑩。在那艰苦的日子里，富有革命传统的杨山人民并没有被敌人推行的“三光”政策所吓倒，杨山矿工纠察队在杨山人民的热情支持下，仍然在杨山地区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战斗。它先后编入赤城县赤卫第八团、商北游击大队，屡建战功，后又分散组成多个便衣队，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奉命编入新四军四支队，奔赴抗日前线。

执笔人：黄明远
任建忠

注 释：

- ①张富、李中堂的回忆。
- ②王玉田《商城惊雷》，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大别山烽火》。
- ③⑤⑥⑧⑫张富《矿山烈火》，见《大别山烽火》。
- ④黄本坦、张天云1962年为张富写的回忆录。
- ⑦⑧与汪志清、汪鼎成座谈记录；张富《矿山烈火》；张富1956年7月18日写的自传。
- ⑩⑬杨山煤矿老工人陈亨州的回忆。
- ⑪张富1960年写的《大别山回顾》。

新县枪会概况

中共新县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

新县县境的枪会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中兴起，成为当时“可以影响到全部工作，甚至可以影响到当地党的生命上”的一个问题。党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教育、改造枪会，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推动了鄂豫边土地革命。

一、枪会的兴起

大革命失败以前，新县县境没有驻扎军阀军队，军阀政治和军阀战争的危害比较微弱，但土匪溃兵的骚扰时有发生。为了保家保身，新县县境北部地区于一九二五年最早建立了枪会。随后，枪会由北向南缓慢发展，至一九二六年上半年，县境内只有少量枪会零星分散于各地。

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湖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动摇了乡村黑暗的封建宗法专制，震动了新县县境的豪绅地主。陈店、郭家河、新集、代咀、酒店、田铺一带的乡绅地主为了防止湖北农民革命向河南发展，纷纷建立枪会（见附件1），第一次形成了兴办枪会的高潮。大革命失败前夕，大部分村湾都有枪会。一九二八年五月，柴山保点燃“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一九二九年夏，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土地革命深入发展。县境中、北部之陡山河、千斤、吴陈河、浒湾等地的豪绅地主惶惶不可终日，为了阻止共产党和革命发展，维护封

建宗法制度和对农民苛捐杂税、高额地租的剥削，再次掀起了兴办枪会的浪潮（见附件2）。一九二六年秋至一九三〇年春，县境的枪会进入极盛时期，它遍及各乡镇，参加枪会的青壮年农民约五万人。

枪会是在绅权和神权统治下的原始农民武装组织，它有五花八门的名称，如红枪会、黄枪会、绿枪会、黑枪会、白枪会、孝子会、扇子会等等。其建制称“堂”或“馆”，每堂人数不等。它规定有严格的学规和学法，使用的武器大多是长矛、大刀。

在乡绅地主兴办枪会的同时，穷苦农民也自发建立了一些枪会，籍以武装自卫，保境安民。王岗（今属陈店乡）红学（即红枪会）、陈家湾（今属沙窝乡）黄枪会就是这种自发的民众自卫武装（见附件3）。另外，共产党员创办了一批红学，如四角槽门、郑家边、占家湾（今属箭场河乡）的三堂红学，胡家河（今属卡房乡）红学等，都是借用枪会旧名称的革命武装（见附件4）。

新县县境枪会兴起及风靡数载的原因，一是把握乡村基层政权的豪绅地主凭借着对农民的生杀予夺大权，以退佃、退房、开除出户族威逼佃户，强行建立枪会；二是豫南枪会及其反对军阀政治和苛捐杂税勒索的斗争给县境的农民较大影响，农民希望以枪会解脱自身痛苦；三是县北的枪会教师或会众南下“串学”，满足了枪会对师资的需要。

由于枪会会众都是佃农，学董大都是豪绅地主，所以县境内百分之九十以上枪会的领导权落在豪绅地主手里。当革命兴起时，封建宗法势力便操纵枪会大肆反扑。

二、豪绅地主利用枪会打击革命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县境的豪绅地主利用枪会镇压革命，时间之长久、规模之浩大、手段之残暴，在豫南是罕见的。

黄安、麻城和县境南乡爆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时，一些豪绅地主潜逃到革命发展比较薄弱的新集、代咀、浒湾、吴陈河、陈店等地，勾结当地封建势力，利用枪会频繁地向县南乡田铺、酒店、箭场河一带及黄、麻两县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进攻。一九二七年夏秋，在县南乡东起癞痢寨、西迄木城寨连绵百余里的高山上，枪会与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激战半年之久^①。每次参加战斗的枪会少则几百人，多则万余人^②。郑位三在回忆这件事时说：“这个战争规模浩大，没有时间地点，反动枪会说声进攻，便象洪水似的，洶洶过来。遇到强有力的抵抗，便迅速败退，若能得逞，即大肆烧杀。仅七（里）、柴（云）两区，就有几千家房屋被烧，几百条耕牛被抢走。在没有钢枪的地方，农民天天防敌，日日跑反，几万男女老少，时常靠山露宿，不敢回村。”

土地革命初期，在以柴山保为基础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逐步形成，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县境中、北部的枪会不断到红区袭扰。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二次：一九二九年六月间，土劣胡道纪、范成伯、成日辉、邱举贤煽动白沙关以北数十里区域的枪会到白沙关“堵口子”。三、四百名枪会会众驻守白沙关，并以白沙关为依托，时而到关北农家勒索，时而到关南红区烧杀抢掠（见附

件5)。白沙关是南北交通要道，枪会把守白沙关，使革命不能向北发展。一九三〇年夏，千斤一带驻守山寨的枪会和民团数千人，攻打夏青区苏维埃政府和赤卫军，激战于区苏维埃政府驻地晏家河（见附件6）。

新县县境被土豪劣绅利用的枪会，富于破坏性，曾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但枪会会众是在豪绅地主的欺骗宣传和迷信教条的蒙蔽及胁迫下“打党”（笔者注：进攻共产党、打击革命）的。教育会众，提高觉悟，把他们争取过来，使枪会不被土豪劣绅利用，甚至倒戈打击土豪劣绅，是可能的。土地革命初期，敌强我弱，革命处于低潮。为了发展革命力量，推动土地革命，党和红军把教育改造枪会的工作当作势在必行的革命任务。

三、党对枪会的教育和改造

工农革命军和“黄麻起义”领导人走上开辟柴山保、创建“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时，即感到枪会工作紧迫和重要。柴山保有二十多堂枪会，会众遍布村村湾湾，家家户户与枪会不无关系。党和军队要在柴山保站稳脚跟，发展革命，必须争取枪会会众转化到革命方面来。《鄂豫边区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群众运动决议案》深刻阐述了枪会工作的重要意义：“假使忽视了枪会运动或是策略的错误就可影响到全部工作，甚至可以影响到当地党的生命上，各级党部应特别注意。”在探索夺取革命胜利的斗争中，党和军队领导人对枪会工作的意义和指导思想越来越明确，从而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取得教育改造枪会的重大胜利。

1、弦南区枪会的转化和改编。

党和军队对学董和会众区别对待，采取不同的政策。

对学董开展统战工作。工农革命军领导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候、戴季英等利用人地两熟的条件，以各种职业为掩护，宣传革命主张，宣传共产党“有绅不劣、有土不豪者不杀”的政策，从而稳定了一批学董。一九二八年六月间，曹学楷委托崔世祥给柴山保的头面人物送去礼物和赴宴请贴。在宴席会上，曹学楷申明党的政策，晓以大义，争取朱香洲、程炳祝等一批中小地主和枪会保持中立。陈德祖红枪会曾到黄安县回龙寺冲击曹学楷主持的群众大会，多次进攻黄安和箭场河的农民协会。陈应恒是陈德祖红枪会的小队长，他参加宴会后，对学董做了许多工作，说通了陈寿堂、陈世林、陈应堂，这堂红枪会从此不与共产党对立。大地主吴文璐与陈姓大地主有矛盾，他表示愿与共产党合作，党就同他建立暂时的联盟，以便借助他的力量搞垮陈姓地主的枪会。后来，吴文璐与陡山河枪会头目胡道纪、范成伯、成日辉勾结，企图诱歼红三十一师。党发现吴文璐的阴谋后，立即处决了吴文璐，并收编了他的枪会。党利用大地主之间的矛盾，达到了各个击破的目的（见附件7）。

对会众采取教育转化、团结依靠的政策。会众都是穷苦农民，他们加入枪会，丝毫没有改变其政治、经济地位。为了启发会众觉悟，使他们转化到革命方面来，一方面，工农革命军书写了许多标语，还在路口、茶棚宣传革命道理，宣传工农革命军是穷人的军队。工农革命军执行严明的群众纪律，公买公卖，借物送还，损物赔偿，派饭给钱，拿了老乡的菜，把银元放在菜地里，给农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③。另一方面，党和军队一些同志通过串亲访故旧、谈心交朋友等

方式，结识会众，并发展他们入党，然后，把他们派入枪会做转化工作（见附件8）。对争取过来的枪会，依靠利用，委以重任。例如，郑位三、陈子洲将罗家冲黄枪会学董罗明高争取过来，纳入党内后，以罗家冲黄枪会作内应，配合红三十一师和弦南红学司令部所率近万名枪会会众和农民群众攻打反动枪会把守的白沙关，取得了白沙关万人暴动的胜利（见附件9）。经过半年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弦南区（含今新县陈店乡、郭家河乡）的枪会全部参加了革命。

对于经过改造已转化过来的枪会，党仍采用枪会的旧名称，于一九二九年三月成立了“弦南红学司令部”，江子英任司令，戴季伦任政委（见附件10）。弦南红学司令部发布《告红学学友书》说：“以保护弦南穷苦民众为职志，愿领导全体学友协同各界民众，与胡、范、成、寇拼个‘你死我活’。”弦南红学司令部作为弦南区枪会的最高领导机构，在鄂豫边土地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一九二九年七月一日，以弦南红学司令部所率枪会和农民群众为主力的白沙关暴动，拔掉了阻碍革命发展的障碍，红色区域向白沙关以北推进二十余里，红军扩大到七百余人；八月间，弦南区各级苏维埃政权和光山县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土地革命也蓬勃开展起来④。在国民党军队对鄂豫边的三次会剿中，弦南区枪会和农民群众“在特委领导组织下，男女老少，拿起扁担、矛子、大刀、土枪，四处击敌，弄得敌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防不胜防”⑤。白沙关万人暴动和三次反会剿的胜利，使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进入全盛时期。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要求，弦南区枪会纷纷改编为赤卫队（见附件11）。赤卫队的建制是，区设总队，乡设大队，

村设中队，湾（自然村）设分队。罗明高任弦南区赤卫队总队长，总队长以下各级干部大都是枪会骨干，如弦南区第四乡赤卫队大队长郭继达就是郭家河郭姓户族红枪会的会众。

2、枪会政策的完善和县境北部枪会工作的开展。

白沙关万人暴动胜利后，县境北部的豪绅地主纷纷强迫农民和枪会筑寨固守。面对枪会更加集中，学董对枪会的控制加紧的新情况，鄂豫边党组织加强了枪会工作的领导。一是派遣优秀共产党员打入山寨中的枪会内部，进行艰苦细致的教育和转化工作。例如，鲁家真、占以锦曾分别到鲁家尖山、花山寨鼓动会众倒戈（见附件12）。二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柴山保细吴家召开的鄂豫边区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制订的《群众运动决议案》，更加丰富和完善了枪会工作的政策和策略，推动了枪会工作（见附件13）。不久，共产党员林亮臣、余雷勤成功地策动了沙窝周围黄枪会转向革命。转化后的黄枪会给红军送情报，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扩大共产党游击队，为革命做出了有益贡献（见附件14）。一九三〇年春，红军横扫县境北部许多山寨。在战斗中，专打反动学董，战斗胜利后，保护会众及家属的生命和财产，只严厉惩办少数反动学董和豪绅地主；没收地主财产，给会众分粮分财。在党的枪会政策感召下，红军所到之处，枪会皆思想崩溃，组织解体（见附件15）。

在鄂豫皖苏区受到李立山左倾错误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危害时，新县县境的枪会工作尽管受到干扰，但由于广大军民坚持枪会工作的正确政策和策略，枪会工作仍然取得了优异成绩。一九三二年春，县境北部地区的枪会全部“散馆”。原枪会的会众，仅少数人参加了地主民团，大多数人

觉醒图新，参加了赤卫队、红军或苏维埃政府的工作。

执笔人：方继华

一九八五年元月

注 释：

①见吴先恩《难忘的岁月》（载《星火燎原》选编之一）和《大革命时期新县农民斗争》（载《丰碑》第二辑）。

②③④见王树声、陈再道、占才芳《从黄麻起义到鄂豫边割据》（载《星火燎原》选编之一）。

⑤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一九八四年七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附件（1）

黄锦思：《大破红枪会》摘抄

……当时（笔者注：指一九二七年），黄安、麻城地区的农民暴动，象春雷一样，震惊了新集一带的地主豪绅。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利益，抵抗革命的发展，都利用农民的落后迷信思想，以防匪保家为名，欺骗和强迫群众，纷纷地成立起红枪会、白枪会等帮会组织。

我们蜜蜂保的大土豪韩老七，就是白枪会的头子。他家的狗腿韩家登，在组织白枪会的时候，敲着响锣，到各村去张罗说：“为了防匪保家，家家都要参加韩七爷的白枪会。兄弟两的去一个，兄弟三的去两个！不愿去的，就别想再种韩七爷的田，住韩七爷的房子了！”

黄家湾、朱冲、韩老屋、鹤儿几个村子，就有四百多穷兄弟被迫参加了白枪会。我们家兄弟三个，爹只叫我一个先参加进去应付差事。

韩老七从光山县城请来一个姓邵的师傅，于是白枪会的香堂就摆起来了，韩老七是当然的会总。

程世齐、程世田、程应勋

谈柴山保（今陈店乡）枪会建立情况

民国十六年二月，程七湾的大地主程炳志办了一堂红学，请息县一个姓沈的教师爷和寇湾一个姓寇的人教了二、

三个月。当时，不少地主和有钱人为了保家保身，相继办起了红学，如杜湾、程七湾、王岗、代岗、细吴家、大朱家、晏庄、陈德祖、大吴家、芦家山、胡子石、王湾、三埝湾、崔店、西杨家等地都办起了红学。

民国十六年五月，南边（注：指黄安县七里、紫云两区）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队伍在麻城坳界岭上“亮队”（注：游行示威）。陈建堂、陈应度、陈应恒、陈应亮等几个红学头子，组织反动红学去湖北打共产党，对农民进行烧杀。

韩裕焱谈郭家河枪会

民国十六年春，七里坪办起了共产党，兴起了农民运动。我们这边的地主害怕共产党发展起来。为了阻止农民运动兴起，就兴办反动红学。一开始，郭家河办了三堂红学，郭继耀一堂，五砦青一堂，姓郭的祖上拿钱叫流氓无产者郭小五、郭世忠办了一堂。……郭家河办起红学不久，湾店姓袁的办了一堂红学，莲花堰有一堂学，叫扇子会。白沙关上面有一堂黄枪会。

附件（2）

胡世旺谈陡山河一带办枪会情况

南边（注：指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共产党发了，地主害怕，就办红学。地主把红枪发到各户，穷人不参加红枪会就不得了。当时陡山河一带的柳林河有馆红学，烂泥冲有馆黄学，胡全湾的胡道纪办了一馆红学，尚畈有馆红学，北布街

有馆红学。后来，胡道纪把胡全湾的红学移到陡山河北庙。各户族都办了学，没入学的少。

民国十八年五月初，胡道纪带着红学到白沙关去堵口子，我也去了。后方送粮去吃，也在关上派饭吃过。五月二十五日，共产党的人分三路包围白沙关，把关上的红枪会赶跑了，陡山河以南的地区暴动了。此后，陡山河以北的地区，老百姓白天种田做活，夜晚上龙盘寨。六月二十五日夜，共产党破了寨，老百姓各回各家。

廖家德回忆吴陈河一带枪会情况

十八年秋或十九年春，南边共产党起来了，声势很大。我们这里的地主绅士就办红、黄学，防共产党。红学、黄学湾湾都有，很普遍。民国十八年五月，我湾的黄学办起来了。打麦子时，我湾黄学的人光着上身，一跳一蹦的，自称菩萨护了身。八月，我湾黄学的老师晏先生在晏家河被杀，我湾的黄学就垮了。

附件（3）

王宗先回忆王岗红学

我们湾的红学是民国十七年二月才办的，是专门保家保身的组织。学员有十八人，请了光山一个姓张的教师爷，由本户族一户中农王宏勋主办。请教师、吃饭和烧香烧纸的花费由祖上一点公积支付。

李积元、梅乐善回忆陈家湾黄学

民国十七年秋，穷人汪泽熙在陈家湾办了一馆红学，是穷苦百姓的组织，有百多人。十八年，土匪李老么从湖北来到这里，汪泽熙拿着小黄旗指挥黄学打土匪，被土匪打死了。

附件（4）

郑位三：《河南新县烈士碑题词》

（摘抄）

一九二六年箭厂河的革命红枪会在当时曾建立了不少功绩，它是鄂豫皖老根据地最早的一支地方武装。

老红军戴得归回忆箭场河三堂红学

一九二七年正月，吴焕先在曹门建立了第一堂红学，让吴维儒当学董，学员大概有四十多人。在占家湾建立了第二堂红学，负责人是占以贤。与此同时，我们还对郑家边的地主为护家而立的一堂红学进行了改造，派吴先筹、吴先绪去做改造工作……。三堂革命红学共一百五十多人。

张宗悦、叶道英谈胡河红学

我们这里（注：指卡房地区）数胡河革命武装建立早些，就是办革命红学，领导人叫胡应堂、胡柱先。民国十八年

六月十三日，卡房农民在红三十一师和弦南区赤卫队配合下举行暴动，打死了卡房一带的两大霸——黄吉安和林用之。打黄吉安是叶绪康、叶绪广、叶绪引、叶绪庆、叶志辉、叶道英带路，打林用之是胡柱先、胡应堂、林正绪、胡向如带路。暴动后，组织起农民协会，第二年就建立了苏维埃，分田地搞得热火朝天。

附件（5）

熊启松、罗明勤、杨化勤、熊明志

谈胡、范、成、邱带枪会驻守白沙关简况

胡道纪、成日辉、范成伯、邱举贤是沙城里的大土豪劣绅。他们给光山县政府打报告，要求把反动枪会联合起来，据守白沙关、进攻柴山保。光山县政府马上给他们批了“公事”。十八年五月初，他们带反动枪会三、四百人，在白沙关上修城筑寨，驻扎在山上。有一天，他们到柴山保的云山去抢老百姓的牛、羊、猪、鸡，人如果没跑，就把人打死。还有一次，他们到李家河去抢东西，被廖荣坤带的红军一个排打垮。一天，胡道纪听说姓罗的有人在革命队伍里当大队长，马上找姓罗的麻烦。他们打听到那个罗大队长叫罗四架子，是罗冲油榨人，即刻把油榨烧了。胡道纪把他的反动枪会几百人带去，要姓罗的派饭吃，要姓罗的青壮年全部上白沙关站岗。这天午饭没有猪肉，胡道纪不愿意，他的老二胡道善背着快枪，到罗家冲门口吆喝：“姓罗的都听着，晚上管饭要杀猪，弟兄们吃了要去白沙关站岗。谁家的饭菜不

好，以破坏防共论处！”

附件（6）

老红军龚成松的回忆

民国十九年五月初四，我们（夏青区赤卫军）出发，到光山县文珠去。代安伯民团和枪会打我们。红学、黄学、扇子会、大刀会、剪子会等枪会在前面打头阵，凶得很。我们退到晏家河。夏青区苏维埃开始驻在张堆彭合千（大地主）家里，后来迁到晏家河。区苏主席说：“你们还不抵着，我们撤都来不及了。赤卫军就在河边上顶着，后发动进攻，把枪会打败了。接着，我们建立杨帆区、文珠区、河区。”

附件（7）

陈绪明的回忆

十七年五月，曹学楷等十八人从湖北过来，住水口寺一带。崔湾有崔世祥，被曹学楷邀去进行革命教育，引导他参加革命。他能说会道，人称“万事通”。曹托他带上许多礼物，如美伞牌香烟、牛奶、烟土等送给各户族长和地方上有面的人。同时，送了请贴，贴上写了一些劝他们不要与革命为敌，亲戚要往来等话，并请他们到高志宏（共产党员，住高湾对面湾里）家参加宴席。他们收了礼物，看了请贴，大部分人去了。参加的有陈应恒、吴文璐、王成君的老二，朱香洲的儿、杜××（杜湾人）、杨万江、胡成元、朱学旺、

崔玉善等。酒席一共四桌，我们这边参加的有曹学楷、陈文候、陈定候、戴季英、来合云、江子英等。曹学楷在席上宣传革命，重申党的政策，劝他们回去带上自己的红学参加革命。这些人，后来有的革命，如崔玉善、胡成元，有的怀疑试探，如吴文璐。我湾陈应恒回后，为了感谢共产党，就和陈世林、陈寿堂商量，再不和湖北农协打了。陈德祖的红学慢慢散了馆，只剩下几十个背钢枪的顽固派了，但他们也不敢阻碍革命。

熊启松的回忆

一九二八年我们争取了吴文璐。对吴文璐加入革命阵营我党有警惕，派崔玉善（吴的外甥）到吴部，当了吴的随身警卫。当时吴的警卫有两人——崔玉善和朱可旺（朱是吴的心腹）。一九二九年春季的某天，吴对崔说：“外甥，我到共产党阵营是为了把共产党一网打尽！”崔听后，当场表示赞成，接着问：“怎么打呢？”吴说：“等以后国军来后，我就叫共产党把部队拉到莲塘，再通知胡（道纪）、范（成伯）、成（日辉）里应外合歼灭之。”崔玉善听后，就派人报告红军。红军得报后，通知吴文璐到红军司令部开会。吴到后，立即把吴、朱两人捉住，当即枪毙。

吴死后，红军收缴了吴的几条枪，群众的革命情绪高涨起来。我党趁机把原已散了的红枪会组织起来，仍叫红枪会，吴华高任大队长。后来参加了白沙关万人暴动。

附件（8）

王宗先的回忆

民国十七年八月，我放湖鸭住在河南湾的油榨房里。一天夜里，杨万家和曹学楷来找我闲谈。十来天以后，杨万家又来找我，叫我把湖鸭卖了，回王岗去，到红学里串连革命，发展党员。接着，我把湖鸭全卖了，准备回去做工作。杨万家看我决心很大，没隔几天，他就在土雷寨接收我和王宗应加入共产党。后来，我和宗应到红学里串连，最先找的是我的叔伯兄弟王宗全、王宗运、王宗君和王再天四人。

腊月的一天夜里，我和王宗应、程炳洲、程炳如、王宗全、王宗运六人，在观音堂开第一次党小组会。会由杨万家主持，布置了任务，叫我们去串连人参加革命。一天夜里，我去程七湾地主程炳志屋后的阳沟里探听，了解到程炳志的罪恶，经开会研究后，趁一天夜里红学站岗的机会，把程炳志拉到东门岗打死了。

程世齐、程世田、程应勋谈

程七湾红学活动情况

十六年冬至十七年春，曹学楷、陈定候、陈文候、蔡积先等人通过走亲串友，发展程炳如、程炳朋、程炳煌、程炳洲、程炳春等人入党。程炳煌、程炳洲、程炳春等人逐步将程七湾红学转变为革命组织。后来程七湾赤卫队就是由红学

改编成的。

陈锡明谈陈德祖红学的转变

十七年，崔世祥和王家湾一个姓王的党员到我湾红学里串连，陈锡福、陈锡耀、陈世珠加入了共产党。十七年秋下，陈寿堂这些大头头跑了，就由陈锡福等三人领导红学。我湾的红学在十七年秋就转向革命了。

附件（9）

程方启谈白沙关暴动

五二年我到北京，位老（郑位三）对我说，从木兰山回来后，在河南有亲戚的党员就“串党”来了，曹学楷利用宗族关系插进曹家湾，陈文候插进程家湾。位老先住在沙石坡陈元堂家，陈元堂是保董。位老觉着他不容易争取过来，就搬到陈家湾陈子洲家里，开个药店，还用“阴阳先”的身份打掩护。位老在陈家湾最先发展陈子洲入党。陈子洲入党后，又去做罗明高的工作，发展他入了党。罗明高当时是罗冲红学的学董。位老也去做了几次工作。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柴山保和关南的群众、红军攻打白沙关。白沙关内，罗明高等共产党员掌握的经枪会就起手了，调转了枪头。

韩裕焱谈白沙关暴动

十八年五月间，红军三个大队配合郭家河、柴山保的红学和农民群众攻打白沙关。白沙关上有胡、范、成的团练和

红学把守，约有四百多人。他们经常下来骚扰我们，抢东西、杀人。打白沙关的红军和农民有几千人，分三路进攻。红军有枪，红学和农民没有枪，但很勇敢，一冲就上去了。当时关上有罗明高、黄沙生带的红学当内应，他俩是地下共产党员。里外一打，敌人就弃关逃跑。我们一直追杀到陡山河，把敌人打死一百多。胡道纪跑不及，跳到潭里淹死了。其余的地主都跑到北边的山寨上去了。

暴动胜利后，在关上开了一个大会，宣布红学改编为赤卫队。南区是一个纵队，队长罗明高。郭家河属弦南区第四乡，第四乡是一个大队，下面有几个中队。郭家河的大队长、中队长都是郭继达。

附件（10）

陈锡明谈弦南红学司令部

十八年二月，成立了弦南红学司令部，先后驻扎在摩云山、莲花庵、冯塆附近的仰天窝，管辖弦南区的革命枪会。红学司令部的司令是江子英，代季伦是政委或副司令。成立县苏、乡苏以后，江子英参加了红军，郭步仪接任司令。我到红学司令部去卖过油果子。

郑位三的回忆

一九二九年底（笔者注：时间记忆有误）成立红学司令部，以贫农、中农为主力，也吸收一些流氓参加，并让他当个名义干部。这些人好面子，讲荣誉，怕苦怕死不干事，实

权由我们掌握。这时，红学司令部是郭五爷（流氓无产者郭步仪，郭家河人）当司令，副司令是个农民，也姓郭……我们的公开工作，都由红学司令部出头去干。

附件（11）

曹华荣的回忆

当地的红枪会、黄枪会、孝子会、大刀会之类的组织，在白沙关暴动胜利后改为赤卫队，同年八月间改为赤卫军。

李念南、李发普、李仕府的回忆

我们这里（注：柴山保）的红枪会在白沙关暴动后，改为赤卫队，不到半年时间又改为赤卫军。

附件（12）

程方启谈共产党员做白区枪会的

工作情况

白沙关暴动后，白沙关以北、陡山河以南的区域成了红区。陡山河以北的枪会上了寨。我们党派人到寨子里做红学的工作，都没有成功，去做工作的人不是跑回来了，就是被杀了。我们团支部派鲁家真到鲁家尖山做红学的工作，他是卖柴的身份混进去的，做了一个把月工作，没有成绩，就

回来了。占以锦在花山寨做工作，被枪会头目捉住了。

附件（13）

鄂豫边区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

群众运动决议案（节录）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

（12）枪会运动之具体方法：

（一）利用各种关系打入其组织夺取其群众。

（二）扩大政治影响到枪会中去。

（三）利用受我们影响的枪会打入其他组织。

（四）作战时捉大批枪会群众加以宣传放一部分，留一部分加以长期宣传并采取“取保”的方式。

（五）勾结其领袖以分化其群众。

（六）有时拘留其领袖于必要时得杀戮之。

（七）拘留其家属放本人回去做破坏工作。

（八）挑拨其群众与领袖斗争，领袖与领袖冲突，绝对禁止群众与群众冲突。

（九）用小恩小惠联络其感情夺取其群众。

（十）利用在反动区域出来的群众做宣传工作，不可杀戮。

（十一）收买他处红学领袖到反动区域做宣传工作。

（十二）勾结红学群众到赤色区域来受政治影响。

（十三）打开红学乡村须用抚慰队抚慰红学的家属，绝对禁止烧杀并注意其组织。

(十四) 对于群众的反动领袖不能即时杀戮，但终久必须杀戮，杀戮之前必须向群众宣布其罪状。

(十五) 对枪会宣传只能反对其领袖不能反对其组织。

(十六) 赤白对立的地方枪会只能用武装镇压和宣传，以不用武装解决为原则。

附件 (14)

李积元回忆陈家湾黄学转变后的情况

汪泽熙那馆黄学是一九三〇年二月份跟共产党联系上的。当时商城县钟铺民团逮捕了七、八个共产党员，住在沙窝街上。汪泽熙派人给住在毛铺的红军送了信，红军把被捕的共产党员全部救了出来。

沙窝的共产党员是林亮臣发展起来的，组织了一支游击队，有百十人枪。黄学学友大部分参加了游击队。不少红学学友也参加了。一九三一年七、八月份打大山寨，我们这支游击队参加了战斗。红军整编时，这支游击队除了我和其他两个人，都参加了主力红军。

附件 (15)

龚成松、岑先启的回忆

十九年春上，红军在县境北部地区攻打山寨，破了好多寨。红学头子见势不好，跑了一些。红军杀了一些红学的反动头头，但不找一般会众的事。红军打开山寨后，叫会众各

回自家。

汪忠全、胡荣永的回忆

共产党来到沙窝后，把地主的粮仓打开，不少红学会众分了粮。地主回来后，说红学通共产党，在罗汉山黑龙潭杀了十七、八个红学的人

红二十五军从花山寨会议到何家冲 集结出发长征

中共罗山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

红四方面军主力一九三二年十月从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后，为了坚持斗争，鄂豫皖省委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重建了红二十五军。蒋介石为了摧毁我根据地，消灭红军，调集了十五个师约八十个团的兵力，从十二月开始对鄂豫皖苏区实行大规模的“清剿”，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置红二十五军于死地。

在敌数十倍于我，形势极其险恶的情况下，党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和苏区群众，对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加上王明推行了冒险主义军事路线，根据地和红二十五军受到极大的摧残。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由七千人减少到二千九百余人。在这种情况下，鄂豫皖省委派成仿吾同志到中央汇报工作，要求派军事干部加强红二十五军的领导。

中央为正确指导红二十五军的战略方针，根据鄂豫皖省委的请求，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亲派斗争经验丰富的程子华同志来鄂豫皖，充实红二十五军的领导工作。

九月间，程子华同志来鄂东北道委驻地光山南部地区，道委一方面致信红二十五军由皖西赶回鄂东北，一方面由鄂

豫皖省委郑位三、戴继英陪程子华同志前往光山白雀园一带找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五军在光山斛山寨大捷后，在省委的率领下西行鄂东北途中，收到党中央七月二十六日《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七月二十九日《致鄂豫皖省委训令》等文件，行至花山寨与程子华同志相遇。红二十五军三千将士当即住花山寨一带，并于花山寨一带加强设防，加强各部队的通信联络。程子华同志向省委转交了中央文件，传达了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

十一月十一日，中央鄂豫皖省委在花山寨举行了第十四次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了程子华同志带来的中共中央文件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一致同意党中央和周副主席作出的关于红二十五军战略方针，并决定了几个问题：

①省委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造根据地而斗争；②以平汉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③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我党我军政治影响，行动中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④省委任命程子华为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为政治委员，徐海东为副军长。

花山寨会议还决定：留一部分武装组建红二十八军，由高敬亭同志领导，继续坚持鄂豫边区的斗争。

十一月十二日，红二十五军即由光山向罗山一带转移，十三日在罗山县殷家湾、何家冲一带进行整编补充，军直辖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全军共二千九百八十余人。

十四日，红二十五军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十五日，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在何家冲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鄂豫皖省委军委书记兼鄂豫皖游击司令戴季英、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鄂豫皖省委秘书长郑位三。

会上，根据花山寨会议精神，确定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领导人问题。程子华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吴焕先为政委，徐海东为副司令，戴季英为政治部主任。

会上还决定鄂豫皖省委也同第二先遣队一块离开鄂豫皖，并决定罗山独立团随二十五军军部一块行动。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在鄂豫皖省委的率领下，红二十五军由罗山县铁铺、何家冲出发向西挺进，开始长征。出发时，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

十一月十七日，行军到罗山朱堂店。国民党“鄂豫皖三省追剿队”第五支队闻讯追击，红二十五军指战员同仇敌忾，一鼓作气将敌全部击退。考虑到长途行军不便，和罗山地下党组织联系后，留下一部分病号和笨重东西在朱堂店。十七日晚，在信阳以南东双河和柳林之间过京汉铁路西进，从湖北枣阳翻桐柏山到方城，经叶县到鲁山，由于黄河过不去，就由鲁山到陕南了。

红二十五军从花山寨会议到何家冲出发长征，这一战略决策是非常正确的。在当时严酷的形势下，红二十五军实行

战略转移，在陕南创造新的根据地，对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壮大，对创建鄂豫陕根据地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整理此文主要依据以下资料：

1、程子华向美国《纽约时报》前总编辑索尔菲伯里夫妇介绍红二十五军长征情况。

2、《花山寨会议》，见《光山党史资料》1985年第一期。

3、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大事记，见《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史资料选编》第123页。

4、调访戴季英谈话记录，1985年5月24日。

整理人：罗荣家

回师潢光 连克蹶敌

——潢光战役简介

中共潢川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

杜甫店战役的硝烟未尽，红七十三师返回皖西。红四方面军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东进固始县城，沉重打击了驻固始境内的敌四十五师。一九三二年三月中旬，方面军总部率红十、十一两个师陆续出发，辗转到皖西作战。

望着滚滚远去的铁流，留守商潢地区牵制敌人的红十二师的同志，羡慕不已，议论纷纷：“为什么把我们留下来？”“我们留下来干什么？”陈庚师长揣透了战士的心思，把许世友、高绍先、徐海东三个团的领导同志叫到师部，传达总部交给的任务，让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

许世友奉命率三十四团在潢川东南一带活动。部队以连为单位，积极开展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每连都成立了一个宣传队，负责包干一个区或一个乡，三四人作为一个小队，天天打着红旗到各村去宣传，协助地方上建党建政，扩大红军。

正当留守红军开辟新区工作时间，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命张钫的二十路军全部调集潢川，企图乘我军主力在苏家埠作战之际，与我争夺商潢地区。二十路军有七十五、七十六两个师约十五个团。红十二师只有三个团。在此情况下，我红军采取的基本策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

三十四团部队先后在双柳树、晏岗集、曹围等地阻击和袭击敌军，歼敌两个营和一个骑兵连，缴枪五百余支，战马一百余匹。与此同时，彭店、艾庙、何集等地的赤卫队经常协同红军作战，使敌时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惶惶不可终日，在红军和我地方游击武装的不断打击下，张钫费力耗时，只占了公路沿线的仁和集、双柳树和江集等集镇。

五月八日，苏家埠战役胜利结束。为了收复被敌侵占的苏区，方面军总部率主力于六月初回师豫南，在商城西北、潢川以南地区与红十二师会合，决定立即发起潢光战役，消灭潢川、光山地区的敌人，向西扩大根据地，与湘鄂西的红军相呼应。

张钫闻讯惊慌失措，匆忙召集团以上的军官会议，与会者多主张撤出江集、双柳树和仁和集，改在十里头占领阵地以便缩短防线，集中兵力抵抗红军。张钫受地主豪绅的包围，认为麦收在望，如部队撤退，当地地主们便不好收租，因此犹豫不决。就在此时，方面军总部根据敌人“巩固潢川，四处分兵，广占地盘”的特点，决定先将敌分割包围，尔后予以各个歼灭。红十师由商城直出光山以南，钳制敌部子举新编二十师，红十二师、七十三师和少共国际团分别围歼双柳树与仁和集之敌；红十一师秘密插到潢川以南的卜塔集、彭店地区，切断潢川之敌与仁和之间的联系，并打击和歼灭由潢川出援之敌。

六月十二日潢光战役拉开战幕，红十师奔袭光山的椿树店、槐树店，将敌新编二十师一个团大部歼灭后，乘胜进逼光山县城。与此同时，红军十二师和七十三师分别包围了双柳树、仁和集。红十一师则隐蔽于潢川南杨集，窥视卜塔集

方面，待机而动。红十二师采取“三面包围，网开一面”的战法，于十三日拂晓，从东南西三面同时向据守双柳树之敌范龙章二二八旅发起进攻；另以一个多团的兵力配置于双柳树东门外的环山东东北地区，准备截击向北突围之敌。在红十二师三面强大的攻势下，守敌果然向北突围。许世友指挥三十四团率先冲入寨内，将来不及逃跑的两个多营敌人全部歼灭，尔后向北猛追。我预伏在双柳树环山东东北地区的部队，此时已快速运动到姚楼，在蚂蚁潭一带，给敌当头一棒，敌不敢再前进，掉头向西北逃窜。我军穷追猛打，至传流店以南，全歼溃逃之敌。敌旅长范龙章于十二日下午先突围，十三日凌晨在杜甫店与我军遭遇。战约二小时，敌四五六团团团长王烈臣被俘，四五六团一个营被歼灭，范本人受伤，至夜晚，范率残部逃回潢川。

双柳树之敌被歼，仁和之敌被围，光山之敌迭电告急，张钫慌了手脚，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令桃林铺驻敌回守潢川，急将七十五师由江家集急调七里头至卜集一线，由师参谋长李亚光统领占据卜塔集，企图屏障潢川，伺机南援。

六月十三日晨，红十一师由南杨集北上，隐蔽在卜塔集东南之丘陵地区，分三路逼近卜塔集。三十一团和三十三团从东、南两方发起攻击，三十二团在卜塔集北面张网以待，准备截击突围之敌和潢川援敌，在攻打卜塔集的战斗中，由于敌人利用寨墙顽抗，红军猛攻多次，未能攻克，争夺十分激烈。师特务营匍匐前进，通过麦田绕过集西北，沿一干河沟接近了寨墙。下午六时，红军攻克卜塔集，歼灭了大批敌人，敌七十五师参谋长李亚光被生俘，七十五师副师长兼二二三旅长韩文英、独立团团团长李学正皆负重伤，二二四旅团

长尹令胜被击毙。少数突围的敌人，也被我三十二团击溃。

二十路军七十六师二二七旅，被我红七十三师和少共国际团围困于仁和集后，欲凭借坚固工事固守。我军有意钓潢川之敌出援，只是围而不攻，抓紧时机构筑工事，并对敌进行袭扰。双柳树、卜塔集之敌溃败后，仁和集的李万林部预感身在危卵之中，遂于十四、十五日多次突围，均未得逞。六月十六日黎明，防守寨西的一个多团抢先向西突围逃跑，其余敌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我红二一七团乘势发起猛烈进攻，正当该股敌兵溃逃时，又被我少共国际团严密封堵，溃散之敌全被聚歼。接着红二一八团、二一九团乘胜向西追歼，将两个团的敌人歼灭在仁和集西南三华里的谈楼一带。旅长李万林慌乱中抓住当地群众胡瑞甫带路，逃至朱皮店，被红军生擒。

潢光战役，时间短，战果大，前后仅五天时间，战役即胜利结束。总计歼灭敌正规部队八个团和反动民团一部，毙、伤、俘敌万名，缴枪七千余支，收复并扩大了潢光南部根据地。此次战役中，潢川人民配合红军作战，抢运物资，送茶、送饭，护理伤员，为革命再立了新功。

本文参考资料：

- 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 2、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
- 3、《红四方面军战史简编》
- 4、范龙章等《张钫与二十路军》
- 5、《豫南特区剿赤进行情形》
- 6、本办调访口碑材料

王新中 整理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四日

商城“四·八”学潮始末

中共商城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商城县立初级中学爆发了驱逐反动校长、要求学生自治的学生运动。这次学潮，在中共商城特别支部的直接领导下，发动全校师生，赢得全县各界进步人士的支持，取得了彻底胜利，在商城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学潮爆发的原因

商城县立初级中学（以下简称县中）始建于一九一一年。一九一三年冬白朗陷城后，此校停办，至一九二三年恢复。学制三年，年招两班，常年有师生三百余人①。

“四·八”学潮的爆发不是偶然的，有着它的政治根源和历史背景。

县中，是商城县一所有名的县立中学。自一九二三年恢复起，就被反动势力所统治。不过，五四运动后，我县一些在外地上学的进步知识分子，如袁汉民、吴靖宇、雷跻唐、武朗山、胡攻非等先后回到商城，有的被聘县中任教，特别是一九二五年夏商城党组织创办“商城书社”后，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刊物在学生和青年中广泛流传。“商城书社”发起人之一黄秉耀，一九二五年秋又担任了县中校长，使马克思主义在商城县中得以深入地传播。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进步势力的增长，开始使这所被反动势力严密控制的死气沉

沉的学校，出现了新的生机。“学生读书会”在各班也相继成立。并成立了学生们自己的组织——学生自治会，参加管理学校。中共商城特别支部根据党的“四大”关于《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精神，非常重视学生们的思想进步。在学生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进步思想，发展党团员。一九二六年春，发展县中二年级学生钟启泰，师范班学生毛蔚秋等人入党，发展丁树勋、钟保泰、吴春宇、陈世鸿、张泽昌等进步学生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②。

县中的政治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设在潢川的“豫南清乡司令部”，知道校长黄秉耀思想激进，说黄在县中搞“赤化”，扬言要逮捕黄。由此，也引起了城内劣绅的起哄。经常有人向校园内掷砖头、瓦片，进行恐吓。一九二六年夏，迫使校长黄秉耀离商去汉。但校长一职由于由国民党省党部监察委员李静庵（共产党员）接任，学生各种进步活动继续得以领导（见附件1）。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攻下武汉后，农民运动蓬勃兴起，促进了我县学生运动的开展。为了宣传大好形势，迎接北伐军入豫，学生自治会组织成立了“新剧团”，排演新话剧。学生革命活动的不断高涨，更加引起了反动分子的恐惧和仇恨。教务主任周念石，起初就极力反对成立学生读书会，禁止学生看进步书籍，阻止学生排演新话剧。说这是“不务正业”，有伤“风化”。后来看阻止不了，就到县政府告状。校长李静庵被撤职，委任宦绅子弟周心如任校长。

周心如一上台，就伙同周念石对学校大加“整顿”。一是将认为有进步色彩和“不听话”的教员统统辞退，同时把一些思想反动、封建意识浓厚、同周关系密切的人拉进学校

充任教员。二是收回学生自治会的办公房子，不准学生自治会派代表参加校务会议。三是压制学生们的进步活动。学生们自编自演的话剧《群鬼》，是暴露旧社会政界和教育界丑态的。学校非但不准演出，并向饰演该剧角色的学生家长发出恐吓信，要家长禁止学生参加演出，还派出心腹学生监视进步学生的行动。使一度生气勃勃的县中又溺于封建势力统治之中。

县政府和学校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进步学生的无比义愤。特别是受学生爱戴的校长和教师的陆续解聘，哄动了整个学校。突出的表现在学生们对新聘教员思想上的腐朽、学识上的浅陋十分厌恶，课间，学生常向这些教员头上掷石子、抛纸团，蕴藏着极大的反抗情绪（见附见2—4）。

学潮的准备及其爆发

对于县中的政治斗争、敌我力量的变化、学生们的思想情绪，商城党组织都负以极大的关注。为了击退封建势力的进攻，取得县中的领导权，中共商城特别支部，审时度势，对县中政治力量进行了剖析，认为必须动员全校学生起来，爆发一次学潮，彻底推翻封建势力在县中的垄断和霸权，以期顺利开展学生运动。

为了领导好这次学潮斗争，特支书记胡攻非亲自抓这项工作。并指定城关团支部书记毛蔚秋、县中二年级学生钟启泰负责搜集县中情况和与学生自治会的联系，特支委员马石生（邮工）负责搜集社会上的反应。他们常于夜晚在一小胡攻非住室碰头开会，互通情况，研究工作。同时，向进步学生介绍进步书刊，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使他们逐步

认清了学校当局的反动和腐败，增强了与反动势力作斗争的勇气。

在思想发动的基础上，培养骨干力量。特支将全校学生进行了排队，确定培养高年级学生丁树勋、余新甫（话剧团演员）、杨军心、蒋××、谭子惠、吕学正、施家瑞、张肇华、陈醒华等为学运中的骨干。通过学生自治会串连各年级的进步学生，形成一个骨干群。从而，很快使全校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学生团结在学生自治会的周围。为学潮的爆发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四月初，学生自治会开始向学校当局要求将第一排教室东首的两间小房子还给 学生自治会办公 。学校当局玩弄花招，起初用拖的手段对付；学生自治会再三提出要求，要学校给予答复，否则就举行罢课。学校最后的态度竟是坚决不给。此时，学生们实在忍无可忍，学潮终于爆发了。

四月八日这天，学生们首先将挂的教员住室牌子摘掉，换上了“学生自治会”的牌子；接着提出：“我们不仅要这两间房子，我们要整个学校。不能把学校变成‘周氏宗祠’”的口号。这个口号一提出，斗争的目标鲜明了。“打倒封建势力在学校的统治”，“校长周心如滚出学校去”，“赶走赌棍谭××”，“解聘一切不称职的教师”，“要回我们自己的学校”，“请受我们爱戴的老师回校”等标语贴满了校园。全校罢课了。反动的校长、教务主任及跟随者被这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吓懵了，昔日的威风扫地殆尽，躲在家中不敢露面了（见附件 2—4）。

学潮斗争的深入

学潮爆发后，为了引导学生取得斗争的彻底胜利，中共

商城特别支部紧紧把握斗争的方向，采取了一系列有计划有步骤的策略和措施。

一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尽量缩小打击面。学潮一开始，特支就向学生自治会及骨干分子强调，要团结学生和教师的大多数。对于中间学生，不能要求过高，只要他们跟着我们就可以了；对于极少数思想落后和反动的学生，只要他们不故意挑起事端，我们也不去理睬他们，让学生自治会指派专人注意就是了；对于教员，更不多涉及。例如教员毛谷澄，平日是老好好先生，而且在教学上受学生的欢迎，也为社会上所赞许，除了在学潮爆发时摘掉他住室的牌子外，对他再没有过火的行动，并且事后即派毛蔚秋去向他解释，说明摘掉他住室的牌子作学生自治会办公用房，不是对他而是对校长来的。这样既解除了毛谷澄等教员的疑虑，又将矛头指向校长一人，自然而然的减少了对运动的阻力。

二是呼吁请愿，争取各界的支持。罢课以后，学生自治会组织全校学生上街游行，发表演说，并派学生代表到县政府、党部和教育局请愿，详述学校当局的种种罪行，要求撤换校长，解聘不称职的教员，允许学生自治。否则，决不复课。另一方面，发表《宣言》，组织骨干力量到各学校和教育界人士家中请求支持。马石生同志利用工作机会，奔走于社会各界，陈述县中当局的腐败，赞颂学生们的正义斗争。商城县第一小学立刻发出支援县中学生正义行动的《宣言》，文中小学的师生和教育等各界进步人士也纷纷起来，支持学生的罢课斗争。因为县党部、教育局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自然支持学生们的行动。县政府在这种形势下，怕把事情闹大，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压制学生行动。便

将县中问题交由教育局解决（见附件 2、3）。

学潮的胜利及其影响

在学潮运动中，因教育局长张心赤（共产党员）支持学生们的斗争，所以县政府将解决县中问题推之于教育局。

中共商城特别支部为了便于张心赤的今后工作和进一步秘密开展党的活动，不主张由教育局撤掉周心如的校长职务，而是派在社会上有影响有名望的县党部监察委员雷跻唐（共产党员）去劝周自动辞职。此时，处于众矢之的的周心如自知民心丧失殆尽，不得不提出辞职了。

周心如一倒，其他如教务主任及所聘的不称职的教员都跟着倒台了。校长一职，经教育局提议，由县政府委任省党部派回巡视南五县党部的汪昆源（共产党员）接任。一批党员和进步教师胡攻非，雷跻唐、毛蔚秋、阮渭渔、刘经阁等派进县中任教。县中又完全为我党所掌握，历时两周的学潮斗争，终于取得了全面胜利（见附件 2—4）。

“四·八”学潮，是党领导商城学生反对封建势力的一次成功的斗争，也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商城开展青年运动的结晶。

斗争取得胜利后，中共商城特别支部立即组织师生作复课的一切准备，马上将教学纳入正常，秩序井然。学潮前后的变化，使学生感到一所学校，两种面貌。学生尊敬师长，老师亲护学生，课堂秩序很好。学生们高兴地说：“若不是把周家一伙赶走了，我们怎能学习得这么好，生活得这样愉快！”钟启泰、丁树勋经常用这次学潮斗争胜利教育鼓舞学生：“这是革命嘛！我们要想学习好，生活愉快，就得革命；

要想胜利，就得大家团结起来，有组织的行动”。通过斗争的实践，大家提高了觉悟，加深了对革命的认识，积极要求进步。后来县中不少学生加入了团组织，为革命输送了大批新鲜血液。学生自治会负责人丁树勋后来加入了党组织，担任商城县委委员，并为革命英勇献身（见附件2）。

学潮斗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在商城的统治基础，有力地配合了全县农民运动的开展，揭开了商城革命斗争的序幕。

注 释：

①商城县志。

②《信阳党史通讯》1984年第三期14页。

执笔人：李宏茂

附件（1）

黄秉耀同志的回忆

（节录）

一九八二年九月

一九二五年八月至一九二六年七月，我在商城县中任校长，并兼该校师范班语文教员（教教学法）。

当时，中学的学生董维荣，我很喜欢他，那怕夜间开会、讨论他都去，和丁树勋是同班，还有钟启泰、钟保泰、张泽昌、万庆福、祝学治等。师范班有毛蔚秋、杨鹤生、余银甫、吴丹明、余迪安等。县中出过校刊，我是编辑之一。

一九二六年我去武汉的原因：二六年军阀在潢川设“豫南清乡司令部”，袁俊白当司令，秘书是周雨苍（商城人），他知道我，很注意我，在司令部提出我“赤化”。因此，地方劣绅哄动这事，经常有人掷砖瓦到校园。李静庵并对我说，要逮捕我。我蹲不住了，那里去呢？便和雷跻唐、胡攻非、吴靖宇商议，决定去武汉。走前（八、九月间）头天夜里，雷跻唐、胡攻非、吴靖宇等人，在吴靖宇家弄几个菜，给我送行，并开一个书单子给我，叫弄书来。我到武汉以后，校长是李静庵。

陈庆喜整理

附件（2）

“四·八”学潮的回忆

毛蔚秋

一九二七年“四·八”学潮是大革命时期，党在商城领导的一次声势浩大并取得胜利的青年运动。

（一）“四·八”学潮的起因

商城在过去封建势力极其厉害，政治、经济、文化都被当时的所谓“周、熊、杨、黄”四大家族所把持，其中特别是“周”家最厉害。但当时的进步力量也在逐步增强，在新旧势力斗争中，“四·八”学潮就爆发了。这个学潮的起因，具体说来有以下三点：

（1）商城的官僚地主豪绅和教务主任周念石勾结一气，压制进步师生。商城县立中学的教员，多有豪绅当后台，反动的为豪绅们重视；进步的极少，都是被学校所冷淡的。而学生的态度则和豪绅相反，是反对反动的，欢迎进步的，例如英文教员易可庄，当时是拥护吴佩孚的，曾经写过“一局残棋谁收拾，且看蓬莱一秀才”的诗句。学校说他有才学，写的好，将这首诗登在校刊上。另一位国文教员黄秉耀思想进步，为学生所爱戴，但学校对之却极冷淡，而且不久被解聘。对于进步学生，学校也多方压制。学生演比较进步的戏剧，也被禁止。记得我还在该校师范部上学时，我和同学们排演话剧“群鬼”——这个剧是暴露旧社会政治界和教育界的丑态的。我们排演了好久，并且已经化装预演了，

但教务主任周念石不准正式演出，而且周念石的哥哥周伯猷（老豪绅）也向饰演该剧角色的学生家中发出警告，要家长禁止学生演这个剧。这种对进步师生进行压制的行为，学生当然对之痛恨，都想和旧势力作斗争，这是学潮的历史上的原因。

（2）校长教员思想腐朽反动，学识浅陋，学生对他们不满意。商城县立中学第二任校长李静庵辞职了，换了官僚地主的儿子周心如当校长。新聘的数学、国文、生物教员都是姓周的，还有一个国文教员谭贞午是个赌棍。因为姓周的很多，所以学生称学校为“周氏宗祠”。而且这些家伙们都是既反动而且业务水平也低，学生们对他们极不满意。他们虽因为初到学校还未公开地压制进步学生，却也派有他们的心腹学生当密探，注意进步学生的行动。这就更引起学生的愤怒，当然想毁掉这反动的腐朽的“周氏宗祠”，这是“四·八”学潮的近因。

（3）房子问题。学生自治会向学校要求将第一排教室东边的两间小房子（当时是数学教员毛谷澄等人的住室）拨给学生自治会办公。学校开始用拖的手段对付，学生自治会再三要求，学校最后的态度是坚决不肯，双方相持了约有一周的时间，学潮就爆发了。实际上这能算是学潮的导火线。

（二）“四·八”学潮的领导者——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当时党在商城城区进行的工作，据我所知道的是：①宣传马克思主义；②文化战线上的斗争；③青年运动。一伙反动家伙盘踞在商城县立中学，作毒害青年的勾当，是党所不允许的。党的机关在商城南关扒字街商城书社。县立中学生经常去购阅进步书刊。党除了为他们介绍新书，宣传马克

思主义外，也对县中学生进行一些剖析，使学生认清学校的反动性和腐朽性，在他们的思想上为掀起学潮打下基础。房子问题，就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产生的，房子问题发生了，时机成熟了，党即抓紧这一时机，对商城县立中学的问题作了具体研究，并派胡攻非具体领导这一次学生运动。我和钟启太、马石生三个人，被胡攻非指定负责收集情况和与县中学生联系的责任（马石生是邮差，可以利用工作关系收集社会上的反应）。

胡攻非是第一小学的教员，我们每天晚上在他的住室里碰头，由我们汇报情况，他布置工作，吴靖宇、阮渭渔、张心赤（党员）也偶尔来参加我们的碰头会。这样的碰头会由房子问题发生起，直到学潮胜利止，大约连续开了两个多星期。

在“四·八”学潮中，我们采取的战略，是由胡攻非指示的，兹分述如下：

（1）培养骨干，发动群众。我们在第一次碰头会上，将该校学生排了排队，确定培养三年级学生丁树勋、余新甫，二年级学生杨军心、蒋××等为学潮中的骨干（丁是该校学生自治会主要负责人之一，余常和我们在一块演话剧），名义上是由丁领头、党内则派钟启太具体指导，通过他们串连各年级的进步学生，形成一个骨干群，带动同学和“周氏宗祠”的牛鬼蛇神搏斗。全校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学生和钟、丁站在一起。

（2）全校罢课，造成声势。在党的领导下发动起来的群众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县中的学生们首先把学生自治会所要的那两间房子门上原来挂的牌子给摘掉了。进一步又提

出了“我们不仅要这两间房子，我们要整个学校，不能把学校变成‘周氏宗祠’”的口号。这个口号一提出，斗争的目标鲜明了，标语也贴出来了。全校罢课了。周家的一群吓跑了。声势浩大的“四·八”学潮爆发了。

(3) 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扩大打击面。学潮爆发以后，我们特别向学生中的骨干分子提出要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扩大打击面。特别是对中间的学生不能要求过高，只要他们跟着我们就可以了。周心如的心腹学生这时也不敢到学校来了，我们也不去找他们，如果他们自己来了，我们就指派专人注意他们的行动，对于教员也不多涉及，例如对毛谷澄（学潮的导火线本来是为了要他腾房子，但由于他平日是所谓好好先生，而且在教学上很受学生的欢迎，也为社会上所赞许），学生除了摘掉他住室的牌子外，对他再没有其他行动，并派我去向他解释，不是对他是对周心如。这样便将打击对象集中到周心如一人身上。“擒贼先擒王”，只要周心如垮了台，其他的反动家伙也就会跟着滚蛋。这样就减少了对运动的阻力。

(4) 呼吁请愿，争取支持。罢课以后，教职员全部退出学校，校内一切由学生自治会负责，搞得井井有条。为了争取支持，学生也派代表到县政府、县党部（那时国民党县党部的常务委员就是吴靖宇）和教育局请愿，详述周心如和他所聘的教员都不称职，请求撤换校长，以免贻误青年。并到各学校和教育界人士家中请求支持。县党部的负责人和教育局局长张心赤都是共产党员，当然支持学生的行动。第一小学和文中中小学的教职员和教育界人士也都支持学生。县政府在这种形势下也不敢压制学生，把县中的问题交由教育局解

决。同时学生自治会也向社会和家长们作了一些宣传，请求支持。因此，这次学潮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三）“四·八”学潮的声势

根据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出“四·八”学潮的声势是浩大的。其所以能够有这样浩大的声势，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充分地分析了敌我形势和学生的要求，掌握了进步学生，团结了中间学生，孤立了周派的学生。所以全校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学生参加了这一斗争。在步骤上是由要两间房子到要整个学校；在打击面上逐步集中到校长一人身上；在学生的行动上，是由摘掉那两间房子的牌子，到全校罢课，到学生自治会管理学校，到呼吁请愿，争取支持，一切都是有计划地进行，毫无混乱现象；在时间上，约延续了两三周之久，学生都能坚持，不获胜利，决不收兵。

（四）“四·八”学潮的结果

在罢课期间，那一伙反动的腐朽的不称职的校长、教员，都缩在家中，不战不降。当时县政府把解决学潮的责任推在教育局长的身上。我们为了免得以后张心赤的工作增加阻力，所以也不主张由教育局撤周心如的职。当时张心赤向党建议找雷跻唐进城解决。党采纳了这个建议，派我和钟启泰到西乡余家集雷跻唐家中去找他到城里来。雷来城后和吴靖宇、胡攻非、张心赤等交换了意见，决定由他去劝周心如自动辞职。经雷跻唐费了一番唇舌之后，周心如辞职了。一伙反动的腐朽的不称职的教员都跟着他走了。县中校长一职由教育局提议，由县政府委任汪昆源（共产党员）任校长，胡攻非和我也都由第一小学到县中任教职员，县中完全为党所掌握了。

（五）“四·八”学潮对校内外的影响

“四·八”学潮，是一场反封建的斗争，是符合当时商城的受封建势力压迫的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愿望的。因此，县中学生能积极投入这一战斗，而在复课以后，又都立即转入学习。他们在周心如当校长的时候，秩序极不好，上课时用石头向国文教员周孝谦、谭贞午头上丢，这说明了他们对代表旧势力的家伙是痛恨的。学潮以后，课堂气氛是既严肃又愉快，大家尊敬老师，潜心钻研功课。他们说：“若不是把周家的一伙赶走了，我们怎能学得好，生活得这样愉快”。钟启泰也常借此向同学们宣传说：“这就是革命嘛！我们要想好，要想愉快，就得革命；要想胜利，就得大家有组织地行动起来”。同学们很同意钟的说法，这就说明了通过“四·八”学潮，县中学生的觉悟提高了，对革命的认识深刻了，对革命的要求也更迫切了。

社会上也都说：“本来嘛，周心如是阔少爷，他所请的教员有的是他的‘一小袋’，有的是赌棍，这样那象办学呢？”由此可见，人们对代表封建势力的家伙们是憎恨的，是希望有新的力量来代替他们的。这也可以说是人们认识革命，希望革命，欢迎革命的思想表现。

总的来说，“四·八”学潮给予校内外的影响都是很好的。这一次通过青年运动进行反对封建的斗争是和党的具体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一日于武汉大学附中

附件（3）

阮渭渔回忆“四·八”学潮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县中为商城四大封建家族之首的周氏所把持，压迫学生，反对一切革命活动。县中校长周心如，教务主任周念石，都是非常顽固，极端反动的。学生们对校长和部分教师的行动不满，曾开展了一些反抗活动（这些活动是由胡攻非领导的）。

（一九二七年春），由胡攻非具体领导，召集县中二年级学生钟启泰等开会研究如何发动县中学生问题。首先是组织力量，成立县中学生自治会。周心如、周念石坚决反对学生组织，这就是斗争开展的导火线。学生终于成立了自治会，召集全校学生向校长、教务主任和部分反动教师（如谭铮吾）进行说理斗争，并发宣言，争取外援。一小立刻发出支援的宣言；社会舆论也都是同情学生。这一来，周心如、周念石等感到孤立了，被迫辞职离校，反动教师也同时离校，党就派胡攻非和我到县中去，组织临时校务委员会，继续上课。不久，县又派汪昆源任校长职务。这一斗争，才算结束。

附件(4)

谭子惠回忆“四·八”学潮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一九二七年春季，我在商城县中一下年级上学，四月八日闹了学潮，后称商城县中“四·八”学潮。兹将我所知道的学潮的情况写在下面：

当时校长是周心如。同学们都说他是少爷出身不能办学，并任用私人，都不称职。例如当时的国文教员周孝谦，谭铮吾等，音乐教员冯筱珊，事务员熊晋明，……，就在四月八日的上午，三年级同学丁茂赏、吕学正、施家瑞、张肇廉，二年级钟启泰和一年级陈醒华以及全校大部同学都在校长室门前，要叫校长换去不称职的教员。当时校长不出来，有毛谷澄出来向同学们说：“现在好好上课，以后跟校长研究”。同学们仍不愿意，都一起乱吵。第二天全校教师都走了，没人管了。当时有三年级和二年级的同学领导各级开会，选举级代表，组织学生会，维持学校现状。当时学生会的组织有常委、组织、宣传等三个部。常委是丁茂赏，宣传是钟启泰，组织是我。对同学们的要求，就是各级由级长负责，虽无老师，每日要按时到校，并按时上堂自习，不能在课堂上玩，如有不守公约的就由学生会点名惩办。

大约有一星期多的时间，学生会要求的都得到了答复，换了校长和教员，新校长是汪昆源，史地教员雷跻唐，还有黄柏劲。以后就照常上课无事。……

一九八三年五月一日

摘自武昌民政科《毛蔚秋档案》

“一二·九”运动在信阳

中共信阳市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举行了反对日本侵略我国、拯救民族危亡的游行示威活动。十二月十六日，北平各校学生和市民又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集会。北京青年学生的这两次爱国大示威，给了全国以巨大的震动，各地的青年学生奋起响应，纷纷举行示威和集会。地处平汉铁路南段的信阳青年学生也投入了这场爱国运动，举行了游行示威和请愿活动。

(一)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信阳县城广大工人、市民、学生，在豫南特委、信阳县委领导下，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一九三四年的秋季，由于县委书记李剑森被捕叛变，信阳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党的活动受到极大的影响，信阳城区内的革命斗争又一次陷入低潮。直到一九三五年的秋季，党的基层组织还没有完全恢复。尽管如此，在市区内党的活动却始终没停止过。一九三五年下半年，在信师女生部院内和教室的课桌里，落款为“中共豫南支部”的传单，就时有发现。

北京“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开封的进步学生到了信阳，首先在信阳师范学校进行串联发动。信阳师范，当时分为男生部（即原来的三师，现是十三小学）、女生部（前身

二女师，现军分区西院），有学生近千人。该校为信阳最高学府，很早就有党团组织，学生思想十分活跃。一九三四年秋信阳党组织遭受破坏后，该校也一度出现沉寂的局面。但是，党团组织在该校的影响是深远的，所以一经发动，学生很快就行动起来。当时，出面做工作的是学生自治会，他们是这场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一些进步教师如孟秀亭、郎经武、邹夕明、黄绵中等对学生的爱国行动也给予同情和支持，暗中给学生会出主意、订计谋。在此期间，学校处于半停课状态，各班学生忙于写标语、刻印传单、制作小标语旗。同时，学生会还派人到豫南中学、县中、信阳义光中学等校进行串联发动，协调行动。短短几天的工作，各校学生很快发动起来了，一场大规模的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即将出现在信阳街头。

（二）

十二月二十五日，信阳各中学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这一天，信师的学生在学生会的组织下，手执小旗，以班为单位，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向街头，豫南中学、信阳县中、义光中学的学生也陆续走出校门，跟在信师学生的后面。游行从中山路开始，经过大同路，直抵火车站，后向东又南下经过民权路，到东关。在游行过程中，各校、各班都有人领队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声此起彼伏。游行队伍途经繁华的大同路、车站附近时，市民群众纷纷拥立于街道两旁，对学生的爱国行动给予鼓励和支持。游行之后，信阳师范还成立了宣

传组，到街道、路口和繁华地段，开展宣传活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动员民众投入抗日救亡斗争中来。

接着，信阳师范学生会决定二十六日组织学生向车站索车到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请愿，要求到前方去，抵抗日本侵略者，还决定通知其他学校的学生（多是初中的学生）一同到车站，以壮大声威。

学生组织游行示威，学校当局未加干涉。但当学生会作出组织学生到南京请愿的决定后，学校却千方百计地阻挠。二十五日晚，信师将男生部和女生部的大门紧闭，不让学生出入。但是，学生的爱国之心是锁不住的。二十六日早上，天将破晓，信师男生部的学生首先冲出了校门，涌向女生部院墙外。接着，一群身强力壮的学生越墙而过，砸开了大门，并齐声高喊：“同学们，快出来呀！”女生在校院内因出不了校门，早已心急如焚。男同学的呼唤声，使她们欢喜若狂，一齐冲向校门，涌出了学校，随男同学一道高呼口号向车站走去。与此同时，学生会分头到豫南中学、县中、义光中学通知学生集合前往车站。上午八点多钟，所有中学和部分小学（如信师附小、女师附小）的二千多名学生都集中到了火车站。经与火车站交涉索车到南京请愿，车站不允。在信阳学生会负责人号召下，学生涌进了车站。霎时间，月台上、道轨上、列车上都站满了学生；车站的建筑物和列车上贴满了各色抗议标语。学生进站后，佩戴袖章的信师学生负责维持秩序和组织拦车。在信师学生组织下，学生有秩序地坐在道轨上，阻挡机车开出。经过学生的卧轨拦截，南来北往的列车驶进车站就瘫痪在道轨上。到下午三点多钟的时

候，车站已停满了列车，有的列车进不了站，停到了站外。平汉路交通被阻。

学生的爱国行动影响教育了市民群众，激发了他们反对日本侵略我国的爱国热情，因而也投入到运动中来了，其中商界尤为突出。学生在车站卧轨索车，坚持了一天，吃饭成了问题。信师的学生伙房送去的饭菜，仅能解决部分人的吃饭问题，多数学生都是空腹坚持斗争。当商会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动员饮食业的商贩、店铺为学生送饭，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在商会的动员下，烧饼、油条、熟肉、糊辣汤、开水源源不断地送进了车站。商界的支持，进一步鼓舞了学生的斗争情绪，坚定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信心。

学生在车站卧轨索车，致使交通中断，信阳的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惧。于是派出了大批警察和军人到车站，妄图阻挠学生的行动。他们一到车站就威胁说，你们这样搞下去要引起大的流血事件的。学生对这些威吓的话置之不理。他们看硬的不行，又使出软的一套：“你们是学生要好好读书。抗日是国家的事，国家的事由国家作主，你们也作不了主。”学生反驳说：“国家受他人欺侮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还学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驳得他们哑口无言。就这样一直相持着。到下午晚些时候，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的要员出面调停，他们协同各校负责人与学生代表谈判。在他们肯定了学生的行动是正当的，并答应，把学生的要求拍电南京以后，经学生代表做工作，直到晚上学生才逐渐撤离车站，返回学校。

（三）

信阳的青年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中的游行示威和卧

轨索车的行动，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信阳县城人民首次向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公开斗争的群众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青年学生的满腔爱国精神给信阳县城人民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他代表了信阳人民的意志，表达了信阳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之心，是信阳人民掀起抗日民族革命高潮的重要标志；其次，它驱散了自一九三四年秋信阳党组织被破坏、革命受挫后所产生的恐惧心理，为“民先”组织在信师的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其三，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信师一大批曾经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男女青年学生奔赴抗日前线和抗日根据地，是这场斗争结下的丰硕成果。

执笔人：胡宏智

附件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一九三五年）”摘抄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信阳学生二千余人，向铁路当局索车赴南京，平汉路交通被阻。

附件二

信阳师范学校校史摘录

一九三五年秋，省立二女师与三师合并，改称“河南省信阳师范学校”，分两院。

十二月，北京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信阳学生界在信师的倡导、组织下，群起响应。以信师学生为主力的几千名学生聚集于车站，自带行李干粮，要求赴南京请愿。铁路当局不允，学生奋勇卧轨拦车，致使交通中断一日一夜。后经伪信阳县政府多番劝说，学生始散去。

附件三

访问黄茗同志记录摘抄（1984年7月18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学校开始活跃，有几次学校操场上、同学的课桌里、书里发现了落有“中共豫南支部”的传单，我的书里就曾夹过一张。学校让上交。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后，男生部发起，通知我们参加卧轨，以便南下请愿。当时全校出动，警察出来阻拦，县党部也未劝阻，同学们一直在铁轨上坐了一天，中午没吃饭，晚上才回来。

（黄茗同志，1932年入信阳二女师上学，37年10月赴延安。现任中央水电部干部司司长）

附件四

访问汤瑞卜同志记录摘抄（1985年4月12日）

关于一九三五年“一二·九”时，信阳学生请愿卧轨的事。当时，学生（主要是三师的学生）要求到南京请愿，国民党不允，车站上有很多警察，学生去的很多，站台上，车上都有学生。火车开动了，学生一下子都卧在铁轨上。在车站搞了一整天，到吃晚饭时，在车站吃的饭，不知是哪送去的饭。晚上，县党部的（或是县政府）人讲话，你们先回去，你们的愿望向中央传达。天黑了才回学校去。

我当时在县立初中上学，我也去参加了。

（汤瑞卜同志原为湖北省总工会主席，已离休）

附件五

王宜民《我的一点回忆》摘抄

“一二·九”学生运动波及信阳，这天，信阳市的所有

学校（公私立中小学）教职工全部整队到了火车站，把南来北往的火车全部都阻滞在车站内。在党的领导下，全市的工、农、兵、学、商一齐参加了这次救亡活动，声援北平的学生运动。商店市民用竹箩筐抬着烧饼、夹着牛肉，送来热开水，慰问这些参加救亡的学生。我是第一次看到各界民众团结起来的无比力量。

（原文载《丰碑》第五期）

附件六

乔璐同志的回忆材料摘抄（1985年8月10日）

我是一九三四年秋考上信阳二女师高级师范的，在校读了一年半，于一九三六年春转入开封北仓女中高二班。

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我校继开封学生运动之后，才开始游行，提出抗日的口号，并在火车站卧轨。当时我也参加了游行和卧轨。记得南北开来的火车都停在火车站，不能开动。站上很多学生，一直呆了一天，到下午六时左右，学校当局宣布放寒假，于是也未期末考试，第二天学生就纷纷回家了。

杨仲和是开封高中的学生，他在开封也参加了卧轨，他来信师是来看我的，他是我的表哥。当时他不是共产党员，我校的同学们知道他来自开封，便请他向同学们讲讲开封学生运动情况。他便在学生们组织的会议上讲了开封的运动情况。我当时是个普通学生，但也有抗日热情，所以也跟同学

们一起参加了运动。至于学校的组织情况，我是不知道的。当时好象也未听说外地有学生来。

（乔路同志，原名胡宝华，原为安徽省卫生厅处长，已离休）

附件七

穆廉同志的回忆材料摘抄（1984年12月9日）

我是一九三二年考入信阳女师的，一九三六年夏初师毕业。

一九三五年冬“一二·九”运动时，我二哥杨仲和在开封省立一中上学，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约在十二月中旬从开封到信阳，名义上说是看望我和表姐（系他的未婚妻，叫胡宝华），实际他每天活动很多，我只见过他两次。就在此时，信阳的学生运动也蓬勃地开展了起来。后来，我才听说他在二女师校内外都作过报告。

（穆廉同志，原名杨性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局干部）

附件八

李露同志的回忆材料摘抄（1985年8月12日）

“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情况：

“一二·九”学生运动席卷全国，信阳是富于革命的地方，自然很快就积极响应。那次是全市学生行动，我们二女师和三师及全市的所有学生都积极热烈响应。我校有学生自治会，信阳市肯定有我地下组织，有什么事都是和学生自治会联系。那次大规模游行示威，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都从自己的学校出发，高呼口号：“反对内战，共同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穿过大街到达火车站，要求南下，要求南京政府接见我们，如不答应，我们就卧轨。这样坚持了很长时间，惊动了当时信阳市的党政统治者，有一个人出来讲话，说我们信阳市的学生是爱国的，要求是合理的，我们一定将大家的意见反映到南京政府，让我们回校复课安心学习。这样游行示威才结束，回校复课。

这次规模大影响深，使人们认识到团结抗战的重要性。

（李露同志，原名王承中）

附件九

访问李治平同志记录（1985年7月17日）

我是一九三五年暑假考入信阳三师的。

信阳的“一二·九”运动是在得到北京的消息后发动起来的，比北京要晚些天。

信阳的运动，开始是信师三年级的学生发动起来的。发动起来后开始搞游行。游行中，信师走前边，女师、县中、义光中学都参加了。游行的声势很大。我们是从信师出发，经过中山路、大同路、火车站，从火车站到东关，游行队伍

走到大同路时，街道两旁站了很多群众看。当时喊的口号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

游行后的第二天，组织到南京请愿，学生都到火车站。火车一到，先由三年级的学生上车，后来分班上车。当时，司机对学生的行动是支持的，不叫开车就不开了。在车站拦车的中间，从北边来的学生路过信阳，看到信阳的学生运动搞得不错，很称赞。在火车站一天，后来县长和校长赵邦俊劝学生，说，你们先回去，你们的要求给往上传达。

信阳的运动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不清楚。教师中有进步的，如孟秀亭、郎经武，他们后来被捕过，他们与北京有联系。当时我同班同学汪家驹比较活跃，后来到延安去了，此人文革中死了。

（李治平同志，信阳地区农牧局科长，已离休）

附件十

王南生同志的回忆（1985年7月19日）

北京发生“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在广播上听到的，在报纸上也看到这个消息。学生一看到日本侵略我国的消息，异常气愤，真是义愤填膺。我当时是信师二年级的学生。

信阳的运动是信师发动起来的。信师当时是信阳的最高学府，叫“大学堂”。开始学生们搞游行、宣传，学生到大街、街口宣传日本侵略我国的罪行。信师、女师、义光（有高中部）、县中、豫南中学都参加了游行。游行中，打着小旗，呼着口号，口号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游行进行一两

天。当时信阳驻军是梁冠英的部队，他们也出来阻拦，说：“你们快回去，抗日这是国家的事，国家的事由国家作主，你们也作不了主。”学生驳斥说：“国家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还学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说得他们哑口无言。当时没有发生镇压学生的事。

游行以后，信师和女师都把校门关了，不让学生出来。第三天的早上，天快亮的时候，信师的学生首先冲了出来，到女师，信师的学生从女师院墙上翻进去把大门打开，喊：“同学们快出来呀！”女师的学生早就急着想出来，大门一开，学生一下子涌出了学校，信师的学生走在前面，女师的跟在后面，到了火车站，县中、义光、豫南中学的学生都去了，有一两千人。到火车站是北上到南京请愿。学生一到车站，车站上、天桥上都是人，把车站布满了。交通不通了，火车进不了站，车站里的车也开不出去。当时县政府、县党部的人出来调停，与派去的人谈判。学生说，我们要到南京请愿，要求上前线打日本。县政府的人说，你们回去吧，你们的要求，我们给南京拍电报。学生们不听他们的，双方相持不下。当时商界的人士支持学生的行动，商务会的组织给学生送饭。驻军和警察到车站去劝阻学生，没有发生大的冲突。

在老师中有几个支持学生运动的，有姓孟的（孟秀亭）、姓丛的、姓郎的、黄绵中、邹曦民，他们出来组织学生。这几个老师在放寒假的时候被县政府扣起来了。说是请他们去，去后不让出来了。我们还去看过他们。

（王南生同志，信阳地区农牧局干部，已离休）

附件十一

访问徐继业同志记录摘抄（1985年6月28日）

“一二·九”运动时，我在豫南中学读书。在这之前，我们学生中就经常谈论抗日的事。

“一二·九”运动时，周性初（豫南中学教导主任）告诉我说，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当时，成立了学生联合会，设在信师。事前开了哪些会我说不清。豫南中学的运动是共产党员涂忠恕领导的。当时的活动，学校都参加了。到车站卧轨我也参加了。参加的学生很多，豫中一百五十人左右，县中三百人，师范一千多人，小学一千多人。

（徐继业同志，信阳市第四中学副校长）

附件十二

访问刘任远同志记录摘抄

北京发生“一二·九”运动大约十天左右的时候，从北京来了宣传团（或叫别的什么名字），宣传团的几个女学生住女师胡同的一个小旅馆里。他们来的男生可能住在信师男生部。他们来后，到各个班联系鼓动，讲抗日救亡的道理。我记得在女生部没有开大会动员（我当时在信师女生部上高二年级）。当时，我们不上课了，在学校图书馆阅览室里刻

印传单、写标语，我们慌得几夜没睡。标语、传单的内容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不做亡国奴”之类的内容。

在这个活动中，我们举行了游行示威，参加的有信师男生部、女生部、县中，还有小学的学生和市民。游行搞了两天，头一天人多一些，不断有游行的。组织游行的就是信师。游行是从信师出发，经大同路，到火车站，走民权路南下，到南关，各回学校了。游后一两天，组织了请愿，到火车站拦车、卧轨，这也是信师、女师组织的。开始时，县政府软化学生，叫学生回去，一面又威胁学生，说这样搞下去会引起大的流血事件。在车站卧轨时，各校的学生由各校送饭。

“一二·九”运动后，各校提前放了假，也就了结了。

运动中，信阳没有引起大的冲突，当时军队也监视，但没有出大的事。学校当时对学生的行动也没有干涉，有的老师还给出主意。

（刘任远同志，现在信阳师范学院工作）

附件十三

陈立《信阳的一二九运动》（1985年7月8日）摘抄

北京市发起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之后，上海、天津，全国风起云涌纷纷响应，卧轨请愿要求南京蒋介石政

府宣传抗日。信阳是哪一天？记不清。我那时在信阳县立中学刚上初中二年级。一天，吃过早饭，只听打钟集合，学生自动集合到教楼后边的操场上，是谁宣布：“我们全体同学参加今天的卧轨请愿活动。”县中是三年级某同学领队，到达火车站，信阳师范、二女师的同学早到了。火车一列列开进信阳车站，就被学生拥上列车扣下来，司机下车走了。我也上过两列火车。在站台上，见有少数信师同学佩戴着红袖章，一位年龄较大的、我不认识的男同学，也给我一个红袖章，让戴上。到三点左右，车站上列车停满了，一趟车也没开出去。听说，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火车站派代表，邀请学生代表谈判，谈判结果是：政府把学生的要求一定打电报给南京国民党政府。要求抗日是正当的，但学生不要派代表去南京了。将近黄昏，信师同学先走了，其他同学也都离开车站回家了。

发起这次运动是信师同学，因早饭后是他们来通知县立中学的。县中三年级同学是谁接洽的和领导的，记不清了。

（陈止同志，现为信阳市二商局干部）

灌河两岸的硝烟

——对商北地区红色政权的片断回忆

李永海

灌河，起源于大别山脉西侧，横穿商城县北部的丘陵地带，把大别山脚下的商北地区分为东西两块。两岸有大片肥沃的土地，勤劳的农民，在当地素有“鱼米之乡”之称。

一、农民暴动，建立政权

灌河以东，围绕着大别山支脉的观音山、黄山头脚下的南司、武桥、杨堰一带，是我的故乡。在我的少年时代，这片土地的农民，为了反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震天动地的武装暴动，建立了红色苏维埃政权和人民武装。这片火焰和山内的革命烽火连成一片，燃遍了整个大别山。

灌河两岸，长期被地主反动势力所控制，沿河西双椿铺、鄢岗一线驻扎着大大小小的民团武装和大刀会，这条平日宽不过百多米，深不过三尺的灌河，就成了两军对垒的前沿阵地。

早在一九二七年，商北地区就有共产党的秘密活动，他们组织地下农民协会，反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一九二八年，南司和武家桥成立了党支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一九二九年商城南部大别山内的农民武装暴动，推动了商北

地区人民武装革命的积极性。同年五月，地下党的秘密武装里应外合袭击了驻南司的胡晓云民团一部，打死了民团秘书杨春寒，缴了二十多支枪。这一仗，打掉了驻河东民团的气焰，鼓舞了农民武装的斗志。一九三〇年二月，南司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南司暴动，打了南司街上的大恶霸杨松桥。

这次武装暴动，震动了整个商北大地，使商北地区的革命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商北党组织根据赤城县委的指示，同年四月在县委陈慕尧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在回龙集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宣布五区苏维埃政权正式成立。随后，各乡村的苏维埃政权相继诞生，各种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在各乡蓬勃开展起来，整个苏区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为了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保卫胜利果实，苏区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脱离生产的区模范营、乡模范连，由革命坚决、身强力壮的农民组成；同时又成立了赤卫队、少先队。这些地方武装武器十分落后，只有少数钢枪，大部是土枪、梭标、棍子。面对河西枪多势众的民团、大刀会，苏区人民没有屈服，就用这些劣势装备，对付敌人的多次进攻，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苏区，保卫胜利果实。

二、匪兵逞凶，苏区遭难

对充满生命力的红色政权，被打倒的地主劣绅恨之入骨，他们联合河西的反动武装，企图扑灭河东的革命烈火，把新生政权扼杀在摇篮里。

一九三〇年八月，河东的红色政权成立只有四个月。河

西胡晓云、严正国反动民团纠集了双椿铺一带的大刀会匪徒，共两千多人，数百条枪，兵分两路，气势汹汹地涉过灌河，杀向河东。一路匪兵从南司北面的王小店过河，经张老营、陈家冲向杨堰、栏杆桥方向逼进；另一路从南司以南的石佛寺过河，直插黄山头、观音山、赵棚等地。匪兵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无恶不做，黄山头脚下的金家湾、易冲、杨堰一带，农民的房屋被烧得象一条条火龙；粮食、牲畜被一抢而光。人们被迫扶老携幼，向山里逃去。来不及躲避的群众不是被抓走，就是被杀死，沈糟坊的沈永让因病跑不动被团匪杀死在菜园内，后糟坊的胡结子跑不及被杀死在田埂上。刹时间河东各村枪声四起，火光冲天，哀声不绝。

情况紧急，五区苏维埃政府一面由政府所在地回龙集向东转移，一面派人向山里找县委求援。区、乡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带着游击队和区、乡的模范营和模范连，坚持与敌人周旋，掩护群众向山里撤退。他们边打边撤，争取时间，保证了苏区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安全，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县委接到五区苏维埃政府的告急，主力红军红一军二师的一部从赤南斑竹园飞速赶来，县独立团也从苏仙石直插灌河。枪声就是命令，火光指示了战场。战士们如下山猛虎，直扑敌阵，敌团匪没敢与红军主力接触，慌忙向河西逃窜，我红军主力一直追到灌河沿才罢兵。

匪兵是撤退了，苏区却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遍地狼烟，尸陈荒野。但红色政权没有被消灭，革命的烈火只会越烧越旺。敌人的残暴教育了苏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使人们更进一步加深了对敌人的仇恨，认识到组织人民武装的重要。苏区

青年纷纷要求参军参战，仅我们五区四乡，一次就有三十多名青年参加红一军二师。区、乡的地方武装经过与敌接触得到了一定的锻炼，苏区的损失也使苏维埃政府吸取了教训，进一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加强妇女会、童子团等群众组织，站岗、放哨、盘查可疑行人，管制不法的土豪劣绅。在沿河岸边，赤卫队、少先队的岗哨遍布如林，苏区人民提高警惕，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再次进攻。

三、针锋相对，出奇制胜

一九三一年四月，河西民团头子胡晓云、王少英等召集双椿铺周围的大刀会头子们在双椿铺开了一个会，他们认为河东没有红军主力，是个好机会，可以组织兵力到河东来“拉网”，扫平河东沿岸一线村庄。当时，古城马围的士绅姜西周也参加了会议，会后漏了嘴，被与河东有亲戚的邻居杨二郎听见，他大吃一惊，急忙叫胡传炳悄悄过河送信。同时，河西地下党也得到情报，急派高××（名子不详）过河找区委汇报。区委根据各方面的情报，抓紧动员一切力量，作好战斗准备。

四月中旬，区委在沿灌河一线集中了有两千多人的赤卫队、少先队，各队打着队旗，带着红袖章，扛着土枪梭标，没有武器的拿了锄头、棍子。队伍在南司集合后，赤卫队大队长杜春山、副大队长范成明（外号范长腿）把队伍布置在沿河一线摇旗鸣枪，迷惑敌人。我们四乡童子团（我当时是四乡四村童子团队长）也集中在河边大圈一带，送水送饭，呐喊助威，协助赤卫队、少先队坚守河岸。

河西民团拥有大批钢枪，而赤卫队仅有三支钢枪，内有

两支潢川造，单打一撅把子枪有十支，但子弹很少，再加上二十多支土枪和一些长矛棍子，双方武器装备极为悬殊，且队员们听说河西大刀会的匪徒擗坛贴，刀枪不入，因此一些队员产生了畏敌情绪，怕没有主力部队，万一顶不住，苏区人民又要遭到不幸。面对这种情况，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一方面做队员们的思想工作，不相信敌人刀枪不入的鬼话，另一方面积极发动群众想办法。在老乡们的帮助下，找到了三门地主王志香护寨的“过三苗”（一种土炮），赤卫队员李明光、李麻六、杨荣江、沈文先等人又弄了一段水桶粗的柳树做了一门土炮，炮身用三道铁丝箍起来。赤卫队员们把这些土炮拉进河边树林里做好简单的炮阵地，苏区群众为了支援队伍保卫家园纷纷砸碎了犁铧做土炮的霰弹。为了迷惑敌人，又把一门土炮绕上红绸子，赤卫队员们每天沿河岸拉两趟，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

河西敌人被弄昏了头，摸不着虚实，只在河边活动，不敢轻易过河。这样，双方相对几日。一天，河西民团头子们得到了从苏区跑出去的内奸李××的告密，知道河边只有赤卫队，炮也是假的等等，急忙联合大刀会头子敖长久、刘奉兰、姜振武等人，集结一千六百多人，二百条钢枪，兵分三路，从龙嘴、王小店、金家寨的对岸涉水过河，杀向河东。

敌人来势凶猛，金家寨这路敌人最多，以大刀会为主力，王小店方向以王少英民团为主，加上山坎一带大刀会数百人，同时向我阵地发起冲锋。大刀会的匪徒冲在前面，这批乌合之众并不讲战术，只是挥着大刀，口中念念有词，象赶鸭子一样一哄而上，民团在后压阵。他们用密集的火力压

住我滩头阵地，气焰十分嚣张，我阵地处在危急之中。这时，赤卫队副大队长范成明急忙命令队伍：“要沉着，坚持住阵地，区里的模范营、战斗连会来支援我们的！”他带着赤卫队员们把炮口对准敌人，密切注视着敌人动向。

当敌前锋接近河岸时，指挥员一声令下，赤卫队员李光明、沈文先等人一起点燃土炮，轰隆隆一阵巨响，飞砂走石，硝烟迷漫，大片的霰弹飞向河里的匪徒，三十多具尸体立刻躺在河中。十多个受伤的匪徒嚎叫着掉头就跑，血染红了河水，大刀会匪徒们刀枪不入的鬼话不攻自破了。匪徒们吓破了胆，纷纷调转方向，撒腿就跑。西岸的民团再也压不住阵，也被退下来的人流卷了进去。

看着前面敌人的狼狈象，我们的队伍士气大振，赤卫队、少先队员们吼叫着，端着土枪、梭标冲下河岸，向敌人追去。大一点的童子团员们和着千百个农民群众，拿着锄头、扁担汇成一支不可挡的洪流，涌向河西。

急急逃命的大刀会匪徒慌不择路，跑得七零八散，民团也不敢抵抗，只是拼命向双椿铺方向逃窜。这时，区模范营在营长陈初才的带领下赶到了。这支生力军和一部分赤卫队、少先队从张老营北涉过灌河，一直追到双椿铺。所到之处就地打土豪，开仓济贫，古城大刀会头子姜振武的粮仓也被打开，赤卫队、少先队队员们一边放粮，一边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分到粮食的白区群众无不欢欣鼓舞。

这一仗，打死敌人五十多人，打伤数十人，缴获钢枪两支，大刀二十多把。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没有什么战斗经验的赤卫队、少先队队员们沉着、冷静，克敌制胜，不仅打掉了敌人的威风，保卫了苏维埃政权，而且在白区的群众

心里留下革命的火种，我们的队伍更加成熟，更加有力量了。

四、并肩作战，红旗漫卷

灌河以东的五区苏维埃政权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更加坚强了。她以土地肥沃，人丁兴旺的有利条件，源源不断地往山区根据地输送兵员和给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块土地上的农民，开始过上了不受欺压的日子。

革命的烈火越是烧得旺，敌人越是害怕。他们知道这把火会烧掉他们所维持的那个阶级，那个社会，使他们的反动政权变为灰烬，这是他们所不甘心的。他们要纠集更大的反共力量，来挽回他们的失败，一场更为严峻的考验又摆在苏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面前。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的一天，在河西汉王庙里一个毒辣的计划制定出来了。本地民团头子江海峰、严寿之纠集了固始县大荒坡民团队长、土匪头子张大傻子和潢川县民团一个大队加上本地大刀会，三县反动武装三千多人，上千条枪，妄想把河东苏区扫为平地。会后，敌人调兵遣将，集结在灌河西岸，准备大举进攻。

正当敌人做如意美梦的时候，河西地下党和已觉悟起来的白区群众，已把敌人的计划和情况报告了河东五区区政府。区委书记刘文炳在杨堰主持了紧急备战会议，把五区的区、乡模范营、模范连从上石桥沿灌河河边布防，并及时动员各乡村农民赤卫队、少先队近两千人，作为后备军，同时把敌情报告给赤城县委，由于这次敌人兵力、武器都强于以往历次战斗，请增派主力部队支援。布置完毕，各部队立即

行动，进入沿河阵地。

狡猾的敌人并没有从我布防正面进攻，而是兵分三路，两路从固始县境的小周寨过河，沿王楼、张白堂向白塔集进攻；另一路从沈营子北面过河，直扑小白岗，往独板桥、塘湾方向进犯；还有少数和大刀会匪兵从李集往土埂、老塘角、上石桥方向前进。但这股敌人没过河，目的是要拖住我沿河坚守武装队伍，使我们力量分散，击破我们防守阵地，消灭我们武装力量。

敌一路进攻部队过河不久，直插小北岗，往独板桥向塘湾这个方向前进，进到白塔集附近和我区模范营的一个连交起火来；随后其它两路敌军所进攻的地方也枪声大作，火光四起，杀声不绝。

敌人依仗人多枪好，频频发动冲锋，我地方武装人少枪劣，只能消极防守。为了保存力量，我各部队边打边向上石桥以北的岳岗撤退。

正当战斗越打越紧时，赤城县独立团和五区战斗连遵照县委指示从杨家楼急行军向上石桥赶来。他们赶到上石桥以东的长山头，独立团孙团长召集各部队指挥员，要求把区乡的地方武装大部集中起来，交给区模范营营长陈初才同志统一指挥，在正面（南面）引敌深入；部分赤卫队、少先队配合区战斗连拦击敌人东面；孙团长带队向西迂回包围，把敌人赶进西北侧的紫江湖地区，使敌插翅难逃。

各部队按计划行动，陈初才带领队伍分别把白塔集、庙岗、旭光、刘楼的敌人都引到岳岗附近。几路敌兵纠合一处，人多势众，火力很猛，而我火力甚弱，轰轰的土枪声夹杂着少数钢枪的枪声，敌人认为我军不堪一击，向我阵地猛扑，

冲进岳岗。我模范营、赤卫队仍然不紧不慢，边打边退。这时，县独立团大队人马已悄悄迂回到敌人背后，敌人却以为是他们增援部队到了，狂喊乱叫，枪声更紧，几乎所有火力都向牵制部队的正面压去。这时县独立团摆开阵势，三支手提（冲锋枪）首先开火，密集的子弹成扇形射向敌人，大片敌人被撂倒在田野里，团匪们大惊失色，乱了阵脚，纷纷乱跑。我三路部队，趁机发起冲锋，把大股敌人压到紫江湖。

紫江湖不宽，倒有三四华里长，大批团匪被压到这里，互相挤撞，乱做一团。我追击部队三面赶到，用强大火力把敌人驱赶到湖沿岸，团匪纷纷倒毙，呼爹喊娘。我军一个冲锋冲进乱敌之阵，赤卫队、少先队的梭标、竹枪大显身手，直杀得敌人鬼哭狼嚎，有的掉到湖里，有的死在湖沿。模范营长陈初才身先士卒，猛杀猛打，他一人一连捅死七个匪兵，有的团匪吓破了胆，在他的枪口下举起了双手。战士们更是个个争先，紫江湖沿岸遍地敌人尸首，剩下的敌人纷纷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这一仗从早晨七点多钟一直打到下午五点多钟，共灭团匪、刀会匪徒五百人，缴获长枪五十多支，盒子枪七支，手提（冲锋枪）四支，大刀三百多把，大获全胜。人们押着俘虏，举着红旗，扛着钢枪兴高彩烈地拥向县独立团，感谢主力红军的支援。苏区群众喜气洋洋，高兴劲不亚于过新年。

通过一次次的战斗考验，区乡地方武装的战士们逐渐成熟了，战斗力增强了，保卫苏区的信心更足了，五区苏维埃政府也更加巩固了。苏区政府一面把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

向河西发展，推动白区的人民群众向欺压他们的土豪劣绅做斗争，一面扩充红军，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增加新生力量。河西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保甲制度，赶走了民团、大刀会，打倒了当地的土豪劣绅，有的地方也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从此，商北苏区连成一片，革命烈火越燃越旺。淮河两岸的人民群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了他们的力量。

一九八五年元月十五日于

安徽省军区合肥干休一所

（此处为大量模糊不清的印刷文字，内容难以辨识，疑似为正文或附录的开头部分）

新集城下民主会

游正刚

在我们鄂豫皖苏区的腹地，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安插了一个钉子，这就是地处豫南，位于河南、湖北、安徽三省交界地的新集城。这座城，三面靠山，一面临河，加上又有大石条砌垒的城墙，易守难攻，遂成了兵家争夺要地。

自打鄂豫皖边区开展轰轰烈烈的苏维埃运动以来，新集周围的土豪劣绅在土地革命的急风暴雨中，纷纷携带地契文约，金银财宝，爪牙打手，逃进他们视为固若金汤的新集城。这样一来，早就盘踞在这里的曾（仲炎）、刘（建甫）两大豪门和反动民团头子邱某（记不清）为首的反动势力就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聚越多。不到两年功夫城内守敌就增到千人以上，成了豫南的反动中心。它的存在，严重地威胁着七里坪和金家寨这两块根据地的相互联系，影响着我党在豫南开辟工作，扩大苏区，进行苏维埃运动。

为了打通商光苏区的联系，开辟扩大苏区，红军根据鄂豫皖特委的指示，曾先后六次攻打新集城，但都因城墙坚固，防守严密一直未克。

一九三〇年腊月，党中央决定把战斗在鄂豫皖苏区的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任命邝继勋为军长、余笃三为政治委员、徐向前为参谋长。我所在的红一军王树声团遂改编为十师三十团，我仍在团部当勤务员。

部队整编后，形成了拳头，力量空前强大，加上领导有

方，军事上连连取得胜利。一九三一年春，当我们红三十团在横扫杜甫店一带守敌后，正要休整，军部又命令我团攻打新集，拔除苏区腹地的钉子。这是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全团指战员顿时欢欣鼓舞，摩拳擦掌，纷纷表示：“打开新集城，为前六次在攻城中牺牲的战友报仇。”“活捉曾刘邱，把新集的天下还给民众。”

我们红三十团和地方赤卫队团团围住新集时，参谋长徐向前来到了前沿亲自担任攻城总指挥。记得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他精神抖擞地来到设在小树林里的团指挥所，这时我们在团部工作的几个小战士，按照王树声团长的指示，正在思索着破城的办法。

突然，我的背后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小游，又在想家么？”

我抬头见是一年前在我家住过的老师长徐向前同志，腼腆地说：“不是，我们在动脑筋哩。”说着就热情地迎了过去。

徐参谋长拉住我的手问：“你们王团长呢？”

“那不是。”我朝不远处的一堆人中指一指。

“走！”徐参谋长拍了一下我的肩头说：“去看看去。”

我随徐参谋长向那堆人走去，老远他就高喊：“王团长，不好打吧？”

“嗯！”

“部队现在干什么？”

“发扬军事民主哩！”

“好，这个办法好。靠群众就会一计不成，再生一计。”

徐参谋长指了指在场的红军战士，坚定信心地说：“那你也

带我去听听诸葛亮们献计吧。”

徐、王首长相随，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听会。路上王团长把几天来的战斗情况向徐参谋长做了详细汇报。

当谈到“稻草隐蔽接近战术”时，徐参谋长停住脚步，不解地问：“什么稻草隐蔽，你再细说说。”

“好！”王团长答罢，便详详细细从头到尾介绍了一遍。那是我们团围住新集城后，面对十几米高，用大石条砌起的城墙，部队几次组织试探性攻城未成功。于是王团长就让战士出主意，想攻城办法。他跑到思想活跃的三连七班的阵地上和战士一起讨论。讨论中，一位姓魏的年轻战士讲了一件他当红军的往事：一九二九年十月的一天，村里的土豪伪善人，唆使狗腿子打骂忠厚的邻居老人，他看不过眼，背后说了几句公道话。伪善人知道了，就派反动的红枪会晚上捉拿他。当他被砸门声惊醒时，已来不及跑脱，情急智生，就躲进了下午刚挑回来的稻捆堆里。红枪会的人破门入屋后，在家里满屋寻找，这儿放一枪，那儿捅一刀，子弹、刺刀还不住地落在稻草垛上，而他却安然无恙，没伤一根毫毛。小魏不紧不慢地讲，战士们急得直跺脚：“人家都快急死啦，你还有心思耍贫嘴。”“都这时候啦，还讲陈谷子烂稻糠。”王团长见状忙摇手制止：“别急，让小魏把话说完。”这时，小魏把话打了个结，满怀信心地说：“我是想说稻草用处大，只要咱们把它蘸湿打成捆，人躲在后面滚着稻草前进，准能隐蔽接近城墙根。”“噢——，原来你的葫芦里装的是这号药。”“怎么不早说呢！”瞬时，全班战士们欢腾起来，大家又七嘴八舌补充了一阵子。事后，王团长高兴地把它命为：稻草隐蔽接近战术。

部队按照小魏献的计，组织攻城，开始很生效。只见敌人的子弹在草捆上“扑扑”直响，却奈何不了草捆后面的战士。很快，几十个战士在稻草捆的掩护下，来到了城墙跟。不料，在战士爬云梯时，狡猾的敌人，又从城墙上朝下放起一种一丈多长、两把多粗、上钉大靶钉的滚扎，把一个个云梯砸翻在地。侥幸登上云梯顶端的战士，欲要爬墙，又被敌人用大刀砍，梭标捅，打了下去，就这样稻草隐蔽接近战术失败了。

徐参谋长听完王团长的介绍，感慨地说：“这又是敌人欠下的一笔血债，记着，这回我们定要和他们算总账。”

徐、王首长说着话，不觉来到了一连二排的阵地。这时，正赶阵地上的十几个战士在吵嚷子，劈劈叭叭，各不相让。一细听，原来是为爆破城墙的事在争论。

徐参谋长建议说：“凑凑热闹去。”

两人来到二排，排长张佩祥赶忙起身，拨开通路，象盼到救星一样急说：“徐参谋长、王团长，你们来的正好，快给评评理！”

“好，好好，大家都坐下。”徐参谋长招呼着这些有礼貌的战士坐定，和蔼可亲地说：“你们争论，我和王团长老远都听到了，都有理，要让我评理，得各打二十大板，同志们很有创见，真是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

随之，徐、王首长又和二排的战士一起研究爆破的具体办法，商定：坑道口选在北门外，离墙一百多米远的树丛旁。为了不让敌人发觉，晚上分班轮流土工作业。

经过七、八天的挖凿，终于掏成了一条宽三尺，高四尺，长三十多丈的坑道，直达北门底下。

担任爆破任务的一连二排，通过附近村里农民协会的帮助，买得一口棺材，从坑道口运到北门底下，作爆破准备。当时红军没有黄色炸药，只好搜集老百姓打火枪、点铳用的土炸药代替。战士们在棺材里装满土炸药后，又找来了一根七、八尺长的竹竿，打通中间隔的节，灌进了火药当引信，从坑道里捅出地面，再和事先用纱布装药的特殊引线连接在一起，拉出老长老长。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日，一切准备就绪，徐、王首长又亲自检查了一遍，觉得万无一失。王团长就向徐参谋长征询说：“怎么样，点火吧？”

徐参谋长说：“可以。”

王团长即命令担任点火任务的张佩祥说：“点火！”

“哧啦”一下，纱布引线点燃了，“哧哧”的火神，飞溅着火星，象火龙一样沿着引线飞速向前。

等待冲锋的战士，两眼紧盯北门，象支支欲要离弦的利箭，聆听着惊天动地的巨响，飞向缺口，冲进城去。

一秒、二秒，……。战士们屏住气，听着、看着、等着。

“轰隆”一声巨响，山摇地动。随着响声，北门口炸出了一个缺口。响声就是命令，战士们象飞箭、似利剑，越过缺口，飞进了六次都未打开的新集城。

巨响声，使城里的敌人吓懵了头，还没来得及辨清发生了什么事，就死的死，伤的伤，倒在红军战士的刺刀、大刀下。上千名的反动武装如数歼灭，曾、刘、邱三个反动匪首也被一个个生擒。

新集解放了！山在呼，马在叫，战士在欢笑。徐、王首

长看到威武的红军战士，押解着蔫头呆脑的俘虏，喜逐颜开，不禁感慨起来。

“王团长，你看战士们多可爱呀！”

“是呀，有他们冲杀，我们的革命就一定胜利。”

“看起来咱们还得好好向他们学习，请战士当老师哟。”

“……，……。”

听着两位首长的赞叹，我们这些跟随的战士异常感动，不住地在心底里说：“向首长学习。”“要革命到底！”

（薛春德整理）

留在大别山的火种

张 波

一九三二年，红四方面军离开了鄂豫皖，吴焕先同志被留下来，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任军长。紧接着，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二十五军打了两个大胜仗。一仗在河南光山郭家河打响，全歼了马腾蛟师两个团，共击毙一千多人，俘虏敌团长以下二千余人；另一仗是我军在黄安县（今名红安县）七里坪以北潘家河的黄石岩，消灭敌人十三师的一个团。继此之后，由于王明“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干扰，上级命令红二十五军围攻七里坪，历时四十三天。

当时，敌人已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老苏区已成了游击区，我军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并且，敌人又在苏区实行“三光”政策，部队食粮奇缺，只能靠大麦、田野里的青菜和槐树叶充饥，病号又多，每天退下来一百多人，战斗极其艰苦。

我那时是军械股长。有一次，军部在陶家边开会，省委书记兼政委沈泽民，副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鄂东道委书记郑位三，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珊等领导同志参加了。吴军长要了解军械股武器的情况，就把我喊到了他的跟前：“我们部队每天有多少枪支交给军械部？”

“一百多支。”我的声调不高，心里很难过。

“怎么知道是我们部队的枪呢？”他又问。

“因为枪托上有战士们的名字。”

吴军长接着说：“现在军械库里共有多少支枪？”看得出，他的脸色也很难看。

“一千多支。”

吴军长再没有多问了。他感到很吃惊：这一千多支枪就说明我军在围攻七里坪的战斗中已伤亡了一千多人。于是吴军长在会上提出建议：“再不围攻七里坪吧，把部队拉出去打运动战！”

但是，沈泽民马上就发脾气了。他当场责备吴军长道：“你家是什么成份你知道吗？”言外之意就是反对吴军长的建议。

我知道，吴军长是一个破落地主的子弟，心里暗暗为军长担心。幸好，沈泽民再没有说什么。按沈泽民的意图，我军围攻七里坪又继续了二十多天，吴军长再也不提什么建议，只是对我说道：“你到我家，把救济我老娘的五十元钱拿回来退给组织。”我知道吴军长是在生气，就不服地答道：“那钱是组织上照顾您五十岁的老母亲的，我怎能忍心去拿？”

“你没有听见昨天沈书记质问我是什么成份！你真的不知道我家是什么成份吗？”

我激动起来，眼睛里含着泪水：“吴军长，您家的情况我清楚得很。您家虽然是破落地主，但也同样遭到国民党土匪的残害，您是我们的好领导！一九二七年，您家还被那些丧尽天良的狗杂种打死了七口人……我不能服从您的这个命令，钱，我是不去拿的。”

吴军长听到这里脸色变得铁青，鼻翼也抖动着，显然他

正沉浸在往事的悲痛回忆中。我内疚起来，不该挑起军长心灵上的创伤……

终于，沈泽民的主张不能再坚持下去，我军在包围七里坪四十三天后，撤出了战斗。可是这时的战士，个个都已骨瘦如柴了。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正常人行走都很困难，何况病号呢？部队好不容易撤到谭树岗、和尚头和莲花背等地，但又被敌八十八和八十九两个师包围住，我们被迫跟敌人打了一整天。一天里，战士们滴水未进，而敌人每一次进攻，都被我们的战士打退，直到当晚部队撤到西张店一带时，我们才吃了一顿饭。

部队刚休息了半天，敌人又追逼上来了，我们只好躲开强大的敌人，当天夜晚又继续行军，走到麻城黄土岗，敌人八十九师早已设下了埋伏。战斗在拂晓前打响，经过一场鏖战后，我军撤出了包围。十月初，敌人把我们的部队打成了两节：七十三师和七十四师，一部分由徐海东、郭述申带领到皖西去了；吴焕先、高敬亭率七十五师和手枪团的两个分队进到郭家河天台山高山岗地区，这里已是大别山的深山区了。

大别山区，群峰蜿蜒，地阔人稀，满目凄凉。有的地方房子被国民党烧掉了，人被赶走；有的地方本来就是无人地区，我们只好在这里打游击战。我们原来的根据地大多已经丢失，政府工作人员转入到了地下工作。地下工作人员只能在夜晚出来给我们转送情报。我们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地方，也只能在晚上出来活动，袭击敌人。

那时，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已经进行了大半年，敌情正紧张，我们几乎天天打仗，伤病员又没地方休养，只在山

沟里搭个草棚，没有医药，有时就用南瓜瓢子代药或请附近药农弄点草药，又加上没有足够的营养，这样，伤病员恢复很慢，导致我们部队大量减员。

当时，高山岗地区（包括鹭鹭岩、鼓家店、卡房、仰天窝、灵音寺等地）是我们的游击区，宣化店以东的苏家河、晏家河、九里十八寨等地方是敌占区。有时我们晚上到敌占区去弄点稻谷回来，但在我们的根据地内又没有工具把稻谷整出米来，只好分到各班，用石头打壳，用斗笠簸糠壳。因此，根本谈不上什么改善生活。然而，敌人向我们进攻时，一出动就是几路，最后，吴焕先同志率领的部队只剩下一千多人。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大雪封山，气温下降到零下十多度，而我们的战士们还没有穿上棉衣，脚上也只穿着草鞋。这时候，伤病员更多了，部队减员更大。其实，真正被敌人打死的还少，恶劣的环境不饶人啊！尽管如此，却没有一个人开小差或叛变投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样艰苦的奋斗，是为了解救劳苦大众，为了让更多的人以后过上好日子。

记得有一次在苏家河打民团，我们部队没有子弹，只靠梭标与敌人拼刺。敌人一来，我们就分散开来，隐蔽在山洞里，敌人撤退时，军长就命令司号员吹响雄壮嘹亮的军号，战士们又迅速集合起来，瞅准机会打击敌人。就这样，我们在吴军长的领导下，完全摆开了敌人的纠缠。相反，敌人还被我们的神出鬼没搞得胆颤心惊，不知所措。

有一天，雪停了，但天还阴沉着，北风在一个劲儿地吼叫。敌人的三十二师、四十四师再加上顾敬之民团、易本

应民团分五路（宣化店一路、七里坪一路、郭家河一路、浚陂河一路、罗山县潘店一路）袭击高山岗一带。他们都是共产党的老对头。当时正值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最初时期，他们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叫嚷要“活捉军长吴焕先”，并贴出告示：谁活捉到吴焕先，赏钢洋一万元；能拿回他的人头，赏钢洋五千元。但是敌人毕竟是嚣张一时的纸老虎，这次敌人的五路合击并没有消灭我们，可是，吴军长却遇到很大的危险，差一点牺牲。

那是敌人出击的当天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一伙敌人紧追吴军长，从仰天窝到鼓家店已是十多华里。这时我们的部队都被敌人冲散，几乎没有抵抗的能力了。军长只带着两个警卫员和一个号兵，势单力薄。在鼓家店小河滩上，敌人的先头部队四、五人接近吴军长只有五、六十米，情况万分危急，值得庆幸的是敌人嗜财如命，想抓活的，所以没有开枪，敌人边追边喊：“站住！缴枪！”

吴军长边跑边说：“我缴一件大衣给你们吧。”说着，就把身上的一件蓝呢子大衣脱掉扔在地上，敌人以为大衣里肯定有好些钱和值钱的东西，便一窝蜂地扑向大衣，胡乱在口袋里摸着。然而，很使他们失望，口袋里除两个干馍外，再别无它物了。吴军长趁这个机会，紧跑一阵，渐渐甩开了敌人。

恰好这时，我带领一个班跑到这，发现了这一情况。我们相距敌人也只剩一百多米，我便命令全班战士迅速爬到鼓家店小庙的小堰子上，十三支驳壳枪同时开火，每人打了二十发子弹，把正在争夺大衣的敌人打死三人，打伤二人。我们虎跃般冲上前去，缴获了敌人五条枪、一千多发子弹、二

十多枚手榴弹，夺回了军长的大衣。这时，远远地见到尾追的敌人逼过来了，我们就撤退了。

退到小垭子上，又跟敌人打了一会。天，渐渐地黑了下來。敌人在白天没有消灭我们，在晚上更害怕我们这些“夜老虎”。所以也不敢再追了，疲倦不堪地向据点退去。我们擦了擦脸上的汗水，辨清了军长去的方向，顺着雪地里留下的一行歪歪扭扭的脚印，寻找军长去了。

我们走啊，走啊，一开始并没有觉得什么，这会就感到寒风刺骨了，肚子里咕咕叫。但我们寻找军长心切，没有停下来休息一会。我们一路小跑起来，直到了宣化店以东的黑狗子寨，借着白雪的映照，才模模糊糊地发现“几户”人家。当我们走近时，所看到的只是被大火焚烧过的断垣残壁，只有半间茅屋幸存。正好，军长等四人就在里面烤火。军长身上披着一件毯子。他见到我们时很高兴，连忙招呼我们坐到火堆旁。我没有立刻坐下去，望着军长，不无担心地说：“军长，您今天太危险了！”

军长不以为然地笑了笑，眼睛盯着我们缴获的战利品，很高兴地说：“你们刚才干得好哇！”接着他不解地问道：“你们刚才打枪，象打机关枪一样热闹。部队不是没有发子弹吗？”哦，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军长之所以扔下大衣诱惑敌人，是因为他们没有子弹啊！我连忙解释道：“是我从军械股带来的子弹。”接着，我又把隐藏子弹的秘密告诉了军长：“我原来在军械股任股长，因连续五次‘围剿’，我军机关缩小，我就到手枪团里任一班班长了。”军长有点吃惊：“哎呀，股长换成班长，你没有闹情绪吗？”我笑着摇了摇头。我暗想，这都是革命工作的需要，难道还讲什么职

位的高低？当然我不会把这一想法透露出来。

军长穿起了我们夺回的大衣，站起来说道：“你们今天打了个胜仗，第五次‘围剿’以来的第一次胜仗！”确实如此，自从围攻七里坪以来，我们都是被敌人追着跑，今天才算瞅了个机会，打击了敌人一下，尽管不算什么大仗，但吴军长还是很满意的。这从他脸上的笑容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把缴获的战利品全部交给了军长，另外还把我们随身带着的子弹给军长和警卫员每人三十发，军号员二十发。军长很高兴，也很激动，他命令我说：“从今以后，你就是一分队的副队长了。”我不好意思接受，因为我觉得我并没有做多大的事情：“我还是当班长好。”军长不同意。按照他的命令，我当了副队长，并兼任专职支部书记。

深夜，我们从破屋子里出来，军长问警卫员：“还有干粮没有？今天打了胜仗应该吃点东西。”可是警卫员回答说干粮在今天早上就完了。我于是从口袋里掏出两块凉干糕来，递给军长。军长也没有推辞，接过去分一块给警卫员和军号员，自己拿一块，兴奋地嚼了起来……

我们连夜来到鼓家店，军长命令军号员吹响军号。很快，战士们就集合了。军长把缴获的子弹每人发了两发。有了子弹战士们一下子活跃起来了。军长站在一个石碾子上，对战士们说道：“同志们，手枪团今天打了一个胜仗，希望你们象他们一样，拿着从敌人手中夺来的子弹，狠狠地打击敌人！”军长洪亮的声音，在山谷里震响，战士们也都暗暗下了决心，在磨拳擦掌……。

第二天凌晨四点多钟，部队冒着小雨，向周党畈民团进军。当敌人还在酣睡时，就在被窝里乖乖当了俘虏。我们将

民团一中队全部清除，缴获敌人一万多发子弹，一千多颗手榴弹。这次大胜仗，极大地鼓舞了同志们的斗志。从此以后，我们的形势也逐渐地好转起来，我们从小胜利不断走向大胜利。

一九三四年四月，吴军长率领我们在豹子崖胜利地与徐海东同志会师。久别重逢，战士们亲热无比，此时该有多少话要交谈啊！然而，部队又要忙着整编。整编后，二十五军辖七十四、七十五师，另以江求顺为首在皖西北重组红二十八军，革命力量大大地发展了。

吴焕先军长率领着这支在革命战火中发展起来的队伍，活跃在大别山之中，鄂豫皖一带，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